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1
第2期

2021年6月 第2期(总第90期) 第23卷
Jun.2021 No.2 Sum.90 Vol.23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一年六月第二期（总第九十期）第二十三卷

立体传播民主党派高质量履职“好声音”

——《云南政协报》“统战新闻”栏目实践与经验探微

冯　涛

（云南政协报社，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民主党派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界别，人民政协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云南政协报》通过“统战新闻”栏目，对民主党派履职尽责进行立体追踪报道，为民主党派塑造良好政党形象、传播高质量履职“好声音”、展现民主党派服务大局的优势提供宣传展示平台和舆论支持、引导，取得较好社会效益。

关键词：云南政协报；统战新闻；立体宣传；民主党派履职

民主党派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界别，人民政协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在实践中，人民政协正是通过发挥自身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开展协商、实施监督、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云南政协报》创刊于1989年2月27日，是云南省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宣传党的人民政协事业、宣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公益性时政类综合大报，是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重要喉舌。设置“统战新闻”栏目，符合报纸特色，顺应时代发展，受到读者广泛好评，为民主党派的新闻宣传及其宣传方式、方法的创新发展，不断作出探索和贡献。

一、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民主党派新闻宣传是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新闻宣传的根本特色体现在其任务、目的的双重性上。在新时代，其基本任务是宣传展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的成果，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根本任务是宣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民主党派聚集了一批学历知识层次较高、专业能力较强的专家型人才。他们的先进事迹、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为人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新闻宣传最生动的教材。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个民主党派，尤其是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医护人员、科技专家、企业家积极投入到抗疫大战中。民主党派成员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言、义诊、捐资捐物，乃至战斗在抗击疫情最前线，涌现出了众多抗疫先锋，彰显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云南政协报》“统战新闻”栏目编辑按照报社统一安排部署，及时优化完善策划方案，派出多路记者进行采访，积极联络全省各级党派组织中的通讯员和从事新闻宣传的干部，组织刊发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党派成员抗疫风采的新闻稿件。如：宣传九三学社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支社副主委、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何建林抗疫事迹的《不破此疫终不还》；刻画医卫界民盟盟员“抗疫群像”的《妈，我不能陪您了，患者需要我！》；讲述民建会员、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赵力抗疫事迹的《争赴咸宁抗击疫情》；讲述农工党党员、昭通市中医院感控部门负责人阮丽琼抗疫事迹的《为医护人员筑起安全之“盾”》等等。

润物细无声。“统战新闻”栏目就相关主题精心组织、及时刊发宏扬主旋律、饱涵正能量的新闻稿件，通过“一报一网两微一端”联动，激发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凝聚力、向心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人物典型的示范带动，强化党派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对内凝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风雨同舟、团结一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磅礴之力，对外树立积极建言参政、监督履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进步的参政党形象。

二、借助两会平台宣传民主党派“好声音”

每年召开的两会，既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建言献策的履职舞台，也是民主党派履职尽责的集

作者简介：冯涛，云南政协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下转封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1 年第 2 期(总第 90 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朱家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特约稿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则和遵循

——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张献生（5）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与运用的历史考察及意义辨析 …… 李维昌，王阳宇（15）

新中国成立初期德宏民族贸易研究（1950—1965）…… 陈思洁（22）

●统战理论与实践

费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经验与启示 …… 杨春华（32）

“互联网+统战宣传”：助推云南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 …… 李应伟（38）

新时代统战视角下的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研究 …… 李熙春（44）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协商民主：“共和”话语中的文化与实践 …… 吕承文（50）

参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 张　星（60）

●民族工作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意蕴 …… 卢石英，周朗生（67）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1-6]

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谈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 董国菊（75）

边民补助：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 …… 曹　莉（82）

●文化建设

现代华人“异中求同”的艺术创作

——以郎静山摄影中国化和张大千泼彩抽象化为例 …… 刘梅琴（88）

《水经·穀水注》中的错简、脱文与汉魏洛阳城及其周边水系 …… 杨萧杨（99）

●历史与人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运行考察 …… 邵　宇，孙玲丽（108）

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的思考 …… 魏永琴（116）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 2021

Contents

Contributing Articles

Framework and Oper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A Study of "Regulations of the CPC's United Front Work" ····· Zhang Xiansheng(5)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A Historical Perception into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s Concept of "People" and Its Significance ····· Li Weichang, Wang Yangyu(15)

Stud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Trade in Dehong in the Early Period(1950–1965) after the Founding of P. R. China ····· Chen Sijie(22)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Fei Xiaotong's Survey of "Three Villages in Yunnan" ····· Yang Chunhua(32)

"Internet + the United Front's Publicity": Fostering Formation of the Grand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in Yunnan ····· Li Yingwei(38)

Cultural Study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Baosha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 Li Xichun(44)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Consultative Democracy: Culture and Practice of the "Republican" Discourse ····· Lü Chengwen(50)

Roles of Participatory Partie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ed Competen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 Zhang Xing(60)

Work on Ethnic Affairs

The Triple Dimensional Logic Embedd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ystematic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A National–Governance Perspective ····· Lu Shiying, Zhou Langsheng(67)

Toward the Formation of Minority People's Cultural Confidence Sourced from Traditional Festivals: A Case Study of Dehong Autonomous Region of Dai and Jingpo ····· Dong Guoju(75)

Subsidies to Border Residents: A Political Means of Land Border Management in Borders·····Cao Li(82)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rn Chinese People's 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Spirit of "Commonness in Difference": Examples of Lang Jingshan's China–Style Photography and Zhang Daqian's Abstraction of Splash Painting ····· Liu Meiqin(88)

A Study of Misarranged Scripts and Loss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ater Classic: Commentary on Grains in the Water Classic" and Records of Luoyang City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nd the Water System Around ····· Yang Xiaoyang(99)

History and Figures

A Survey on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Execution of Supervision Power in the Period of the Kuomintang's Ruling ····· Shao Yu, Sun Linli(108)

Reflections upon "A Research into the Inter–provincial Venue of the CPC's Jimingsansheng Meeting (A Meeting Held on the Joint of 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 Wei Yongqin(116)

特约稿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则和遵循

——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张献生

（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 100800）

摘　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制定和修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一系列最新精神，凝结了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优良传统，适应了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和统一战线新方位新使命，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准则和基本遵循。学习贯彻《条例》要深刻认识《条例》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准确把握《条例》的要旨和精髓，注重领会《条例》各领域的理论创新，为贯彻落实《条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底蕴；要旨；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01－10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统一战线领域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准绳。2015 年《条例》颁布试行以来，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认真总结新经验新做法，着眼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对有关政策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反复论证，并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印发实施。特别是《条例》的制定和修订，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一系列最新精神，凝结了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优良传统，适应了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和统一战线新方位新使命，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准则和基本遵循。统一战线要在新时代充分发挥重要法宝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最基本的就是把《条例》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一、深刻认识《条例》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

《条例》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党内法规，既是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长期实践形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特别是着眼新时代党的初心和使命，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对统一战线进行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形成了《条例》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指导思想是统一战线的灵魂，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性质、方向和使命。近百年来，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巩固发展、波澜壮阔，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中谱写新篇、屡创辉煌，最基本的就是有科学理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的章

作者简介：张献生，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条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纳入统一战线工作中并作为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①] 将其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理论引领和行动指南。这对于统一战线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好服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形成新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根本性意义，必将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切实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任务。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关系统一战线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统一战线就会失败，革命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统一战线就会发展壮大，革命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

《条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条阐述统一战线的基本性质时，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第三条阐述指导思想时，第一句话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四条阐述统一战线工作的 8 个原则时，位列首位的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条例》着眼健全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规定各级统战部长由党委常委担任或兼任，强调地方党委对本地区统一战线工作负主体责任，并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党委在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指导和督促检查下级党组织做好统战工作、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健全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等方面的职责。[②] 这些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建立健全了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

（三）积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各方面社会成员在共同政治基础上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这就决定了统战工作必然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单靠统战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全党全社会共同推进。具体的统战工作，不仅涉及组织、宣传、网信等党的部门，也涉及外交、教育、公安、民政和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政府部门，还涉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人民团体，只有加强统筹协调、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才能使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基于对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的深刻把握，是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优势和作用的重要保证，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

《条例》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在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明确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对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和涉及统一战线工作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部署、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等重要职责，并对地方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设置提出要求。[③] 通过完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制度和机制，实现统一战线资源的统一集中优

①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②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③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化配置，形成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强大合力。

（四）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守正创新

这是由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也是立足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重要要求。统一战线是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这就是守正。具体讲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事关统一战线性质、方向、原则的根本政治问题上，必须始终保持定力、固守底线，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创新是统一战线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的必由之路。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就是适应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需要，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的过程。统一战线从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就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集中体现，并形成了以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江泽民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成果。

《条例》的制定和修订，就是在坚持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进行完善和创新。在总体要求上，提出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中，提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在民族工作中，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宗教工作中，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一战线工作中，提出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同时，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以及统战工作的新发展，增加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和“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两章。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方式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统战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推进统战工作科学发展。

（五）切实加强统战部门的自身建设

统战部是党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也是党团结联系党外人士的桥梁、纽带。从 1939 年正式设立中央统战部开始，党中央就多次强调加强统战部门的自身建设，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具有政治责任，把握内在规律，精通此中门道，提高做统战工作的能力素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都对做合格统战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

《条例》对统战部门的设置进行了规范，对各级统战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归纳、梳理和完善，使统战部门的职责任务更加全面、清晰。特别是新增了“统战部门自身建设”一章，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对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这就为新时代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准确把握《条例》的要旨和精髓

修订后的《条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成果，就是系统总结统一战线百年历史经验、优良传统和发展规律，明确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是首次在党内法规中明确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也是《条例》的要旨和精髓，需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一）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也是其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

大作用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并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从而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因而把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导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而背叛革命，因而把他们拒于统一战线之外，从“左”的方面断送了领导权，最终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并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和革命的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不仅取得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且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由于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中仍然存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势力，仍然存在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把握了党对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

在统一战线内部，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各种思想总要表现出来，并且力图施加影响，如果不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对其进行引导，就会降低对其的领导水平，甚至在实际上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为此，在统一战线中要努力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不重视思想政治引导，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不关注，对无底线的言论开绿灯，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敢或不会批评；一种是思想政治引导方法简单粗暴，不善于运用谈心说理、循循善诱的方法阐明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对党外人士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引导，不断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始终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了团结、振奋、活跃的政治局面。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①

（二）政治基础：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

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联合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否则统一战线就是一盘散沙。政治基础集中体现为奋斗目标和政治原则。奋斗目标是政治基础的集中体现，有了共同奋斗目标，团结联合才有恒久动力、前进方向；围绕共同目标奋斗，不同社会成员才能超越分歧、同心协力。政治原则是政治基础的内在要求，如果广泛联合不讲原则，对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一概承认，对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抵制，就会使统一战线涣散，团结联合就会变成苟合与貌合。

政治基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团结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协力并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共同致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政治基础。

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虽然不同，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始终是两面高扬的旗帜。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是统一战线的底蕴和底线。无论什么政党和团体，无论哪个阶层和个人，如果连祖国都不热爱，就失去了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起码资格，更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03 页。

标，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是统一战线的政治方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关系既是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以新民主主义为政治目标，它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还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方向性，是广泛团结与政治导向的统一。在新时代，仍然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最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作用发挥：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始终是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则是统一战线服务党的目标任务的集中体现和内在要求。

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和内容，但其作用的发挥始终是与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联系在一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进行政党合作，联络友军，团结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爱国华侨，策动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等，都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成员，共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发挥作用。在新时代，统一战线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凝心聚力。

实践证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也是履行职能、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要旨。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只有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心，服务“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这个大局，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四）工作主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统一战线的根本职能和任务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而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进行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以被领导者存在为前提的，不能成为“空军司”和“无兵司令”。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这个主题，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团结联合起来，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大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从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看，大团结大联合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1937 年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党各界各军、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赞成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分子也成为统一战线成员。抗战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不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①]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热情帮助他们进步”。[②]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局面。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必须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绝不能搞“清一色”。土地革命战争时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78—279 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145 页。

期，由于王明一伙在统一战线中搞“左”倾关门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导致革命失败和根据地丧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总结这个教训时说，瑞金时期最纯洁了，结果办起事来十分困难，结果失败了。因此，真理不在“清一色”。

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不断产生，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只有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才能把社会各方面成员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五）发展规律：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具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经历的曲折和挫折，都与未能准确掌握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关。毛泽东指出，“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①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所谓多样性，就是构成统一战线的不同阶级、政党、民族、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人士，以及这些人士具有的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生活方式。所谓一致性，就是实现团结和联合必须在政治方向、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上形成的基本共识。多样性是统一战线的客观基础，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性是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没有一致性统一战线就是一盘散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②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关键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增强一致性；所谓求异，就是包容多样性。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方面，要在政治目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凝聚和扩大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但不能搞“清一色”；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既求大同存小异，又求大同存大异，但不能失去社会主义的主导性。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守住政治底线，对违背政治基础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和斗争，决不能让其以多样性名义大行其道。“过于追求一致性、过于放任多样性，结果都会动摇统一战线的基础”，只要“守住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③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揭示了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社会多样性发展条件下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仍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则是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的方针。

（六）内在动力：坚持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归根到底是要使被领导者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奋起为之作斗争。统一战线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致力共同事业、实现共同目标，构成了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代表、反映和维护相关阶级、阶层和团体利益，构成了统一战线成员的自身利益。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个代表”，既要维护、实现和发展包括同盟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利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2007 年 5 月 22 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5/22/t20070522_11449970.shtml，2021 年 6 月 15 日。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31 页。

③ 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33 页。

益，还要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的利益。这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也是统一战线成员为实现共同事业奋斗的重要动力。

同盟者的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是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影响和决定政治思想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进行社会变革、体制创新，还是经济调整、社会治理，都注重通过制定相应政策举措，适当照顾相关同盟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集中体现在对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上，是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的核心。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在国家政权机关、政治机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国家重要内事和外事活动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范。这既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不仅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实现了统一战线充分反映所联系群众利益和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双重功能”。新时代我国社会利益矛盾更加突出，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尊重、照顾和维护同盟者利益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又要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交汇融合，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强大动能。

（七）基本方式：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

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是统一战线实现团结联合的基本方式，也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教育引导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做得好坏，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在这方面，党的历代领导人为我们做出光辉典范，并成为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

广交党外朋友是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体现，只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利，什么人都要交往。1945 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三次到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会晤，并主动拜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周恩来一生中，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到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国民党原军政人员、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我们党结交了大量的各方面的党外朋友。这就是把方方面面党外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凝聚了革命、建设和统一力量。

深交党外朋友是巩固发展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的内在要求，主要是长期交往，以心换心，使他们成为党的挚友和诤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十年交往中，坦诚相见，道义相砥，既留下发人深醒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还培育了一位为国家和人民事业说真话、建诤言的党外人士典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工商界的团结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与河北正定县党外作家贾大山的交往，亦是感人肺腑，传为佳话。深交党外朋友，使我们党能够听到真话、实话，保持清醒头脑，进行民主决策，改进思想作风，更好地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性质特点、成员构成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作为实现团结联合的基本方式没有变，其作为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八）体制保障：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包括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等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必须建立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来做的局面。江泽民指出，“建立和健全精干、统一、高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机制，有利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统战系统的协调配合和及时处理统战工作中的重大问题”。[①]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②]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54—155 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19 页。

大统战工作格局是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治本之策。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缺乏大统战意识，“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党委负责同志没有把统战工作当作分内事，使得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难以体现；有的相关单位、部门认为自身与统一战线无关，不积极主动做好相关统战工作；统战系统中的一些单位，工作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配合，统战工作合力难以形成。只有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把党的统一领导加强起来，把相关单位的责任明确下来，才能形成共同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协力奋斗的局面。

大统战工作格局是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必然之举。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改革发展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智慧、力量、共识的工作更加艰巨、繁重。统一战线要着眼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集中优化配置统一战线资源，形成全党全社会做统战工作的强大合力。特别是统一战线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和形成具有国际性的大统战的新形式、新平台，更需要具有大统战思维和工作机制。

因此，新时代统一战线要为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凝心聚力，就必须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统战工作领导的小组的作用，形成全党全社会推动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统战工作守正创新的强大合力。

三、加深理解《条例》对各领域统战工作的理论创新

《条例》在制定和修改完善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着眼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些都需要深入学习和理解，特别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

这是《条例》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科学概括，也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其性质特点有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1989 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提出，我国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200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把“符合国情”改为“具有中国特色”。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并从“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三个方面对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里作了深刻论述。[①] 在此基础上，《条例》把我国政党制度明确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这个表述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它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一个是新型，即它不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继承，不是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移植，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仿效，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创造了一个新的参政和执政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治理方式，是世界政治文明大花园中独具风

① 《习近平两会上首提“新型政党制度”》，2018 年 3 月 4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304/c1003-29846958.html，2021 年 5 月 10 日。

采的中国花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这是《条例》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科学界定，也是多党合作理论的重要创新。民主党派的性质界定，是多党合作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确立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基本定位、明确基本政策、发挥职能作用、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依据。在多党合作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民主党派的发展进步，民主党派的性质先后发生了多次重要变化：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联盟，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2013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对民主党派历史性进步的充分肯定，深刻揭示了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使新时代的多党合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它既要求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也要求我们党协助民主党派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履行职能。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条例》在试行中提出“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这次正式印发时则进一步强化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② 这是民族工作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治本之策。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团结是各民族的生命线。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做法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尽管发展历史不同、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生长起来的，都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时代，增强民族团结，防止民族分裂，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最根本的就是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四）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条例》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③ 这是新时代我国宗教的根本方向和主要路径。宗教问题是世界性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执政党，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尤为复杂和重要。经过长期实践，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宗教的基本理论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上，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方针核心要旨就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

中国化是对我国宗教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宗教与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基本规

---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102 页。

②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③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律。我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除道教是本土的，其他都是从国外传入的，它们之所以能在我国和谐共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发挥积极因素，就是经过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抵御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二是要把握宗教社会作用两重性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宗教界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中的积极作用；三是要适应依法治国方略，提高宗教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四是要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代表人士，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五是要建立健康的宗教关系，主要是政教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的关系。

（五）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

《条例》指出，“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①] 这是对 1991 年中央 15 号文件提出的八字方针的完善和发展，是统战理论的重要创新，核心是正确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其中有的人错误地把他们与过去的资本家相等同，甚至将其视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对此，1991 年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明确，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原工商业者等同起来，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经过充分研究论证，2001 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一些地方对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积极主动帮助解决力度不够，出现了“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现象的问题，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把八字方针中的“帮助”改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2019 年，中共中央专门就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下发文件，指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存在，并对“八字方针”进行了完善，使其成为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十字方针”。[②]

综上所述，“十字方针”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论政策创新发展的集中体现，也表明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态度。需要准确把握的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信任是政治上的，并不是说讲信任就不需要对企业进行监督了，就不需要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教育引导了，更不能谈“非公”色变，一律由“民营”来代替。因此，要科学认识和把握“十字方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既要信任，当作自己人，又要教育引导，促进其健康成长。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6 版。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2020 年 9 月 15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15/content_5543685.htm，2021 年 6 月 15 日。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与运用的历史考察及意义辨析

李维昌，王阳宇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人民”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在其经典文献中的运用，并在时间、主体、功能三个维度上对“人民”概念与“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对比，既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有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人民”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人民”概念；创立运用；历史考察；范畴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15－07

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历史流变，一方面要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时间为线索，回到毛泽东的经典文献中，理清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代表文章中“人民”这个关键词的运用情况及其具体所指的内涵，另一方面又要结合时代背景，了解毛泽东根据现实变化对“人民”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调整。

一、“人民”概念在毛泽东经典文献中的代表性运用

《毛泽东选集》收录了毛泽东 1925 年至 1949 年间的代表性文章，这期间也是毛泽东“人民”概念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的一个完整过程。因此，要梳理“人民”这个关键词在毛泽东经典文献中的运用情况，必须紧密结合《毛泽东选集》，只有梳理总结出其中“人民”概念的界定以及使用情况，才能够为后续的对比提供文献方面的支撑。

（一）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和运用的萌芽时期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著于 1925 年 12 月，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大革命时期，当时的毛泽东正在同党内存在着的机会主义做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把阶级分析法同实际调查密切结合，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农民。在这里，毛泽东从经济地位、政治诉求以及对待革命态度三个标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划分，欲通过阶级划分来分清革命的敌友。经过毛泽东的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被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在这篇文章中从“人民”一词的使用情况来看，当时毛泽东很少使用“人民”这一关键词，反而是对“无产阶级”一词情有独钟，其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经典

作者简介：李维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王阳宇，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定义后指出："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①] 虽然毛泽东早期文献的研究已经证明，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经逐步将资产阶级所谓的"国民"概念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人民"概念，但在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始终缺乏对"人民"一词的集中使用。

在 1928 年 10 月写的另一篇代表性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往往采取更为具体的称呼来表述"人民"一词。例如，毛泽东在关于割据地区的经济问题中说道："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②] 然而，由于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仅在一个月之后（1928 年 11 月），《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长文中，开始集中出现"工农""群众""人民"等字眼。虽然此处使用的"人民"或许更泛指根据地总的人口，但是结合当时的写作背景来看，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毛泽东在谈到红军的军事问题时说："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③] 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对"人民"的使用算不上集中，对"人民"概念的定义也仍不成熟，但"人民"一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之中。到了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人民"一词的使用频率开始快速上升。回溯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人民"这个关键概念的运用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现实行动发生了转变，在精神层面上更是摆脱了过去地方性革命政党的局限，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执政大党。尤其是此篇文章的人民共和国部分，毛泽东在现实意义上完善了"人民"的概念，即用基本任务来划定"人民"的范围。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此篇文章中第一次对"阶级"与"人民"的数量关系进行了阐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概念开始集中出现的同时，毛泽东的表述中的阶级色彩并没有减弱。例如，当毛泽东谈到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利益时，他指出："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⑤] 总的来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根据革命现实情况的变化，坚持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培育出了"人民"的概念。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转变，开始把自己奋斗的价值取向扩大到工农以外的全国人民。

（二）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和运用的发展时期

1939 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的"人民"概念越发清晰。首先，虽然毛泽东在论及共产党与革命时仍然坚持使用"无产阶级"一词，例如他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中国的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⑥]；但实际上，文章在开篇谈论全国形势之时，就直接使用了"中国人民"一词，"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 页。

②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 页。

③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 页。

④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8 页。

⑤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 159 页。

⑥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44—645 页。

能灭亡中国”[①]。可见，在毛泽东当时的认知中，“无产阶级”仍然肩负着领导革命的重任，但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人民”正逐渐成为推动革命最直接的动力。因此在毛泽东此后一年（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发现，以“人民”为主语进行的论述更多，同时论述的对象也更为宏大。例如，在谈到全国局势、整体革命形式等问题时，毛泽东就频繁使用“全国人民”一词。其次，写于 1942 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更加清晰、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的定义。一是从“人民”这个关键词的使用情况来看，文章前半部分使用“人民”一词的频率颇高。例如，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部分强调：“我们今天开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②] 二是在此篇文章中，毛泽东在谈及文艺为了谁的问题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民”的范畴，他说：“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③] 三是这篇文章虽然出现了很多对“人民”的阐述和定义，但是细究其内核，仍然是在阶级划分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全文充满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色彩。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探析到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基础来源于阶级的分析，更能够发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的阶级意识是极其浓烈的，这也对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艺术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和运用的成熟时期

1948 年 1 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就《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人民”与“无产阶级”概念的辨析以及对政权的认识进一步做了梳理与总结。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在关于政权问题上，为了进一步明确“人民大众”的范围以及政权的性质，同时也为了明确“人民”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关系，毛泽东阐述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④] 其次，在同年 4 月写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了“人民”的内涵，即“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开明绅士”都可以划归入“人民大众”的范畴。到了 1949 年 6 月 30 日，即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28 周年诞辰时，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概念及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驳斥敌人关于消灭国家权力的问题时说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⑤] 同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了“人民”的内涵，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⑥] 总的看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已经相当成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由一个地方性革命政党逐渐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大党的过程中，虽然坚持把阶级斗争学说当做指导自身行动的方法论，并且也坚定不移地将其贯彻到实践活动中，但是为了进一步联合各阶级以确保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赋予联合的同盟一种全新的政治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人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 632 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48—849 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855 页。

④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272 页。

⑤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6 页。

⑥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第 1475 页。

民”的概念诞生了，在此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频繁出现且广泛使用。例如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中再次对“人民”进行了定义，他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① 至此，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便一直沿用至今。期间，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人民”这一概念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的核心概念。

二、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与“无产阶级”概念运用的对比

以时间为线索对毛泽东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对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使用情况有大致的了解，但想要进一步深化对“人民”概念的理解，还需把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同“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对比。

（一）时间范畴上的对比

表 1 《毛泽东选集》（1—4 卷）中“人民”与“无产阶级”出现的次数以及时间统计②

卷数关键词、时间	人民	无产阶级	时间（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46 次	118 次	1925—193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556 次	169 次	1937—194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41 次	103 次	1941—194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42 次	34 次	1945—1949

根据统计，我们大致可以发现，毛泽东在 1925—1937 年间，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对“人民”一词的使用相较于后期是比较少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并不稳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在寻找革命的坚定同盟者，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点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就提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 因此，在寻找革命同盟者时，毛泽东所坚持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故第一卷中的“无产阶级”一词出现的次数在四卷中位居第二。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开始在农村地区进行割据，并极度不信任民族资产阶级，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除了在政治概念中使用“无产阶级”一词之外，在根据地更多的是使用“工农兵”这种更具体的概念来表达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年），“人民”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幅上升，而“无产阶级”一词的使用频率在短暂上升后开始轻微下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淡化阶级之间的矛盾，并适当降低对国民党当局的敌对程度。其次是由于时局快速变化，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其头脑中不断成熟，最终出现了“人民”一词使用频率上升而“无产阶级”一词使用频率下滑的趋势。最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时期，“人民”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05 页。

② 数据来源于对《毛泽东选集》（1 –4 卷）电子版中“人民”以及“无产阶级”两个关键的词检索后的统计结果。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 页。

一词的使用频率进一步提高，而“无产阶级”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下滑。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提法已经不再适用，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完全成熟，“人民”概念的内涵及其运用已经完全成熟，“人民”一词已经能够完美阐述革命的一切理论，因此，“无产阶级”一词的使用频率急剧下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无产阶级”一词在此时期的毛泽东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出现了下降，但是在关于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以及革命的未来发展等表述中，毛泽东依然坚持把“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视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总的来看，通过时间范畴上的对比，我们发现毛泽东对“人民”一词的使用频率同时间线是呈正比的，这与革命的现实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成熟密切相关；而“无产阶级”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对稳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概念的界定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与成熟的状态。

（二）主体范畴上的对比

此主体范畴上的对比主要聚焦于主体关系之间的对比。通过前文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以及“人民”概念运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就两者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出以下判断：“无产阶级”寓于“人民”之中，同时又统领整个“人民”概念。

首先，之所以认为“无产阶级”概念寓于“人民”概念之中，是因为“无产阶级”所包含的“产业工人”以及与其地位相似的“其他工人”同“人民”概念中的“工人”是同一部分。因而，“无产阶级”的概念寓于“人民”概念之中的论断是成立的。

其次，“人民”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成果，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毛泽东早年就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所谓的“国民”概念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和局限性，“国民”并不能代表广大民众，其所谓的民主更不能代表彻底的民主。因此，为了寻找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体称谓，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阶级分析法，并通过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终把这些阶级整合到了一起，使其成为“人民”一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不采用阶级分析法，不划分出无产阶级，就不会产生如今的“人民”概念，因此，“无产阶级”的概念是“人民”概念的理论与现实的起源，其寓于“人民”概念之中的同时也成了“人民”概念的内核。

（三）功能范畴上的对比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①] 毋庸置疑，“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功能，便是领导人民群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一直坚信的，中国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至于为何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的分析已经有了大量成熟的论述，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功能在于领导和引领人民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革命，采取正确的路线与方针进行斗争。明确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并不代表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想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任务的复杂与艰巨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因此，寻找“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寻找革命的主力，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民”这一概念作为支持与推动革命的阶级联合体最终形成了“人民”成了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这便是“人民”的功能。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人民”的主体性与历史的选择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有机结合，“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并非被动、机械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让自身的利益同革命紧密结合，并最终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出了决定性力量。

（四）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的总结性界定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是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首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现“人民”346 处，第二卷出现 556 处，第三卷出现 841 处，第四卷出现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 页。

1441 处。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对于“人民”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对于后期来说是较少的，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人民”一词的使用频率开始激增。这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于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国情的进一步认识。而“人民”概念使用频率的增加，意味着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终于寻找到了推动革命前进的主体力量，即“人民”。毛泽东判断是否为“人民”的标准便是对革命的态度，简单来说，支持革命的便是自己人，是“人民”的范畴，反对革命的便是“敌人”，是要打倒的对象。因此，随着革命理论的不断成熟，“人民”概念的内涵也逐渐定型，即一切能够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阶级、阶层以及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从具体的主体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人民”的主体部分，而“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投靠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特殊时期也可以算作是“人民”的一部分。就此，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正式成熟，其内涵与外延的广阔性以及其与时俱进的特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三、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和运用的历史意义

经过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以及“人民”概念在三种不同范畴上的对比，我们对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具有重要影响，而梳理和总结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把握“人民”概念，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具有重要帮助。

（一）“人民”概念的创立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

总体来看，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为核心演变而来的“人民”概念，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强调：“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是对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②]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最为核心的概念。

（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政治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脚步从未停歇。在构建民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公民”和“国民”两个词语曾经流行一时，但是“公民”也好，“国民”也罢，其归根到底还是产生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导向仍然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且资产民主的对象始终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直到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出现，中国施行民主的对象才真正被勾勒清晰，中国的民主也才第一次具有了广泛性与真实性。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人民”概念还改变了近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无论是在中国政治近现代的转型期，抑或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概念一直被嵌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中，并且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宣传以及论证政权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毛泽东的“人民”概念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政治身份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深刻地影响着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自我理解。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概念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还在建构新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

①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04 页。

② 习近平：《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37 页。

（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起点范畴

毛泽东所坚持的“人民”概念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为了谁的重要问题。首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① 实现人民最广泛的利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是改革开放一系列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正是“对改革开放为了谁”这一问题的坚定回答。其次，广大人民仍然是改革开放实践中最广泛的主体和最直接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主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劳动技能的广大劳动者，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把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运用到实践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改革深处有担当作为，就必须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为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直接实践者。

（四）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性范畴

我们要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实质上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无产阶级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中得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体系，对“无产阶级”的概念有明确定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产资料的社会阶级。”② 马克思同样指出，“无产阶级”诞生的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形成的”③。根据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也可以得知列宁对“无产阶级”的第一认识同样是“工人”，其指出过“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④。因此，经过对革命先贤“无产阶级”概念界定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定义是继承了前者的“产业工人”核心，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仅仅定义了何为“人民”不同，毛泽东不仅坚持了前者以“无产阶级”为核心而形成的“人民”概念，同时还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人民理论，例如提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理论。同样，依照这些理论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理论在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果。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考察，都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能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⑤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加强党史学习，总结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以及政治行动力，把握历史与人类认知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习近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2页。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295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④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⑤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第1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德宏民族贸易研究（1950—1965）

陈思洁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 昆明 650111）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解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人民政权，曾派出由贸易组、卫生队组成的民族工作队随人民解放军进入边疆。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省德宏州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贸易组到达德宏后，在解决少数民族温饱、满足其需求的同时，创建了专门的商业机构——德宏民族贸易公司。民族贸易公司在创立过程中，不仅与外来经济有过激烈的博弈，而且开展了极具边疆民族特色的经营，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先头力量。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民族贸易；德宏

中图分类号：F7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22－1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贸易始于随军贸易，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政权未建，贸易先行”为方针政策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商业活动。杨清震曾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贸易公司所经营的民族贸易作为“解放初期创建人民政府的‘先行官’，是随着各少数民族地区相继解放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①]。伍小涛写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贸易“是中共为了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崭新的世界，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活动的成果之一”[②]。本文的“民族贸易”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人民政权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工作和商贸工作。

当前，对于民族贸易的研究多数是从国家层面出发，陈述相关机构的建立、组织、经营，以及国家政策；也有学者注意到民族贸易在各地发展的不同之处，分析了当地民族贸易机构的建立历程、在当地开展的特别经营，并总结历史经验。[③]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部分，对于民族贸易在民

基金项目：2020 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外币流通与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研究”（QZ202027）；2021 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路径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SKPJ202133）。

作者简介：陈思洁，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校刊部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① 杨清震：《民族贸易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7 页。

② 伍小涛：《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 年～1956 年）》，《商场现代化》2008 年第 12 期，第 199—201 页。

③ 例如，穆相林等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年）就提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民族贸易机构利用“巴扎”经营；姜建强的《中共在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贸易工作研究（1946—1965）》（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提到了民族贸易机构与“旅蒙商”的合作经营。

族工作中的开展形式与地位的专门研究鲜见，多数集中在民族政策、民族人才培养方面。[①] 与此同时，民族贸易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手段，是国营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延伸的表现。目前，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营经济研究多集中在供销合作社、煤矿企业等机构，[②] 也有不少研究聚焦在私营企业向国营企业的转化方面。[③] 民族贸易的开展过程中，尚有许多民族关系协调、对外贸易的协商事件被记录下来，遗憾的是，这部分史实多数存在于档案之中，鲜有学者能够深入触及。云南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开展民族贸易最主要的地区之一，却少有研究涉及此地。[④]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云南民族工作成绩突出，这是云南最宝贵的财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地处云南西南边地的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贸易工作，这是德宏乃至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宝贵经验。

对此，本文选择云南省德宏州为对象，立足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中的"工作总结"与当地报纸，结合地方志、文史资料、口述资料，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通过梳理德宏民族贸易公司的建立以及国营经济与外来经济的博弈过程，进一步讨论民族贸易如何在边疆民族地区树立威信，以期勾勒出民族贸易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真实图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确立与稳固。

一、从无到有：德宏民族贸易机构的创立（1950—1955）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多数边疆民族地区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管理的边缘。元、明、清三朝，德宏即受"羁縻"管理，本地民众皆视"土司"为一方之主。中国西南沿边包括德宏在内的地区和东南亚半岛各国被人类学家称为 Zomia（赞米亚）地区，在这里具有"流动的经济和文化"[⑥]，近代以前，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和文化是相通的。特别是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1902 年腾越海关设立，德宏成为英国争取滇省势力的首要地区。因此，德宏经济社会无一例外地深受东南亚各国影响。单从商贸一项看，近代德宏商贾"多远出英缅……货驮往来，络绎不绝"[⑦]。市场所售多为带"洋"字称谓的商品，如洋盐、洋布、洋纱、洋铁、洋油，[⑧] 英缅卢比也

① 相关研究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研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编著《民族工作四十年》（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杨晶，杨传堂《光辉的实践 正确的道路——新中国民族工作 60 年的成就和经验》（《求是》，2009 年第 10 期），伍小涛《试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源与流》（《广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 3 期）；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民族工作的研究主要有：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年）；王连芳主编《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② 相关研究有：李瑞芳《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建立的重要环节——以国营煤矿为中心的考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③ 相关研究有：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的案例考察》（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陈碧舟，龙登高《从公茂机器造船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隐匿敌产"企业的改造》（《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④ 相关研究有：赵妍《山间铃响马帮来——建国初期丽江专区民族贸易研究（1950—1965）》（《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谭世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文山民族贸易研究（1950～1965）》（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

⑤ 本文讨论的"德宏"是指今天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包括瑞丽、梁河、盈江、陇川、芒市五县（市）及畹町镇。德宏解放前，当地有畹町、盈江、梁河、瑞丽、陇川、莲山、潞西几个设治局。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即逐次接管了原国民政府在德宏的各设治局，并改建为当地人民政府或民族行政委员会。当时境内有畹町、盈江、梁河、瑞丽、陇川、莲山、芒市七县，后莲山合并盈江，畹町改镇合并瑞丽。

⑥ C. Patterson Giersch，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4.

⑦ 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47 页。

⑧ 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 147 页。

成为境内主要流通货币，经济、社会可谓“内疏外密”。在“洋”物充斥之下，当地竟存在着“一头水牛换一口大铁锅，一只大母鸡换一包针，一筐山货换几两盐”① 的不公平贸易；山区与坝区社会发展差距极大，坝区物产丰富，大米供应至腾冲、保山等地，山区却是“刀耕火种”，物资匮乏。直至 1950 年，德宏全境解放后，上述情况才开始改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内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解放，如何解放这些地区并建立起人民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对此，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组织了大量民族贸易小组跟随解放军，以“政权未建，贸易先行”的政策，与各少数民族开展商贸活动，以稳固人民政权。

1950 年 4 月，德宏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军政代表团接管原国民政府各设治局，建立潞西县和瑞丽、陇川、盈江、梁河、莲山 5 个民族行政委员会。此时，德宏境内没有一个国有商业机构。5 月，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民族贸易小组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德宏芒市，租借民房一间，建起仅有 8 人的芒市贸易组。② 此后，解放军“每到一地，贸易组随即在当地摆摊经营”③。从供应民众生活必需的食盐、火柴、棉布、禽蛋、肉类等开始，并规定“在纯卢比市场，仍旧遵从群众习惯”④，国营经济逐渐融入当地市场，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人民政权。

1952 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德宏瑞丽、陇川、盈江、梁河、莲山五个行政区改设县，新增畹町一个县级镇。随着人民政权在德宏的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在当地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境内畹町、盈江、梁河、瑞丽、陇川、莲山各地均建成国营意民商店和国营贸易组，逐步达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计划在全国建立强大的国营经济的要求。同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在边疆民族地区“积极建立与发展国营商业网”、组建“一揽子”式的国营贸易公司⑤的要求。年底，德宏各县国营商店、贸易组改建为国营贸易支公司，德宏民族贸易机构雏形始成。机构创立初期，由于缺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了解，贸易公司不仅品类欠缺，且售价较高，“多数商品仅供给当地机关与驻军部队”。⑥ 面对此情，贸易组在“不赔不赚，不加利息利润”的原则下，“赶着牲口、挑着货物深入山区、坝区摆摊设点”⑦。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经营范围得到扩宽。“原来仅供应机关干部与部队的百货商品面向大众”⑧，通过“打紧城城差，缩小批另（零）差”⑨，降低国产百货商品批发与零售价格，部分生活必需品赔钱供应。丰富的商品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批过去往来于边疆的私营商人来公司批发商品，“从单纯经营外货转为开

① 德宏州商务局编：《德宏州商务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208 页。

② 云南省潞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潞西县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166 页。

③ 郑刚：《对德宏民主改革的回忆》，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20 页。

④ 德宏州档案馆藏：云南省贸易公司保山分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保山分公司 1951 年下半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2－8。

⑤ 杨德颖等编：《民族贸易大事记（1949—1989）》，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年，第 7 页。

⑥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芒市支公司 1953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5－4。

⑦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陇川支公司 1952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1－3。

⑧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陇川支公司 1952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1－3。

⑨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1950～1964）》档案号：39－1－8－9。

始经营国货”。[①]“国”字号商品开始代替“洋”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传播，为边疆群众所知晓。

1953 年，贸易公司结合德宏各族习惯“赶摆”的实际，开始在主要集镇组织“物资交流会”，与民众交换农副产品。同时，结合当地情况更改度量衡单位，将“市尺”和“市斤”分别改为当地习惯使用的“吋”和“砘”[②]，商品销量得到增加，如布匹销售“改吋后的一街[③]较前一街的销量增加 13%”[④]。至年中，德宏主要集市已经形成“多数基本生活必需品为国货”，“贸易公司脱销，市场就要暴涨”的情况。[⑤] 可以说，国货已经成为边疆市场必不可少的商品。国货地位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人民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确立。

1953 年 7 月，在西南地区“民族自治区域”建设的大背景下，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建立，辖潞西、梁河、盈江、莲山、瑞丽、陇川六县和盏西区。[⑥] 至此，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人民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正式确立。次年 11 月，潞西贸易支公司改建为德宏自治区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区公司”），管理梁河、盈江、莲山、瑞丽、陇川、畹町 6 个支公司和盏西营业处。[⑦]

随着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国营经济扩大，各项改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得以顺利开展。1953 年，秉持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建立另外一套政策，更好地为少数民族服务的要求，云南省委将国境线上包括瑞丽在内的 26 县，设定为不进行土地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过区”。“直过区”的改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团结各阶层民众，二是帮扶经济发展。对此，国营经济开始在各“直过区”建立贸易机构，截至 1955 年初，区公司在“直过区”的 17 个生产文化站建立起贸易机构。此时，全区共有 35 个国营贸易机构，人员 431 名，坝区到山区的德宏国营贸易网初步建成。

虽然贸易机构遍布全区各地，但就整个德宏社会来看，多数民众仍然习惯使用外来商品和缅甸“卢比”。为了满足群众需求，贸易公司还需以“边境小额贸易”的方式经营进口商品，因此，国货如何在当地完全占领市场，人民币如何得到完全使用，成为德宏民族贸易工作继续开展的一大难题。踌躇之时，1955 年中缅关系的变化恰巧带来了契机。1955 年初，因缅甸内乱扩大，物价上涨，外汇流失较多，中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采取了“控制出口，紧缩外汇”的经济手段，但多数中缅贸易商人不愿放弃丰厚利润，仍在从事两国商贸。8 月，从事滇缅商贸的缅甸商人通过买通腊戍专区公署官员，小量运送柴油至边境积累，再售给德宏国营进出口公司，共计 4 桶。缅方发现后，极为不满，遂向我方提出控告，并禁止缅甸工业品销往中国。[⑧] 此外，11 月，中缅两国军队在“1941 年线”以西的黄果园附近发生冲突，中缅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缅关系紧张与缅甸工业品货源的中断，使得德宏贸易公司暂停了“小额贸易”，开始从内地调来可以代替进口商品的同类国货，使得边地市场形成“国货”居多的景象。1955 年底，包括“棉布、针织品、香皂、

---

①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陇川支公司 1952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1－3。

② 笔者按：每吋 1.25 尺，每砘 3 市斤。

③ 笔者按：街，云南省内赶集的叫法。

④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芒市支公司 1953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5－4。

⑤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贸易公司芒市支公司 1953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5－4。

⑥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德宏州志·综合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第 36 页。

⑦ 保山档案馆藏：保山贸易公司档案：《关于 11 月 1 日成立自治区贸易公司由》，档案号：BS－1－B－02－147－91。

⑧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德宏自治区贸易公司 1955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10－8。

牙膏、面盆、口杯、电池、日用百货、小五金、医药等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已基本上为国货所代替”。[①] 同时，贸易公司配合人民银行在德宏顺利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缅甸“卢比”在中国境内被禁用，人民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合法地位得到确定。[②]

可以说，1955 年的中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族贸易公司解决了德宏经济过度依赖缅甸的难题。此后，虽有 1956 年底在德宏举行的“中缅边民大联欢”，两国关系改善，小额贸易恢复，但德宏境内国货市场占有量增加已成定势，巩固国货地位，进一步稳定人民政权，成为德宏民族贸易机构的新任务。

二、为民所需：德宏民族贸易公司的曲折进程（1956—1959）

1956 年 4 月，保山专区并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自治区改称自治州，下辖保山、龙陵、腾冲、昌宁“内四县”和潞西、梁河、盈江、莲山、瑞丽、陇川“边六县”。同年，德宏州国营贸易公司成立，工作范围扩大为“内四县”的内地贸易和“边六县”的民族贸易。[③]

随着国货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国货需求量的增多，德宏国营贸易公司开始探索“自足”途径，因此，一系列适应当地民众需要的副食品、农具等的工业企业建成。1956 年，梁河公司与农业社合作开始加工干兰片、粉丝，不仅满足了边区需要，还供应内地，并带动其他几个县的公司生产副食品。[④] 此外，公司还与德宏阿昌、景颇两个民族的传统制刀家庭合作，建立芒市农具厂、户撒农具厂。至此，德宏“工业全无”的情况开始改变。

要提升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与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威信，仅以国货占据市场还不够，更多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新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贸易公司是人民的公司。民族贸易刚进德宏时，就看到了当地民族众多、需求不同的情况，就以“自购自销”开始经营民族特需商品，但由于品类较少，一度被当地少数民族称为“汉人的公司”。[⑤] 1955 年初，国家商业部组织“民族贸易工作调查研究组”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各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次年，全国民族地区国营商业工作会议提出：“在民族地区的商品供应工作中，必须积极经营少数民族特殊需要的商品。”[⑥] 1956 年，德宏州国营贸易公司成立后，即设立民族商品专柜，专门经营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并且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如 1956 年潞西贸易公司“在当地加工供应了傣族衣服、腰带、筒裙，景颇族衬衣、景颇族裤子等民族商品 33 种”。[⑦] 同时，结合德宏各族习惯，州贸易公司从保山请来 30 多名人员[⑧]，设立服务股，经营起带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饮食服务业。

1957 年 3 月，中央商业部召开民族贸易处长座谈会讨论了民族贸易专管机构问题[⑨]，德宏

---

①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瑞丽县民族贸易支公司 1957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21－8。

② 关于建国初期人民币合法地位在德宏确立与国营贸易之间的关系，笔者已有文章讨论。详见：陈思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民合法地位的确立与国营贸易（1950—1955）》，《西南古籍研究》，2016 年刊。

③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贸易公司 1956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2－1。

④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贸易公司 1956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2－1。

⑤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瑞丽贸易支公司 1952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1－4。

⑥ 王文长：《民族贸易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99 页。

⑦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贸易公司 1956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2－1。

⑧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4 页。

⑨ 杨德颖等编：《民族贸易大事记（1949—1989）》，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年，第 50 页。

“边六县”各国营贸易支公司随之逐步改称“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民贸公司”）[①]，并借鉴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开始设置专业部门：人事秘书股、物价股、计算财会股、采购股、供应股、服务股，门市分采购、百货、土产食品、生产资料、民族特需品几部，成立马帮局为其运输机构，与当地农业社合作建立代销点，开办农具厂、农副食品加工厂等，[②] 成为除粮食外均有经营的“一揽子”公司。

1958 年到 1960 年间，受全国经济动荡的影响，德宏民族贸易工作也遭受创伤，出现盲目收购、供应商品质次品缺、忽视民族需求等问题。三年间，全州约 5 万边民外出，农业大幅减产[③]，民众购买力降低，且民贸公司商品价高质次，多数民众宁愿以“高出一倍的价格到国外购买”[④]，也不愿光顾民贸公司。对此，德宏民族贸易公司“想群众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尽力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1958 年，结合当地气候炎热的情况，芒市民族贸易公司从昆明北京饭店引进冰棒机，并请相关师傅指导生产，制作销售冰棒、冰淇淋等冰凉冷饮。[⑤] 1959 年，为满足德宏各少数民族镶金牙的需求，组织人员在潞西建立了德宏地区第一所国营镶牙店。[⑥]

与此同时，受“上山下乡”的影响，民族贸易工作队伍得到有效扩充。1958—1960 年间，大批外地青年穿过“南天门”[⑦]，来到边地德宏，为德宏民族贸易贡献了热血青春。例如，昆明中学生禄惠英心想为人民服务，就到莲山参加民族贸易工作[⑧]；大理白族青年杨发政在 1958 年下放劳动回家后，于 1959 年 9 月到德宏州商业局参与民族贸易工作。[⑨] 外地青年干部在贸易过程中，与边地各族“做好事，交朋友”，也吸收了大批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加入民族贸易工作中。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虽自身学识较低，但他们愿意勤恳地向内地知识青年学习。1957 年，初到梁河县民贸公司的景生富（傣族）既不识字也不懂业务，在老营业员段贤贞的帮助下，半年后他就学会单独经营 70～80 种商品。[⑩] 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多数还得到了奖励与提拔。1958 年，刚入民贸公司购销店工作的傈僳族女青年余美兰就被评为云南省财贸系统“红旗手”[⑪]。

---

① 关于德宏州贸易公司更名为“民族贸易公司”情况的相关记录，最早见于馆藏档案中：1953 年，云南省商业厅在当年的《贸易工作方针》提出：“已经成立或合乎条件即将要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地区设立民族贸易公司，从现有的地方贸易公司或土产公司改组设置。”因此 1953 年开始，德宏自治区贸易公司下属机构就开始称“民族贸易公司”。如 1953 年，盏西营业处改称“盏西民族贸易营业处”；1955 年，瑞丽贸易支公司改称“瑞丽民族贸易支公司”。（资料来源：德宏州档案馆藏：云南省商业厅档案《1953 年民贸的方针和任务》，档案号：39－2－4－1；保山档案馆藏：保山贸易公司档案《盏西民族贸易营业处生产收购价》，编号：BS－2－B－28－31－23；《瑞丽民族贸易支公司 1955 年生产收购价》，档案号：BS－2－B－28－93－24。）

②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1957 年瑞丽县商业局关于民贸工作的总结》，档案号：39－2－21－6，《陇川县贸易公司历年民贸工作情况总结》，档案号：39－2－21－12。

③ 中共德宏州委党史征研室编，《中共德宏州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 5 月，第 16 页。

④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1953—1963 年关于小额贸易情况的资料》，档案号：39－1－24－4。

⑤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218—221 页。

⑥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319 页。

⑦ “南天门”是从龙陵县到德宏州需要穿过的一个地方。关于其地理位置，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中述：“南天门为滇缅公路芒市至龙陵路段上的一处断崖天堑。”该地应位于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与保山市龙陵县交界地带。

⑧ 禄惠英：《扎根边疆干革命》，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编委办公室，《中共德宏州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89 年 7 月，第 147 页。

⑨ 杨发政口述资料，陈思洁整理，2015 年 12 月 8 日，采访于德宏州芒市州商务局家属区院内，采访人陈思洁。

⑩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商业局档案：《梁河县商业局 1957 年民贸工作总结》，档案号：39－2－21－5。

⑪ 《一朵永开不败的山花》，德宏《团结报》1959 年 11 月 3 日，第 860 期，第 3 版。

1956 年到 1959 年间，德宏民族贸易受到一定挫折，也在曲折中得到一定发展，分工明确的“一揽子”公司成立后，民族特需商品得到专门经营，贸易队伍得到有效扩充。德宏少数民族较多，与外面联系紧密，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完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事关少数民族群众国家认同感的增加和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的威信的确立。

三、繁荣发展：德宏民族贸易机构的健全（1960—1965）

1960 年 8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全国经济开始恢复，德宏民族贸易工作也得到发展。1961 年末，公司牌价基本与境外市场价格持平①。1962 年 9 月，“边六县”民贸公司组建成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州民贸公司”），统筹“边六县”国营贸易工作。

州民贸公司建成后，即刻根据“边六县”实际，对区域内相关工作进行统筹规划。首先，继续恢复和扩展 1960 年前的业务，恢复各公司、商店企业核算制度、“送货下乡”服务与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1962 年，成立公私合营的州饮食服务公司，经营的项目除基础的饮食业外，扩大到旅社、理发、照相和修理手表、收音机等。1962 年至 1963 年底，各县城、主要集镇等均设立饮食服务业共计 116 个网点，其中饮食业 65 个、服务业 51 个。② 其次，改善经营方式。一是改良储运，如从前因储藏不善，民贸公司红糖被群众戏称“牛屎糖”，改良后，红糖受潮问题解决了，群众购买增加；截至 1963 年底，全州改进了 17 条路线，节约运费 11678. 40 元。二是统一各商店营业规范，给各店商品统一标价、对小铁农具实行“三包政策”（包用、包修、包换）、降低零售起点、延长营业时间、提升营业员服务态度等。三是建立贸易货栈，开展物资交流会。根据市场价格调整商店牌价，摆摊推销积压物资。③ 此外，继续壮大民族贸易队伍。至 1963 年底，德宏州民贸系统已有本地民族干部 305 人，占全部职工的 15%，其中，担任州公司经理的 1 人，正副科长及县公司经理的 7 人，县公司正副股长、商店正副主任级的 14 人。④

经过上述改良，1963 年至 1964 年间，公司营业额得到有力提升。

这一时期，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也有了显著发展。据参与德宏民族贸易的杨发政老人回忆，1960 年，为恢复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州商贸局曾专门组织人员到德宏少数民族村寨了解当地民族的需求，对供应民族特需品的经费、品类进行实地调研。⑤ 经过调研后，德宏民族贸易商品经营得到有序恢复。对于一些当地民族曾到缅甸购买的商品，贸易公司也组织人员到内地工厂订购，如 1961 年到昆明锻造厂组织生产的缅式板锄“受到欢迎，不久进口钢锄被取代”⑥。据统计，1964 年底，在德宏民族贸易机构的努力下，全州主要生活用品与大部分少数民族习惯使用的进口商品已为国货所取代，包括“塑料拖鞋、卷烟纸、肥皂、钢精锅、蜡烛、白力士胶鞋、包头巾、昆钢板锄、元羽绸、民族花布、杂色府绸等”⑦。笔者从吃、穿、用三方面将其归纳为表 2：

---

① 保山市档案馆藏：梁河县民族贸易公司档案：《梁河县民族贸易公司 1961 年物价工作年报》，档案号：BS－40－B－02－79－6。

②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1950～1964）》，档案号：39－1－8－9。

③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 1963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7－4。

④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50 年至 64 年）》，档案号：39－1－8－9。

⑤ 杨发政口述资料，陈思洁整理，2015 年 12 月 8 日，德宏州芒市德宏州商务局家属区院内。

⑥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8 页。

⑦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1964 年度德宏民贸工作总结》，档案号：39－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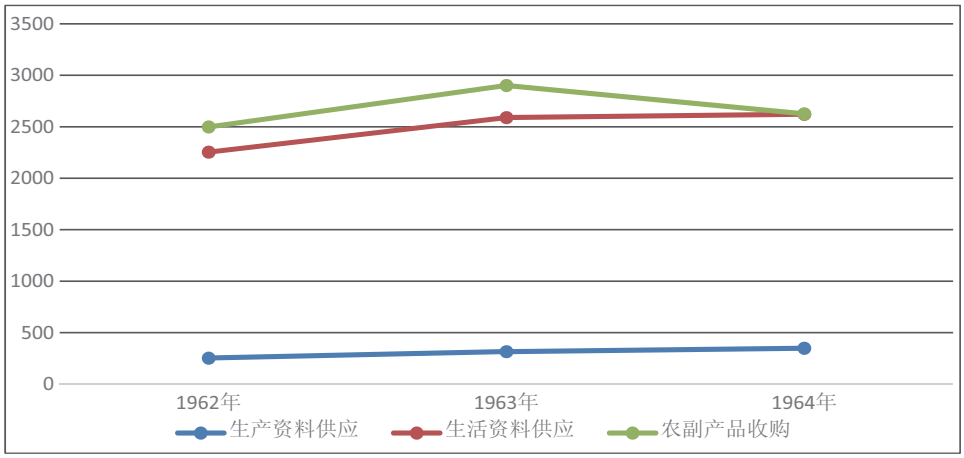

图 1　1963—1964 年德宏民族贸易经营情况

（资料来源：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 1963 年工作总结》《1964 年度德宏民贸工作总结》《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1950—1964）》，档案号：39－1－7－4，39－1－8－3，39－1－8－9。）

表 2　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民族特需商品

食品类	服装类	用品类
米酒、茶叶、六子、砂咀、干鱼、卷烟纸、烟丝	棉纱、棉布中元羽绸、元贡呢、新条府绸、杂色府绸、大小花羽吱、大小花贡呢、孔雀花布、花麻纱、杂色香港罗元布、紫布、士林、各种绸缎、呢龙衣、乳衫、各种民族服装、提花浴巾、皮鞋式女胶鞋、白力士鞋、白网球鞋、女带胶鞋、人字拖鞋、毛头套、腰带、细毛线、熟羊毛等	布伞、铝锅、银首饰、羊皮伞、丝线、金线、银线、棉毯、披巾、小红毯、小斗笠、椰子油、民族筒帕、电筒、电池、刀带、掐刀、靛精、进口锄头、蜡烛、发蜡、香水、镀锌铁皮水桶、铝古等

（资料来源：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1950—1964）》，档案号：39－1－8－9。）

经过改良与完善，德宏州民族贸易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截至 1965 年底，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共设立州级贸易公司 1 个，县级公司 6 个，中心商店 39 个，购销商店 89 个，代购、代销店 109 个，合作商店 12 个。此外，商业职工增加到 2000 多人；收购的品种达到 210 个，包括农副土产和药材、各类农具等；饮食网点有 116 个，涉及食堂、理发、照相等业务，民族贸易网已经逐步健全。此时，德宏州从主要集镇到大小村寨，都有商店与代销店分布，社会主义国营商业机构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四、民族贸易与人民政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德宏民族贸易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贸易机构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利用市场规律，逐步建立起从仅有 8 人的芒市贸易组到 2000 余人的现代化国营公司，在帮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商业建立和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并直接影响到了人民政权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确立。

从机构建立上看，作为国营经济的先头部队，民族贸易首先进入了德宏，率先建立起国营经济机构。在贸易过程中，其深入山区，与各族民众建立起了牢固的经济关系，使“国家的公司”

“共产党的商店”为民族所熟识。1956 年 6 月德宏州供销社依赖民族贸易公司成立，1957 年德宏州商业局建立与民族贸易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①] 此后，逐步从民族贸易公司分出食品、医药、土特产等专业公司，社会主义商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健全。

从经济生活上看，民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新中国成立前，边疆不少山区少数民族仍处于“结草而屋、刻木记事，生活极形简单，鲜与市尘往来”[②] 的生活状态，生活物资多购自返缅商贾，交易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贸易队以“肩挑马驮”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地，低价或贴本供应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并以公平交换或优价购进民众的土特产品，使得底层民众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外，民族贸易公司对“边境小额贸易”商品和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满足了民族群众的特殊需求。

从社会发展上看，民族贸易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与转型。近代德宏经济极度依赖缅甸，商业发展迟滞，工业为零。虽然清末干崖土司刀安仁从日本归国时曾“购置机器，聘请专家”，在盈江“兴办小工厂，但不久在清政府干涉下倒闭”。至民国末期，仍是“大宗工业全无”，仅有几户“做工拙劣”“不臻精巧”[③] 的小手工作坊，多数山区仍处“刀耕火种”的社会状态，农具落后，“烧山”的原始耕作方式相当普遍，还有“一片火红连起来的一道风景”[④]。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贸易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在贸易过程中积极扶持农业生产，优价向当地民众收购土特产品，以刺激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低价供应农具，“派技术人员进行指导”[⑤]。当农民无资金播种时，配合政府发放农贷、供应大米和谷子。[⑥] 此外，民族贸易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在当地建立起一批工业企业，如与有打制铁器的工艺传统的少数民族合作，建立了芒市农具厂、户撒农具厂等；依靠德宏盛产菠萝的实际，建成了芒市菠萝蜜饯厂，制作菠萝干，销售到内地。[⑦] 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引进与工业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德宏“工业全无”的面貌。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贸易的发展进程直接影响着人民政权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建立。德宏与缅甸一衣带水，新中国成立前，双方经济社会处于“流动的经济与文化”，“内疏外密”是当地人对其社会状况的总结。同时，由于近代缅甸曾经属于英国殖民地，为争夺在滇势力范围，英缅殖民者时常入境动摇少数民族上层与民众。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贸易机构切实“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减少了边民外出购买物资的频率，使其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考虑的党”![⑧] 同时，与各少数民族“做好事，交朋友”，为其服务、与其交好，吸收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进一步来说，当地少数民族的加入，对于民族贸易公司知晓当地民族的需求，与各族的贸易交流提供了很大便利，有利于消除德宏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为 1953 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的建立、1956 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

①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5 页。

② 龙云：《指令莲山设治局长谭其第呈报到任后整理庶政情形鉴核由》，《云南民政月刊》1934 年第 7 期，第 8—14 页。

③ 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31—140 页。

④ 曾昭抡：《缅边日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7 页。

⑤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自治区贸易公司 1955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2－10－8。

⑥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瑞丽贸易支公司 1952 年工作总结》，档案号：39－1－1－4。

⑦ 《芒市菠萝有销路》，德宏《团结报》1957 年 8 月 15 日，第 211 期，第 2 版。

⑧ 德宏州档案馆藏：德宏州民族贸易公司档案：《德宏州解放以来民贸工作总结（1950—1964）》档案号：39－1－8－9。

结语

1965 年，随着 5 月小额贸易停止，12 月云南省政府宣布民族贸易公司利润不纳入地方预算，[①] 云南民族贸易工作步伐放缓。但为保障边区群众所需，德宏州民贸公司仍然在艰难维持工作，如 1968 年全州交通受“武斗”阻碍，食盐供应困难，州民贸公司采取逐级分配，组织人力、车马将食盐送至群众手中。[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是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商业的体现，一方面更是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需要。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民族贸易机构在边疆民族地区赔钱供应商品、优价收购农产品、经营民族特需商品和边境小额贸易，将党的温暖送到了边疆民族群众的家中。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期的各个阶段，民族贸易也跟随节奏积极发展。土地改革时期，民族贸易机构在各“直过区”建立商店，改变了“过去山区的群众为买一瓶油，要走半天”[③] 的情况；“农业合作化”时期，与农业社合作订立收购合同、创办加工厂、建立代销点。[④] 最终，国营经济在与外来经济的“博弈”中取得胜利，转变了边疆“内疏外密”的历史经济状况，维护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此外，民族贸易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也吸引了大量边疆少数民族加入，培养出大批边疆民族地区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笔者在德宏地区调研时，就遇到了两位由民族贸易工作转行到政府商业、财经部门的少数民族干部。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完全改变了解放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设治局机构汉族官员占多数的情况，不仅维护了民族团结，更是为建立边疆民族群众认可的人民政权贡献了巨大力量。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德宏民族贸易工作开展之艰辛与社会影响自不待言。此后，德宏社会开始逐渐转型，并有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如今的德宏已然一座沿边开放、民族团结的现代化城市，也是云南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的前沿城市。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机构在德宏的工作意义匪浅：一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需要了解当地实情，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二是在边疆民族地区要尊重民族习惯，团结各少数民族；三是要结合边地特点，正确处理与邻居国家的关系；四是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干部，筑牢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基层建设工作的基础。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1—12 页。

②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商业局编：《德宏州商业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第 13 页。

③ 范镇华：《设立代销点方便群众购销》，德宏《团结报》1959 年 10 月 18 日，第 3 版。

④ 姜家周：《盈江民贸公司发挥主动精神上山下乡与农民订预购合同》，德宏《团结报》1958 年 7 月 19 日，第 3 版。

统战理论与实践

费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经验与启示

杨春华

（楚雄州委统战部，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在国内、国际都产生广泛影响，各有关高校开设的社会学专业、研究机构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聚焦解决问题困难的调研导向，还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的调研立场都与费孝通先生奠定的开拓性学术之风具有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担负历史责任，克服各种困难，反复深入农村开展“田野调查”，成就《云南三村》著作典范。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调查中展现出来的执着精神、务实作风和科学方法，为后来者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撰写调研报告等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调研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32－06

有一座社会学研究高峰令人景仰，有一个田野调查典范值得学习，有一种调查研究作风须予传承，它就是社会学著名论著《云南三村》的作者费孝通先生创立的调研工作标杆。《云南三村》中的两部《禄村农田》和《易村手工业》，是费孝通先生深入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大北厂村、李珍庄村深入调查后取得的重要成果；《玉村农业和商业》是费孝通先生安排其助手张之毅先生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中卫社区（玉村）深入调查后取得的重要成果。“不搞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①]，近年来，楚雄州委统战部从重视和加强统战调研工作出发，组织课题组 3 次深入大北厂村、李珍庄村走访，查阅禄丰县文史资料和《费孝通全集》，也深入到玉溪市的“玉村”进行了调研采访，探寻费孝通当年“田野调查”的“秘诀”。课题组成员在调研工作中深感费孝通先生站位高、专业化、接地气的调研思路、方法和作风，对做好新时代调研工作大有裨益。

费孝通先生于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8 月间，肩负学者责任，先后两次深入禄丰县金山镇大北厂村、恐龙山镇李珍庄村（在《禄村农田》中分别称“禄村”“易村”）开展调研。在累计 110 天的调研中，先生徒步 100 多公里，走访 310 余户农户，访谈 1400 余人，最后形成 34 万多字的《禄村农田》，为深刻解答他所提出的“如何改变土地制来改善农民生活”“改变农业大国的贫穷面貌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等重要问题，提供了颇具针对性且说服力极强的确凿实证。

一、“禄村”“易村”调研的基本做法

费孝通在禄丰市“禄村”“易村”开展“田野调查”期间，扎根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坚

作者简介：杨春华，中共楚雄州委统战部宣传调研科科长、四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

① 央视网：《李维汉：“不搞调查研究就没有饭吃”》，2012 年 7 月 2 日，http://news.cntv.cn/20120702/100709.shtml，2021 年 1 月 31 日。

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农户、田间地头，以解剖个案、“小题大做”、刨根问底的“小切入”方式，深刻剖析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农村土地制度“大问题”，其做法具有典型性，值得借鉴。

（一）聚焦时代问题

1938 年秋，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国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内地战事频繁，于是他从越南绕道来到云南，任教于云南大学。到云南大学任教后不久，他便向熊庆来校长报告要到禄丰开展社会学调查，并得到熊庆来校长的支持。关于到禄丰调研的初衷，费孝通后来在《云南三村》序言中说：“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为了解决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实地调研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我从自己的实践中坚定了这种看法。”① 费孝通之所以选择到“禄村”开展调研，一方面是“禄村”籍同学王武科的介绍，另一方面是此前费孝通就做了一些功课。他说过，当时“关于云南农村状况的参考书，最普通的是 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丛书《云南省农村调研》……这是一篇 5 年前的旧账。……就想根据这篇旧账和 5 年后的情形对照一下，主要看这一段时间，内地农村中有什么重要的变化，所以我们挑定‘禄村’，因为这是在旧账中（有）纪录的”②。由此可见，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变化，是费孝通开展调研的内生动力。后来，费孝通在“禄村”调研时，发现以经营土地为主的“禄村”农民的“日子还是不好过”，而乡村手工业应该是农民生活的最有效补充，得“寻找一个内地手工业发达的农村来为以农田为主的‘禄村’作比较研究”。有一天，费孝通发现张大舅不知从何处买来几捆土纸，正挑往“禄村”附近的街上卖，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张大舅向费孝通讲述了土纸产地（“易村”）的情况。1939 年 10 月，费孝通和张之毅两人先后通过乘车、骑马、步行的方式，历时 9 天，最终找到“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撰写了《易村手工业》。

（二）扎根社会底层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调研期间，白天经常与村民一起掼谷子、点蚕豆、赶集市、放牲口，或者和老人“冲嗑子”、同孩子聊家常，夜晚则经常在火塘边听村民讲“贩盐”的艰辛、听“外来劳工季候性的接济”的苦衷，或者“算五家支付估计清单”“日常生活费用分析”，研究“鸦片的消耗”，探讨“上门姑爷”的生产生活状况。费孝通吃住不是在房东家，就是在破庙里。而今“禄村”“易村”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事情，讲得出一起吃住、一起劳动的故事。在“禄村”“易村”，费孝通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从丈量土地开始研究土地制度问题，从入户了解村民家庭经济收入及分配状况开始探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

（三）悉心解剖“麻雀”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的调查涉及面极为广泛，收集资料丰富翔实。比如《禄村农田》共涉及“某家借款清账”“22 个月保公所收款清单”“禄村各年龄组需米数”等 28 份表格，内容涵盖农作日历、劳力估计、外来劳工数目、团体所有田分配等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③ 比如，“养生送死关节上的费用一表”就细列了“禄村”的“婚”“丧”“小孩满月”“做斋”“做寿”等费用支出共 98 项。在逐项列表研究之后，他深刻指出：“这类费用是最大的支出”，“农民储蓄很不容易，既有这种持续的大额支出，很快可以把农民所有小小的积蓄，一次吸

① 费孝通：《云南三村·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 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0 页。
③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 页。

尽。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又比如，费孝通选择“禄村”街子作为调研对象，做了细致观察和记录：街上一共有 51 个卖主，其中 12 个是本村的，主要卖盐、烟草和凉粉；11 个是城里来的，专门贩卖布匹及洋货；13 个是其他的少数民族，主要卖柴禾。后来，费孝通对“禄村”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据李珍庄村的张国春老人回忆，“费先生当年到村里搞调研，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比如，去到每家都会问粮食收获多少、产出多少、劳力付出多少、籽种支出多少，最后算出实际收益，得出粮食生产盈亏的结果，再得出整个村子粮食生产的基本结论”。费孝通在《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中，对街子、运输、家畜豢养、土纸制作、无田新户、流浪劳工等 32 个典型个案进行了透彻分析，从中得出了可靠结论。

（四）力求追根溯源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的调研，综合运用座谈、走访、做表格、实际丈量田地等方法，系统了解调研对象，反复研究搜集到的资料。比如，他以“禄村”的蚕豆和水稻作为调研对象，列出农作日历表，标注气温和雨量，进行综合观察分析，最后得出“水稻和蚕豆是极适宜在该地生长的农作物了”的结论。又比如，关于“农田单位”，他通过调研认为，“禄村”的农田单位是工。为了弄清楚“一工田究竟是多少亩”这个基本问题，他带人实际去丈量田块，后经反复推算，最后得出了“1 亩合 2.6 工”的结论，为深化“禄村”农田调研清除了“拦路虎”。

二、“禄村”“易村”调研的主要经验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开展“田野调查”时，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佳话。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运用。

（一）和村民打成一片搞调研

对于费孝通先生当年先后两次深入“禄村”“易村”开展调研的事情，村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架子，和大家打成一片”。据李珍庄村马有能介绍，费孝通先生在“易村”开展调研时，专门请张正美帮忙做饭，还经常请张正美带着他们到离“易村”三十余里的易门县城买米、买盐、买菜。平日里，他白天和村民们一起劳作，夜晚则入户了解村民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禄村农田》里的生动记述，印证了村民们的回忆：“我们就在街心里和他们攀谈起来。远客到来，更添上一番热闹。相识不到几分钟的小学校长，坚邀我们去（吃）便饭，我们虽婉言谢绝了，可是心里却留着‘丰年留客足鸡豕’的余味。”“后来，我们住久了，知道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旁抽烟谈笑的，农忙也忙不着他们。”[①] 比如“经常邀我们去过节的张大舅”“常和我们背行李的老佟”、生意上好的“女巫”、靠算命为生的“瞎子”、豆腐店的小老板、房东家的女帮工、“上门的姑爷”，等等。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是到村民中去、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一线调研。

（二）亲民而不扰民搞调研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调研的日子，始终坚守一条原则——绝不给村民添麻烦。比如，在“易村”调研期间，为了不给房东马德显家添麻烦，他主动搬到村后的土主庙里居住。村民们怕他住在破庙里不安全、生活也不便，就请他回马德显家住，可他坚决不同意，最后又到村前的文昌宫里居住。又比如，他多次叮嘱为他做饭的张正美绝不能在村里冒出炊烟之前生火做饭，以免造成“他搞特殊”的不好影响。他既坚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又坚决做到不扰民、绝不给村民添麻烦，在“禄村”“易村”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也给自己留下了美好而珍贵的回忆。他后来回忆起在“禄村”“易村”调研的经历时，深情地说：“这段生活在我的一生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是值得留念的”，“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是敬民亲民、问计

①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于民的一线调研。

（三）用钉钉子精神深化调研

费孝通先生在“禄村”“易村”的调研过程中，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每一个人物的跟踪调研都力求弄清其家境、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等状况，对每一个个案的研究都力求深入透彻、探究本质。比如，1938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3 日，他第一次到“禄村”开展调研后，觉得很多问题还未完全搞清楚，便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又再次到访“禄村”，体现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和执着。又比如，在“禄村”调研中，遇到村里的张大舅从“易村”贩卖土纸来“禄村”街子上出售，便决定去“易村”研究手工业发展情况。他在深入“禄村”“易村”开展调研并形成卓有成效的调研成果后，仍不停留在成果发表和出版上，而是积极向当时的中央政府、当地政府部门建言，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是服务国家建设、螺旋式提升的一线调研。

（四）根据实际变化持续调研

在深入“禄村”“易村”调研之前，也就是 1936 年 7 月至 8 月，费孝通先生深入江苏吴江的开弓村（在《江村经济》称“江村”）调研，形成了《江村经济》（1939 年在英国出版）。而在禄村调研中，他认为“江村”与“禄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土地制度不同、农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同，但在劳动力过剩、小农经济意识浓厚等方面却是相同的，要承认它们之间的异同，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对策。关于“禄村”调研，1938 年 11 月他初访“禄村”时已是暮秋，正是农闲季节，因而没有看到村民大规模劳作的场景；1939 年 8 月他再次到访“禄村”时正值夏末，正好弥补了上次调研的遗憾；1990 年 5 月他三访“禄村”，是为了考察禄村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重点关注乡村工业的发展，将禄村的塑料厂和 1984 年在苏北淮阴市耿车乡看到的同类工厂进行了对比分析。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是聚焦聚力同一主题、持续追踪研究的一线调研。

三、“禄村”“易村”调研对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启示

追寻费孝通调查研究的足迹，学习费孝通调查研究的精神，汲取费孝通调查研究的经验，关键要从中获得积极有益的启示，为开展统战领域工作的调查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一）统战调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回顾费孝通先生的“禄村”“易村”调研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为了解答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他致力于调研中国乡村的强大内生动力。他之所以经年累月跋涉于从“江村”到“禄村”“易村”，从沿海到边疆的调研之路上，是国为他决心要把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分析研究清楚、透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贯穿他全部调研活动的鲜明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领导干部要提高包括调查研究能力在内的七种能力。当前，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三个更加多样”“四个前所未有、四个艰巨繁重”的形势任务，统战调研工作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着力点放到新的时代方位和统一战线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中来科学谋划、推动落实。当前，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十四五”时期统一战线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科学编制“十四五”统战工作规划提供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结合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完善和发展统一战线制度体系的重大问题，着力推进统战工作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要重点研究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方针、广泛凝聚思想政治共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主党派成员、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港澳台海外人士的活力；要重点研究当前工作中有哪些重点难点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如

何评估。基层统战部门要重点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如何有效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如何有效构建，组织部、统战部协作配合机制如何健全完善，以及如何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如何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各族干部群众思想灵魂深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促进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二）统战调研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在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中提质增效

80 多年前，费孝通先生深入“禄村”“易村”调研，沿途崇山峻岭，土匪出没，可谓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进发。住村蹲点调研中，他先是独居村后的破庙，后又独守村前的文昌宫，坚持既生活在群众之中又不给群众添麻烦。调研结束后，他认真撰写、数易其稿，力求调研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体现了他以调研为武器、“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的职业操守和价值追求。其不畏劳苦、勇于探索的作风和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精神，深深教育、启迪和感召着后人要开展好统战调研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新时代的统战调研工作要大力弘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调研之风，不解决问题不罢休、不推进工作不撒手、不促成效果不换频道，努力开创调研质量更高、成果明显转化、难题得到破解的统战调研工作新局面。当前，统战调研工作要注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正确客观全面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关注统一战线范围扩大、对象增加、统一战线成员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等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开展分门别类的系列调研，提出完善政策举措的意见和建议，为各级党委抓好做实新时代统战工作当好参谋、助手。

（三）统战调研必须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在追本溯源中认识把握规律

综观费孝通先生深入“禄村”“易村”调研的经历，可以说，其调研过程、成书过程、成果转化过程，是在中国大地上、在解剖麻雀中寻找答案的过程，是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过程。费孝通先生这种求真务实、严谨科学的作风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当前，统战调研工作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研机关，又要调研基层；既要调研干部，又要调研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把握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比如，宗教工作调研就必须深入宗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家里，像费孝通先生当年在“禄村”“易村”调研那样，蹲住足够时日、问访足够群众，才能厘清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获得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方法。又比如，民主党派工作的调研，就必须深入民主党派成员所在的单位，深入民主党派机关的每一间办公室，深入民主党派成员的家里，和他们深入交心谈心，才有希望找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

（四）统战调研必须坚持调查与研究并重，推动调研成果立得起站得稳

费孝通先生的《禄村农田》共 12 章 61 节 34 万多字，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这得益于他扎实的田野调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深入透彻的研究。他十分欣慰地说：“如果本项研究，作为对中国农村现存境况的分析，能够为将来的正确选择做出贡献，我们将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调研组认为《禄村农田》的重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结论上，也体现在分析方法中，许多分析给予人有益启示。比如，他在《禄村农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修订完善书稿的记述：“1939 年的上半年，我在云南大学担任一些功课，未便长期离校，所以利用这时间，把材料整理成文。我曾以这初稿请教各师友，前后又改写了好几次。同年 8 月 3 日我乘暑假之便，又去‘禄村’做第二次实地调查，一方面校核我已有的论据，一方面考察一年来‘禄村’经济的变迁情

形。同时，我因为怕自己或许所见有偏，所以偕同张之毅和张宗颖一起到实地观察。我们反复校订。一再考核，经两个月，到10月15日结束回省。根据这次复查的结果，我又把原稿重写了一遍，至1940年1月才完卷。”从简短的文字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用功之深、研究之严谨。他何以两次深入“禄村”“易村”开展调研，何以耗时110多天，何以用尽“写调研纲目”“亲身出马”“开调研会作讨论”“自己做记录”等调研方法，答案只有一个：为了调研结论可靠，能对国家建设有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谈调研研究》一文中指出：“从目前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有调研不够的问题，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可能更突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研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统战调研工作要摒弃重调查轻研究的现象，下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的功夫，下足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的功夫，切实做到在分析中出思路，在研究中出成果，让调研成果立得起、站得稳。

费孝通先生深入“禄村”“易村”调研的经验还启示我们，要加强统战调研工作制度建设，提升调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强化跟踪问效，通过督促、问责等措施，推动统战调研工作扎实开展；要加强考核激励，坚持把统战调研工作纳入统战工作计划和年度目标考核，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开展统战调研的积极性；要不断创新研究机制，形成“以统战部门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以研究课题为纽带、以组织推动为手段”的统战调研工作新格局。另外，要加强统战调研工作人才培养，着力在统战系统中培育一批理论高手、调研能手、文字强手，打造一支思想政治过硬、善于调查研究、文字功夫扎实的调研人才队伍，为开展好统战调研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责任编辑：念兴昌

“互联网 + 统战宣传”：助推云南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

李应伟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信息中心，云南 昆明 650228）

摘　要：重视运用网络开展统战宣传工作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必然要求。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成为统一战线宣传政策、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探索创新的重要渠道，运用网络开展统战宣传是适应统战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迫切需要，是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统战网络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宣传模式创新、宣传体系构建、宣传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做好新时代云南统战网络宣传工作，要立足云南实际，发挥区域特色和优势，建立多元立体化融合的宣传模式，推动网络宣传制度化发展，打造“三懂”网络宣传人才队伍，构建大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格局，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

关键词：互联网 +；统战宣传；网络宣传；大统战工作格局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811（2021）02 －0038 －06

统战网络宣传，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网络开展统战宣传，在理解统战网络宣传之前，我们先了解网络统战的概念，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写的《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明确，“网络统战是指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传统与现代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等特点的统战工作。”[①]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意义在于，发挥好网络优势，在网络世界中通过一定的共同价值理念，将网民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共同建设幸福生活的目标下，通过价值认同，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一、占领统战网络宣传新高地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必然要求

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是网络统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方式和手段，统战网络宣传的意义就在于自觉占领统战领域网络宣传的新高地，形成线上线下互动的“同心圆”，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一）统战网络宣传是适应统战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②]从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的定位不难看出，统战工作是一项不可低估、不

作者简介：李应伟，硕士，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信息中心干部，“云南统一战线”门户网站责任编辑。

①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年，第 60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 年，第 3—4 页。

容忽视、不可或缺的工作，面对新时代网络技术发展实际，利用互联网延伸统战工作触角，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打造统战网络宣传新格局，构建网络同心圆就显得极其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就多次强调：“信息化工作很重要，我们统战干部要有互联网思维，必要时要建立大数据，这样才能提高统战的信息化水平。同时要注重网络宣传，自觉占领网络宣传的新高地，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用信息化的手段发挥统战部门的积极作用，要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方面有所贡献。统战工作要创新，要重视运用网络平台扩大工作的覆盖面，提高统战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善于运用新媒体，线上互动，线下交流，使互联网成为联谊交友、开展统战工作的新平台。”① 统战网络宣传是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新的统战宣传方式，统战网络宣传是对统战工作、宣传意识形态工作和网络信息化建设工作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和反映。

（二）统战网络宣传是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互联网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网络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联系交友、诉说困难、行使监督的重要渠道。统战系统许多工作领域的联系对象都与互联网关系密切。许多党外人士基本是“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无事不网、无处不网”，年轻一代基本上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状况、工作学习方式与网络密不可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9. 86 亿，较 2020 年 3 月新增手机网民 8885 万，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 7%。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7. 43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203 万，占网民整体的 75. 1%，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 7. 41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466 万，占手机网民的 75. 2%，我国已经成为新媒体应用第一大国”③。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民主协商、民族宗教、涉藏涉疆、港澳台等统战工作领域，日益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现在已经出现了网络宗教、网上“自组织”“自媒体”等新情况新问题，网络的动员聚集能力不容忽视。达赖集团、“三股势力”和境外反华分子把互联网作为渗透的重要手段，网络已经成为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重要阵地。我们要充分认识网络对统战工作的现实和深远影响，把探索运用网络开展统战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要求我们用好网络传播新技术，开展好统战网络宣传工作，争取统战工作的网络阵地和网络主动权、话语权。

（三）统战网络宣传是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互联网 + 统战”是网络时代统战工作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统战工作的模式方式必然随之发生改变，统战的网络宣传模式也必然服务于统战工作的模式转变，统战工作要自我创新和发展，要自我革命和转变，就应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做到“由被动接受互联网的挑战转变为主动融入并发挥互联网对统战的支撑作用；由互联网向统战工作领域的渗透转变为互联网与统战工作的深度融合与发展”④；由“只做不说”的工作模式转变为“既做又说”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

① 孙春兰：《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事业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统一战线》2015 年第 7 期，第 4—7 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2014 年 2 月 27 日，http：//cpc. people. com. cn/big5/n/2014/0227/c64094 - 24486402. html? ivk_ sa = 1024320u，2021 年 5 月 21 日。

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 年 2 月 3 日，http：//www. cac. gov. cn/2021 - 02/03/c_ 1613923422728645. htm，2021 年 5 月 21 日。

④ 康莹：《“互联网 +”背景下网络统战工作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27—29 页。

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争取人心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要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目标，就要最大范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当前，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为统战工作提供了便利，同时统战工作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现实，就必须适应于网络时代的创新性。统战网络宣传恰好就是统战工作顺应网络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统战网络宣传工作在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同时，及时准确将统战工作的各领域工作宣传好，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好，利用网络讲好统战故事，这就是工作模式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网络运用的深入，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和各种矛盾会通过网络来表现，尤其是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优势进行渗透和攻击，统战在这个过程中，就更应该发挥作用，主动占领网络舆论的主阵地，团结和带领新媒体人士、网络意见人士、自媒体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等，引导网民理性发声，理性应对，进一步扩大统战的话语权和优势作用。当前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改进和创新工作方式、模式，把握好网络宣传的核心，发挥好网络宣传的优势，引导好网络宣传的舆论导向，网络已然成为统战成员参与政治协商、建言献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各抒己见，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对于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统战部门可以发挥优势，向广大统战成员征集意见建议，形成行之有效的提案或者方案，供领导决策，如期实现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效能。伴随网络新技术带来的新思维、新机遇、新挑战，无论是顺应形势的发展，还是处于统战方式方法模式的自我革新和创新，统战网络宣传都需要与时俱进，发挥优势，主动融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具有特色亮点的网络宣传发展新路径，开创出统战网络宣传的新局面。

二、云南开展统战网络宣传工作的现状

目前，云南全省中已有省委统战部、八个民主党派、省民宗委、省工商联、省社会主义学院以及 10 个州（市）、9 个县（区）统战部建立了门户网站，省委统战部、八个民主党派、省民宗委、省工商联、省社会主义学院以及全省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统战部均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实现了统战系统微信公众宣传平台在省级统战系统以及全省各州（市）、县（市、区）的全覆盖。目前，全省统战网络宣传工作的基础就是实现全省全覆盖的微信公众平台，近 200 个微信公众平台为全省统战网络宣传提供了有效载体，为统战网络宣传提供了重要的提质增效契机，全省统战系统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用“统战 + 互联网”的信息宣传方式，初步形成了省、州（市）、县（市、区）统战网络宣传的联动覆盖和集群效应。统战网络宣传工作的多元网络宣传格局在各级部门已形成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态势。

云南统战网络宣传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2014 年，“云南统一战线”门户网站建立，全省统战系统网络宣传正式拉开。2017 年，全省 16 州市、129 个县（市、区）统战部都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实现了全省统战部门微信公众号全覆盖。截至 2018 年，全省统战系统已经建立近 200 余个微信公众平台，实现了统战系统微信公众号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统战系统网络宣传平台建设取得了许多显著成绩，但是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一）自主宣传意识不强，自我创新意识不够

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做人心工作，是争取人心的工作，一方面，对于统战网络宣传工作，大多停留在“只做不说”的思维，没有与当前新时代网络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不仅仅要争取现实生活中的民心，更要争取到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人心。只有充分利用好网络宣传平台，将统战方针政策、统战信息传递给每一位受众，用网民喜闻乐见的“网言网语”，增强网上凝聚人心的吸引力和引导力，发挥好统战的优势和作用。另一方面，统战工作涉密程度高，领域宽广，长期以来的固化思维让统战工作者对统战网络宣传“望而却步”，宁可不上网，不宣传，就怕出差错，所以缺乏必要的自主宣传意识，形成了被动宣传和被动接受的局面，阻碍了网络统战工作的开展，也极大削弱了统战网络宣传的力量和优势。与此同时，由于统战部工作的政治性、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导致统战网络宣传受限多、说教性强、思路僵化、方法单一等，统战网络宣传的自我创新意识不够，不善于运用网言网语，还不善于运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视频、音频以及图片等形式，语言枯燥，

让人“味同嚼蜡”，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下降，单向宣传多、互动交流少，忽视了与受众的交流和互动，网络宣传缺乏自我创新意识，与被读者和受众存在疏离感，容易被更具创新性的网络新媒体所代替。

（二）宣传手段单一，宣传体系欠缺

传统的统战宣传基本上依赖于电视、报刊、会议等载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前网络发展迅猛，传统的宣传平台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要，虽然网络平台有所推广和运用，但是存在用户少、范围小、互动少等问题。同时，传统媒介所反映出来的是受众被动接受，不是主动接受。在自媒体时代，受众更需要双向交流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单向传输，统战对象范围广，具有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等特征，涉及领域宽，他们与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综合运用传统手段与现代网络技术将更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促进工作发展。同时，宣传手段的单一，直接影响了统战网络宣传的广度，也影响了统战工作开展的深度。此外，还缺乏一个以统战系统为中心的内外网络资源统筹联动机制体系。这个体系的目标就是统筹联动，整合省级民主党派、民宗委、社会主义学院等统战系统单位以及全省 16 州市 129 个县市区的统战信息，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全方位的统战网络宣传体系。横向上，通过加强同级统战系统单位、同级本地宣传部门、宣传媒体的统筹联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服务共享，纵向上，加强对州市县区统战部门的统筹联动，形成集中宣传、形成声势，构建新闻素材与线索一体化的选用报送机制，在宣传主题、宣传思路、宣传选题、宣传方式、宣传节奏等方面形成强大合力，融合新媒体、自媒体等扩大宣传效果，营造出良好的统战网络宣传舆论生态，助推统战工作全面发展。

（三）服务功能单一，队伍力量不足

就目前来看，统战系统的网络宣传平台基本上停留在以统战理论方针政策、统战工作信息、统战会议的宣传为主，属于信息类宣传性网络平台。一方面，在服务功能上，各地州统战系统的网络宣传平台基本没有进一步开发运用，没有与统战各工作领域的服务需求结合起来，理论性、实用性、实践性、运用性相结合做得不够。这就需要在以宣传方针政策为主的形势下，重点突出运用性和实效性，在政务公开、为民办事、公众参与等方面建立网上渠道，融合宣传和服务功能为一体，更加凸显统战网络平台的效能。同时，还需要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通过统战工作者、统战对象、网络人士、自媒体人士、新媒体人士等，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净化网络环境、弘扬主旋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正能量，形成全省统战网络宣传工作“一盘棋”。另一方面，统战网络宣传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省统战系统网络宣传的任务和责任主要集中在统战部门的办公室、宣传调研等职能部门，仅有少数统战部建立了信息中心，由专人负责网络宣传和信息化工作，但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工作，懂统战、懂网络、懂宣传的人才较少，缺少稳定专业的网络宣传队伍，组织队伍力量明显不足，严重制约了统战网络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云南构建大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格局的策略选择

云南处于祖国的西南边陲，是我国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和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三个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足以证明云南对于我国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云南省陆路边境线全长 4060 公里，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临近。处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时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统战工作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统战形势愈发紧迫，抓紧、做强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一）立足于云南省情统情实际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这也是云南的特殊省情，“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是云南历届党委政府的共识。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其中有 15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民族

工作地位极其重要，是云南统战工作的“重头戏”。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对我国开展西化分化活动日益猖獗，且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手段日趋多样，尤其是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利用所谓民主、人权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云南担当着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斗争前沿阵地的重任，统一战线在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上责任重大，需要发挥更大作用。正是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省情，使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络及时广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网络世界占领和守牢统战宣传和意识形态阵地，宣传好主流意识形态，讲好统战故事，最大限度凝聚边疆人心，汇聚发展伟力。要通过网络统战宣传，鼓舞各族人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心，弘扬互帮互助、交融共赢、时不我待、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二）构建多元立体化融合宣传模式

统战的宣传工作是为统战的工作对象以及统战自身建设需要服务的。在统战的网络宣传模式上，要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相统一，注重一致性的引领，同时发挥多样性的特色和优势，让统战的特色亮点精彩纷呈。统战网络宣传具有舆论导向作用，同时，也是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相互联系的桥梁纽带，统战网络宣传要做强新时代统战宣传的新平台、新阵地、新渠道，就必须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宣传模式，多元立体化综合展示统战领域各方面特色亮点，充分彰显统战优势。一是注重正向引导，及时准确发布统战权威信息。发挥互联网优势，第一时间将中央、省委关于统一战线的系列最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每一位受众，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到最权威的信息。要抢占时机，主动作为，不让谣言有可乘之机，统战的优势在于我们所画的同心圆的大小。二是秉持“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理念。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五大宗教齐全，八个民主党派全有，还是五大侨乡之一，是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统战工作领域众多，各地统战工作不断出新出彩、亮点纷呈。云南统战网络宣传秉持大统战意识和观念，以融媒体理念力求利用最新的网络科技手段全力助推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在采编方面，深刻挖掘统战资源和统战特色亮点，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将云南统战故事讲好，讲深，讲出温度和激情。在传播方面，对于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向各领域、层次传播“一杆子到底”，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广泛、深入传达；融合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种媒体，以多元立体化的方式和“全景广角”视野，将云南在统战领域的实效、经验和生动故事宣传出去。云南统战网络宣传要在云南党委统战和宣传部门领导下，依托“云南统一战线”门户网站、微信平台的统一调度下，形成上下联动网络宣传机制，在统战宣传的“时”和“效”上做足功夫，形成合力。各州市、县区结合自身特色亮点，在把握一致性正确导向的前提下，发挥各自的平台和资源优势，开展统战网络宣传，从而形成上下一盘棋。

（三）全力展示和助推云南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目的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地区发展的中心工作，通过凝聚人心，汇聚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美好生活的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地区发展贡献统战的力量，汇聚全民族共同发展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提出的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三个定位，就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中心工作。当前，结合省委省政府 16 州市现场办公会议精神，统战工作应该与当前的重点工作相统一，统战网络宣传也应该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积极发挥统战优势和力量，营造出百花齐放的统战宣传效应，全方位展示、助推云南各地大统战网络格局构建。要进一步把统战宣传工作和云南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优势和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各有侧重。例如，昆明市应结合打造中国春城、国际大健康名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曲靖市应结合先进制造基地、高端食品基地、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云南副中心城市建设；迪庆州应结合世界的“香格里拉”这一主题；怒江州应结合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昭通市应结合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排头兵、滇东北开发开放新高地；临沧市应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建设；普洱市应结合绿

色经济示范区建设；楚雄州应结合打造滇中崛起增长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丽江市应结合打造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玉溪市应结合滇中崛起增长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将这些地方特色主题贯穿到统战工作中，围绕这些主题建言献策、汇聚人心、凝聚力量。统战工作围绕地方特色发展实际，彰显统战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作用和优势，再通过统战的网络宣传模式、平台展现出来，扩大统战的凝聚力、影响力，提升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能力。

（四）持续推进制度化建设，把牢正确宣传导向，确保信息安全

制度建设是保证工作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统战网络宣传工作也是如此。缺少规章制度的保障，统战信息安全必难以确保。必须建立全方位、严格可靠的规章制度，确保信息宣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一是应制定全省统一的《统战系统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办法》，从信息源头，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管理、信息监测、信息预警、信息应急等各方面强化、细化管理，通过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责任人、责任单位，确保信息安全可靠。二是加强技防手段，对于重要的统战信息类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在后台程序中植入自动识错纠错、敏感信息自动筛查、统战元素自动识别、信息采用基本情况等功能，进一步增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管理的方式方法。再次，建立健全统战网络宣传机制，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在网络宣传方面，统战部门有自身优势，但是往往停留在各自为政的层面，缺少统一、定期、高效的统战网络宣传和保障机制。建议建立统战网络宣传联席会，形成由省委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工商联、省侨联、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中华职教社、省社会主义学院、主流报刊杂志社等共同参与的统战网络宣传联席机制，定期研判网络宣传的重点、难点，商讨统战网络舆情的应对等等。最后，建立网上舆情监测、处置、反馈机制。统战工作具有特殊性，统战网络宣传工作同样具有特殊性，在开展统战网络宣传的过程中，要从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国家稳定的战略大局出发，建立突发事件、统战热点难点、敏感问题、敏感信息等的网上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完善网络舆情监控和舆情分级处理机制，制定重大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做到“早发现，早疏导，早预防”，将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逐步形成统一部署、协调配合、灵活敏捷、高效畅通、行之有效的网络舆情收集处理反馈机制。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功能和作用，在确保信息安全高效传播的同时，充分调动统战工作者、统战工作对象等的积极性，提高统一战线在网络舆论正向引导方面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五）打造“三懂”网络宣传人才库

宣传队伍解决的是什么人来做统战网络宣传的问题。打造优质高效的统战网络宣传人才库，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懂网络、懂宣传、懂统战的“三懂”专业人才。现实工作中，懂网络的人才、懂宣传的人才和懂统战的人才都不少，但是，既懂网络，又懂宣传和统战且能将三者结合的专业人才并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精准发力，精心打造一支真正“三懂”的统战网络宣传专业队伍。首先，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起延缓或者加速作用。统战工作的主体是统战工作者，所以“三懂”人才的培养必须以现有的统战工作者为基础，不能脱离现实而另立门户，必须紧紧依托这支队伍进行打造。其次，要注重发挥融合发展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同当地、同级网络新媒体合作，充分发挥融媒体的积极作用，同时注重发挥新媒体点多面广、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广的优势，通过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把我们自己的主体队伍与传统媒体、新媒体结合，创新统战工作方式。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画出最大、最美网络同心圆。再次，加强统战网络宣传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定期举办专业培训班，邀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媒体人员、网信办工作人员、高校网络宣传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等开展专题理论和实践培训，提升统战网络宣传队伍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打造出具有云南特色的统战网络宣传“三懂”人才队伍，扩大云南统战的网络影响力，为讲好云南统战故事、传播统战好声音作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新时代统战视角下的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研究

李熙春

（中共保山市委党校，云南 保山 678000）

摘　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一个民族团结奋进、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保山市是全国重点侨乡，也是云南省第一大侨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保山市老一辈华侨华人的淡出和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崛起，新生代华侨华人群体迅速壮大，专业人士数量持续增长。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的复合性共生共融共存文化，是东南亚文化圈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新时代，我们要充分发挥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以侨为桥，以文化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心聚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关键词：新时代；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文化向心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44－06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篇章，中国正走在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基础越来越扎实、目标越来越接近。与此同时，中国从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两个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渴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两个目标的实现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凝聚起强大的民心，画出最大的同心圆。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①]，在凝聚民心、团结力量上起着重要作用。同理，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活的样法”，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心中是一种共同的文化印记和精神纽带，是心相通情相近的文化基底。基于此，在新时代统战视角下对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对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保山市华侨华人的概况和特点

华侨华人是祖国建设的特殊群体，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华侨华人为祖国统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文化传播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重要的团结力量。保山市 50 多万华侨华人对保山市经济社会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是新时代保山市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和合文化”和所住地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行走在不同文化之间，是融合了中华文化和所住地文化的新文化的创立者、传承者和传播者。

基金项目：2019 年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立项课题“新时代统战视角下的云南省华侨华人文化研究——以云南省保山市为例”（2019SYXTB08）。

作者简介：李熙春，保山市委党校文化与科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① 房丛明：《浅析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商品与质量》2011 年第 10 期，第 200 页。

（一）新时代保山市华侨华人概况

相关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达到62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数量已经超过4000万，占全球华侨华人比重的64.51%。[①] 保山市是全国重点侨乡，也是云南省第一大侨乡，保山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有50.41万人，约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0.8%，他们分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居住在缅甸和泰国。[②] 所以侨情一直是保山市最大、最独特的市情，保山有着独有的侨乡文化和侨乡精神。曾经，保山的华侨华人为了生存而“走夷方”，饱受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艰辛和苦难，但也时时牵挂着祖国的发展，并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今天，随着祖国的日渐强盛，在促进祖国和所住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方面，他们依然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为世界更了解真实的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获得自身发展的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③] 保山市的华侨华人对祖国发展的贡献，不仅仅是单向的“做贡献”（如捐赠做慈善公益事业等），更多的是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合作、互利、共赢的双向互动。

（二）新时代保山市华侨华人特点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和改善，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情感和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保山市的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状况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最显著的就是老一辈华侨华人的淡出和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崛起。保山市新生代华侨华人大量集中在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该群体呈现规模迅速壮大、专业人士数量持续增长的特点。近年来，这一群体中回国人数稳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分布更加分散、成分更加多元，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跨国公民、“两栖”侨胞日益增多，在住在国参政意识和维护族群权益的意识增强，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另外，海外传统的侨团、侨校、侨报等渠道出现许多新的情况。

1. 老一辈华侨华人逐渐淡出，新生代华侨华人成为发展主体。进入21世纪，许多早期“走夷方”的华侨华人年事已高，逐渐从所从事的事业中和侨社侨团中淡出，二、三代华侨华人成为其社会群体中的主力和主体。华人比重增大、华侨比重减少，出现了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老一辈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乡梓情怀、故国情结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出现弱化的趋势。由于生存和教育环境的差异，新生代华侨华人在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上，也呈现出代际消退的趋势，情感的浓烈程度不如前辈。

2. 新生代的华侨华人综合实力普遍增强。随着新移民的补充和“华二代”“华三代”等数量的不断增加，华侨华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实力普遍增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专业技能水平也从最初的初级向中、高级发展。华侨华人从业领域的覆盖面正不断扩大，其从事的行业门类涵盖物流、跨境电商、酒店管理等多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商务、医疗服务、航空业、电信业等领域。从文化层面看，新生代华侨华人相较老一辈华侨华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完成了高等教育，拥有良好的教育基础，文化水平有了整体的提升，逐渐从一代“契约华工”过渡到二代、三代的“职业白领”，也有一些成为社会精英和商界巨头。

3. 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有所提高。随着整个华侨华人群体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组织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社会形象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对所在国家的

① 孙雨：《新时代海外华侨华人统战工作研究——基于对海外华人华侨和归国人员国情认知状况的调查与思考》，《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31—36页。

② 数据来源：保山市侨联。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48页。

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地位有所提高。随着祖籍国中国的逐渐强盛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保山市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心也逐渐增强，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活动，为华侨华人群体争取更多的政治权益。二是舆论宣传方面的中国话语权有所增强。随着新生代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他们成为推动华文媒体发展的生力军。从创办华文报社、播音电台到创办各类微信公众号，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在当地华人社会积极发声，引导主流社会舆论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为中国形象的传播创造了更多的条件。三是华语学习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对华文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许多国家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的国际传播迎来了新时代，汉语正迅速走向世界。中国目前已和“一带一路”沿线近 130 多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一方面为汉语学习热潮奠定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创办华校，开设孔子学院、学堂，开展华文教育，为新生代华侨华人更多地理解和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形象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4. 新生代华侨华人文化和价值观多元，思想独立意识增强。相较于老一辈的华侨华人，新生代华侨华人随着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存在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适应并融入了居住国的意识形态之中，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本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多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并左右着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他们与祖籍国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血缘亲情的联系。

总之，由于血缘亲情的关系，加之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的逐年提升，绝大多数华侨华人仍然保有着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亲近感，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理念以及对中华文化认同、对自身身份、民族的认同等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民心相通依然任重道远。

二、新时代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发展现状

作为陆疆侨群，保山市华侨华人“走夷方”的历史悠久而悲壮，中华民族勤劳且富于开拓精神的气质也在异域的土地上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扬。新生代的华侨华人身上有着父辈的气质，但同时也深深地烙上了异国的印记。故国已是他乡，他乡已是故乡，叶落归根不再，只能是落地生根。“云南省籍华侨华人共有 208 万，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 6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集中了 200 多万。”① 而保山籍华侨华人有 50 多万，约占全省华侨华人总数的 24%，分布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90% 居住在缅甸和泰国。这部分人尽管有着中国的血脉，但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和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视与封锁，我国侨务政策的调整，政治身份的转移等，他们的文化已发生质的改变，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共存的趋势，成为一种复合性的文化构成。

（一）存在多元文化融合共生格局

由于世界市场的建立，普遍交往成为常态，马克思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世界文化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作为共生载体，对民族文化、本地土著文化、西方文化等众多文化形态选择性地加以保留和吸收，形成了由多种异质文化交流融合的综合性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改善共生环境，努力培养传播主体文化的自觉意识，既主动斗争争取，又加强沟通，为中华文化的本土化传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他们的文化不

① 杨永平、何作庆：《云南陆疆侨乡和华侨华人——以云南滇西地区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

可避免地受到生存地生产生活条件的影响，既不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当地文化，而是两者兼有的文化。这种文化格局正好契合了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的，“我们要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① 所以，“中华文化最大的利益就是与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来。”②

（二）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根亲文化认同面临挑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影响着社会存在。许多老一辈的华侨华人，都有在祖籍国生活多年的经历或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籍国的一切已成为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的山山水水等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元素曾经是他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自小就受着中华文化的教育、感染与熏陶，中华文化已经留存在他们的血液里，铭刻在他们的骨子里了。这些因素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精神文化基因。尽管远在他乡，中国仍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所以他们的根亲文化认同是非常强烈的。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支持祖国、帮助祖国。

新生代的华侨华人由于受父辈的影响，他们虽然对中华传统文化、对祖籍国有一定的亲近之情，但他们一出生就受到东南亚国家主流文化的浸染和教育，其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都在发生着迁移，因而他们更多地认同所在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现阶段，80%—90%的华侨已成为外籍华人，政治身份的转移，谋生手段和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是的认同出现逐渐弱化的情况，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双重文化认同、多元文化认同以及呈代际减弱趋势。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维系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交流、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华侨华人增强对中国认同感与向心力的内在动能。现在，新生代的华侨华人一方面在逐渐融入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原本的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中华血脉又使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与居住国的人们之间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所以，这一切就使得新生代华侨华人出现了根亲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也为我们统战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三）汉语依然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渠道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中国强大起来而出现的新一轮汉语学习热潮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泰国有着良好的华语华文学习的基础，因为这两个国家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华侨华人。但是由于新生代华侨华人大多在居住国出生成长，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群体的华文华语水平与祖辈相比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耳濡目染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更不可能与其祖辈相比。华语华文的弱化和缺失，导致他们在思想意识、行为习惯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现出了中华文化的断层。

保山人民和在缅甸生活的保山籍华侨华人有着无法割裂的胞波情谊。尽管缅甸的华文教育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拥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华语华文在缅甸的发展情况却不是很顺畅，即使在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缅甸的汉语传播也没有想象中理想，一直滞后于其他国家。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缅甸的华语华文教育被边缘化，靠民间力量办学，特别是依靠在缅甸的华侨华人的力量开展华文教育，从长远来看，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难以打开局面，取得成效，这种情况从缅甸国内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的创办情况就可以看出来。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缅甸进行国事访问，中缅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进一步“弘扬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

①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19年5月16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16/c64094-31087252.html，2020年5月16日。

② 乐黛云：《关于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2015年11月6日，https://cul.sohu.com/20151106/n425505933.shtml，2020年11月6日。

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①]。中缅两国关系的调整，也为在缅甸开展好华语华文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保山市应抓住这一机遇，主动而为，为华语华文的传播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目前，保山市华侨华人中有近 90% 居住在泰国和缅甸，所以泰国也是保山市重要的侨务工作地区。与缅甸的华语华文开展情况不同，泰国华语华文传播教育在进入 21 世纪后空前高涨，这也是中泰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华侨华人蓝皮书（2019）》指出，泰国已经建成 12 所孔子学院和 11 所孔子课堂，华语华文教学范围迅速扩大，学中文的人数成倍增长，中文已成为泰国除英文外的第二大外语。泰国已经有 3000 多所学校开设了华文课程，有将近 100 万的汉语学习者。华语华文教育在泰国发展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曲折起伏，巅峰低谷，逐步走上了正常的健康发展轨道。华语华文的学习已经成为中泰双方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纽带。[②]

总之，汉语热潮的出现不管背后的原因如何，语言的交流、思想的交融、文化的传播依然是新生代华侨华人补齐中华文化断层的契机和载体。保山市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机遇，创造条件，引导新生代华侨华人通过语言学习而走近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世界，增强文化自觉。

三、发挥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某种文化元素的传承和习得一般是通过文字、语言、习俗和信仰等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是民心相通的一道桥梁，中华 5000 年文明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精神和魅力，既是凝聚侨心、弘扬文化、传承价值的重要纽带，也是华侨华人向住在国充分展示祖籍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重要共生载体。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的复合性共生共融共存文化，是东南亚文化圈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新时代统战工作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发挥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的积极作用，以侨为桥，以文化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大同心圆。

（一）树立“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随着交往程度的加深其发展历史终将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必将彻底打破各民族、各种文化间的相对独立状态，民族文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而，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将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渗透排斥、融合重构，从而保持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奔涌向前的必然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要客观地来看待保山市新生代华侨华人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认同变迁现象，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国际影响，多渠道多方式推动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族群意识提升，积极帮助他们建构中华文化的民族认同，形成文化自觉，同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出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③] 另一方面对于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我们也希望他们既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要抛弃他们固有的华人身份和对中华文化应有的情感，平衡好所在国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从而成为增进中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④] 同时也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和祖籍国同频共振，

---

①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2020 年 1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18/c_1125478225.htm，2021 年 6 月 30 日。

② 张怡：《华侨华人蓝皮书（2019）》，2019 年 12 月 20 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1912/20/WS5dfca964a31099ab995f2da0.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

③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2019 年 5 月 16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16/c64094-31087252.html，2020 年 5 月 16 日。

④ 丁和根：《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新闻界》2017 年第 9 期，第 76 页。

充分地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开拓创新，进一步扩大文化共生载体的影响力，促进国内国外华侨华人文化交流互通

相关研究表明，在象征中华文化元素的符号中，书法、功夫、旗袍和长城是最受华裔认可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但是他们对这些文化元素符号的熟悉程度却远远低于他们的认可度。[①] 同样的，对于侨居海外的保山籍华侨华人来说，由于国与国之间政策、交通、文化和语言通达程度的限制，他们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元素的认知也不能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程度，更不用说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了。保山籍的新生代华侨华人对承载着保山市厚重的侨文化的载体，如梁金山故居、和顺图书馆、益群中学、昌宁县柯街华侨农场、“极边第一城腾冲”“和顺明德女子学堂”等，以及保山市的饮食、节庆、习俗、中医等，也存在日渐陌生的状况。对此，一方面，保山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要尽量采用新思想、新方法，充分挖掘这些文化载体的经济价值，拓展新型文化产业业态，与时俱进地开发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人们需求的新的文化产品，充分利用目前政策的利好优势，发挥保山市区位优势，扩大双向开放，建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文化窗口；另一方面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要克服“重传统、轻当代”的思想，摒弃文化自卑心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积极扩大这些文化载体，如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具有侨文化特色的标志性人文交流品牌，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化，讲好中国文化故事，讲好华侨华人故事，让更多的新生代华侨华人既能了解中国文化元素，也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文化自觉。

（三）以语言学习为载体构建共建共享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学习平台，强化多元文化的对话与沟通

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往往被视为某种族群身份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华语一般来讲是定义华人的关键因素之一，语言是华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侨华人之间、华侨华人和祖籍国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汉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近几年，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与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的“民心相通”，我国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进行积极的政策和方向性的引导，建立了许多跨境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平台，如开办孔子学院、孔子学堂，举行“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汉语桥比赛等。保山市同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华人和华人社团、华人学校和华人媒体等社团组织可以通过官方、媒体、智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开展丰富多彩的语言学习、文化交流合作，拓宽双方语言学习和文化产业合作的领域，构建语言学习的共建共享机制。一是保山市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强与华侨华人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东南亚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搭建汉语学习的重要平台；二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建设需求，联合培养双边所需的“汉语 + 专业”复合型人才；三是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效结合，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构建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华文媒体共同体”，精心合作打造侨文化产业，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四是构建教育共享机制，利用保山学院与华侨华人居住国的友好学校、侨团侨社以及相关教育机构等共建汉语教学师资库，做到优质资源共享。

在新时代统战背景下，保山市由于独特的区位和独特的侨情，处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区域，更需要为保山市积极主动地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发挥好辐射作用，充分发挥保山市区位优势和中华文化价值作用，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合力。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陈奕平、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64 页。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协商民主：“共和”话语中的文化与实践

吕承文

（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共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文化，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实践，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在“共和”话语语境中探析协商民主问题将会是深入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进路。在百年共和历程中，协商民主被诠释为全国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政治制度形式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国情历史因素，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共和取向的混合政体，但在不同的中西共和文化差异中有不同的语义理解。协商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强调制向共和的转变，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其灵魂取决于何以实现混合政体。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下最终体现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实现阶级依赖的政治理性集中体现。

关键词：协商民主；“共和”；话语；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50－10

“共和”话语的基本内涵是整个社会中全民共同建设、推进政治发展的政治活动和现象，既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也是一种政治现实实践，可分为社会共和、阶层（阶级）共和、民族共和等内容，在制度层面则表现为不同的规则体系，此即“共和”的经典（古典）定义——“全民的公共事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以来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理想的追求，近代以来旨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是一种保护型共和主义理念，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更是一种谋求全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型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①]这说明共和主义理念的实现可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社会通过沟通与对话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在大多数政治学学者看来，协商民主恰好是旨在追求积极达成社会共识的民主类型。由于共和主义历来与民主制度密切联系，或者说民主制度是实现共和主义理念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古典的直接民主，还是近代的代议制民主，抑或是协商民主，都在塑造着现代不同的共和国类型。本研究更关心在“共和”话语语境中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及其相互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协商民主：作为“共和”语境下的政治文化

共和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堪称西方历史上在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双重压迫下痛感精神极端不自由的人们用来彻底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追求人格平等与幸福自由的美好政治理想，直至后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法治化研究”（16BZZ013）。

作者简介：吕承文，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政府。

① 英国学者戴维·赫德将民主分为保护型和发展型两种，区分的标准是依据民主制度对公民利益的态度——权利保障还是利益增进，所以，西方经典民主制度大多是保护型民主，旨在保障公民权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则是发展型民主，旨在增进公民利益。笔者考虑到共和制度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所以也由此划分出保护型共和主义和发展型共和主义。具体参见［英］戴维·赫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58 页。

又被君主专制的反对者演绎成为各种政治原则，比如，民主代议、法治分权、精神自由等，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民思想觉醒，各大君主国均陷入人民革命的旋涡之中。一个个共和国在西方世界诞生，并直接将共和主义从政治的文化层面推进到了实践层面，从此共和主义又可称为共和制、共和国、共和政体，诸如此类。而且，“共和”在内涵上是一个含盖了共和主义、共和制、共和国等一切相关政治现象的指代词，也是政治学中的专有词汇。共和主义理念是共和制的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共和国建设则是共和制（制度）的政治实践形式。共和主义是实质的“共和”理念，其直接衍生出作为形式的“共和”的共和制与共和国。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是理想国家的一种形式、一种“道德典范”……它们要么是关于一个理想未来的梦想，要么是关于一个想象的过去的乡愁。[①] 共和理念也因此被赋予了制度的灵魂，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形态。共和制度在制度层面上体现和反映了共和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并与民主、法治密切关联。其中，由于民主分为多种类型，这意味着共和制度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民主理论及类型，并演化出不同类型的共和国。从政治学上来看，尽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性理论，但不可否认理论自身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只是在不同的国情条件需要考虑相适应的实践方案。

（一）历史进程：共和国与政治协商会议

共和政治作为“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色彩，或者说根本上是以中国自身问题出发，由固有传统演化而来。西方文化主要起到某种刺激与示范的作用”[②]，它的优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构的优势；二是理念本身的合理可行性。[③]“共和”无疑是一种从西方飘洋过海而来的全新政治理念，清末被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君主专制的替代语。事实上，连西方人自己都承认，在英语中，没有哪个单词比共和主义更难理解了。[④] 而且，我们也很好奇，这种西方一脉承续的政治术语怎么会被当时的国人翻译成“共和”呢？

古代汉语是一字一义，因而“共和”则是“共”与“和”的合义。能够打开我们共和理念的思维光华的，也许只有那个西周时代“公卿相与和共政事，号曰共和”（《竹书纪年》）之事纪，这显然在具体指代上区别于西方，它意实为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共）与实行仁政（和）的综合，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在本质上它还是专制体制。[⑤]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两者实不可同日而语。”[⑥] 事实上，《正义》引《鲁连子》的那句原话是：“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走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和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和复归国于卫也。”西周“共和”行政虽然与西方“republic”（原本基于城邦基础上的“共和国”）基本在同一个特定时期平行而过，但是由于二者没有各自的思想交叉点，所以秦汉以后日益集权的中国与罗马之后分封割据的欧洲很难找到文化的语义对等性。然而，自清末更制革新以来，人们在西方列强的文化压迫下又不自觉地把二者联系起来。于是，这个古代“共和”，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关我国上古的政治社会生活的种种思考与遐想。西周末年，“共和”既是这个特定时期的代号，又是贵族联合执政的

---

① Norberto Bobbio, Maurizio Viroli: *The Idea of the Repbl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 11.

② 高端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③ ［澳］菲利普·佩蒂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④ 约翰·亚当斯：《约翰·亚当斯致沃伦的信（1807 年 8 月 8 日）》，载刘训练《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51 页。

⑤ 冯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日］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560、1583 页。

⑥ 主张复辟君主政体的劳乃宣（1843—1921 年）曾于《民是报》刊发《共和正解》，赞扬君主政体，攻击共和政体。其立论的根据，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属君主制内部的一种修正方案，而非独立的政体。“宣王即位，共和罢。《索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此共和一语所自出也。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夫君主立宪，有君者；民主立宪，无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之解哉？”这显然是一种非学理性辩论。参见上引冯天瑜文。

象征（无论是周召二公辅政，还是共伯和摄行天子位）。[①]“共和”之后，宣王复位，帝制回光。

现代汉语是一词一义，“共和”可以引申为现代政治术语中的专有名词，但是根子还在西方所言必称的古希腊古罗马源头那里。“共和”在中文语法中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专有名词，但是作为“共”与“和”的复合政治词组，我们应当从历史与文化中挖掘与还原出它更多的真实内涵，以形成一种能在中国社会民众的心里生根发芽的“共和主义”理念，并以此为理念基础来建设我们的共和政体。其实，从字面意义来看，“共和”应当寓意在“公共”之意的“共”字和“和谐”之意的“和”字所构成的结合意义之中。所谓“公共”，是为“公家，大家”，所谓“和谐”，是为“和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与“协商”有着极为相近的意思关联。“共”与“和”两字的合意，则就不难为我国民众理解。这折射出“共和”的“共同和谐”之直译，莫非是历史机遇的巧合？

共和主义与共和国密切关联。回顾中国近代史，时至中华民国初建，在政治发展上有诸多重大历史进步意义：其一，建立了共和国，尽管政体仍有待继续完善；其二，由传统帝制国家开始向近代民主国家转型；其三，中华文化作为主体文化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同和传承；其四，中华首次被官方确认为国号；等等。这在当时让国人何等激动与振奋。然而，就在 1912 年秋天袁世凯在与顾维钧的一次谈话中主动发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民国初年，共和是被革命党人以暴力革命形式引入中国的，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国家急剧转型时期，仍然为传统所束缚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主义不明就里，实属那个时代的正常现象。但是，袁世凯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竟然也不懂共和主义之真谛，其当然更不可能引领当时之中国走向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参看世界史，西方诸国只要建立了共和国的，通常为两类政体：一是英日的君主立宪国，二是美法的民主法治国。而当时的中国帝政初亡，中国人对皇权的崇拜与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帝制仍有复辟之风险，迷茫的袁世凯在拥帝属员（袁克文、杨度等人及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的鼓动下，竟欲把中国强行重新引回到君主立宪形式的帝制政体。当然，这场“称帝”闹剧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与讨伐中匆匆告罢。自清帝逊位后，共和在名义上虽始确立，却难得其实。历经袁世凯、张勋等复辟闹剧之后，中国又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一个不安定的国内环境极其有害于共和建设。反观历史，虽则中国今天已历共和百余年，任何君主专制在形式上已不再具有形成和存在的现实条件，但是共和脱胎而来的帝制母体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传统文化，至今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共和政体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任何形式君主专制的死灰复燃，在帝制传统悠久的中国，这一任务尤显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名之争是中国共和政治深度思考的击水之石。当时中共中央拟定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②]，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与张志让则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最终各方认同了张奚若的主张，认为民主和共和在西方语言里意思相近，无需重复，于是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③]。由此可知，具有礼制传统的国名之争既是理性探讨，又含有感性成分（当时，各方政治派别激情昂扬地争论新国名，都希望国名能彰显民主，也寄望于新生的共和国能切实贯彻民主思想）。新中国建立的首要政治要事恰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集中反映。这种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平台，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各界人民的政治协商与各族各界人民的参政、议政。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政治功能更多地体现在民主议事（参政议政）上，而民主监督功能相对较弱。事实上，民主议事与民主监督是两种

①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亦认为中国的“共和”之义在“贵族共和”的变体［王与马共天下（东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只是（西方）民主成分缺少（国立、国询、国迁都减少，让位于君主专制）。中国的“共和”是“王室与贵族共同执政”，源自西周某年的“共和行政”。请参见袁林：《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01 页。

② 中国政协文史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由来》，2019 年 11 月 18 日，http://www.cppcc.gov.cn/zxww/2019/11/08/ARTI1573185736977244.shtml，2021 年 3 月 1 日。

③ 张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历史渊源》，2019 年 7 月 15 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9/0715/c85037-31233296.html，2021 年 3 月 1 日。

类型的政治参与活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大背景下，不断完善人民政协的法律体系建设是突破人民政协法治化程度较低这一困境的基本思路。

在法治化进程中，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功能将寓于民主议事（参政议政）之中，以强化立法咨询功能来推进民主监督功能的完善，最终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中国“进京赶考”的历史任务并未结束。自改革开放（1978 年）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各项政治制度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也走到了新时代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期。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人民政协在理论、制度和实践等各方面必将获得更为深刻的新发展和新进步。70 余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断发展成熟，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理论和实践日趋丰富。从类型和涉及的范围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几乎深入到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我国协商民主主要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个方面。仅就其中的政协协商而言，就包含了丰富的协商形式和实践，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就列举了“政协全体会议协商制度、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对口协商和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制度”等制度化的协商形式，还提出要“通过视察报告、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等形式开展协商，整合现有网络资源，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

（二）文化比较：中西共和异同与社会共识

中西方关于共和政治追求在理念认识上尽管存在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但在追求建立和建设共和国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是在不同的政治理想认同指引下因地制宜地采取各有所异的政治建设方案。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西方共和主义观念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背景不同。这包括了国情差别、政治目标、历史任务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于西方自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邦国分权主义，中国自秦统一后走向了一条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道路，而这种历史传统如果利用得好会给共和国带来有利的条件，否则将变成沉重的历史包袱。家、国不分的一元体制在清朝灭亡后逐渐解体，当现代政党的出现使得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家、国分开），并开启了二元互动的社会体制转型局面。第二，理念基础不同。西方秉承的是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文明下的自由与权利的政治文化观，而中国政治传统是以儒家为主流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熔炉式文化，这决定了各自在现代对共和主义阐释的不同。第三，社会习俗不同。如果西方人在个人自由主义引导下看到的是公共生活，那么中国人在集体（家族、宗族、组织等）社群主义指引下得到的是个人利益，正是这种差别使得共和国治理者们在给本国人民宣传共和观念时需要谨慎使用政治智慧。（见表 1）

表 1　“共和”话语中西比较（该表为作者结合资料自制）

	政治背景	理念基础	社会习俗
西方	多元社会 分权传统 政教区分	古希腊民主观 古罗马法治观 现代宪政主义	自由主义 公共生活 公民美德
中国	一元化向二元化转型 中央集权传统 宗教不占主导地位	传统民本思想 阶级差序格局 儒家建构主义	家族、宗族、组织社群主义 个人利益观
共同之处：协商与沟通建构了共和政治的价值与制度的基础			

西方的共和制基因早在罗姆鲁斯兄弟在建立罗马城邦国家的协商过程中就确定下来了，正是这种协商形式（后被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解释为“契约”）将原先依附于氏族公社之上的血缘机制（世袭）彻底改造为地缘机制（选举），并在后来演化为西方罗马帝国的世界国家观时，同时也为西方的共和主义理念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与经验。文艺复兴后，西方绝大数国家才自然地由君主专制国演化为形态万千的共和国。无论中西在“共和”话语中强调何种政治价值观念，其

仍然有一个共性之处，即对社会中广泛共识达成目标的追求。与有所的国家类型一样，共和国也具有国家理论的共性特征——追求国家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所以，不管中西建设何种类型的共和国，二者都要在社会中建构关于共和主义的政治共识。当代共和国都是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在广泛的民主与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制度框架中追求涵盖人民主权的共和主义共识成了当代共和政体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

（三）政体建设：阶级混合主义与协商民主

罗马史学家玻里比厄乌斯在反思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得出了一个为后世学术界所共同赞成的结论：罗马在帝国晚期彻底抛弃了自身赖以建国并强盛的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不仅修复了古雅典直接民主的大众暴政“漏洞”（bug），也预防了罗马走向君主专制的危险。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包括的三种正常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恰恰是罗马混合政体建设的价值导向。古代中国对政治共识与阶级妥协有着迷般的自信，古人更加讲求和谐相处，反对“以暴制暴”，比如，三皇五帝的神话与大禹治水的传说实际上体现了古人为防止社会利益碎片化而有意将血缘机制（世袭）寄托于地缘机制以形成社会双轨制度，这恰为中国的家国同构的传统帝制社会奠定了朴素民本主义历史发展逻辑。中国朴素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基本内涵在理念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民主通常可分为古典的直接民主和间接的代议制民主，而协商民主除可以作为上述两种民主类型的一种实现形式外，似乎还为二者的沟通提供了第三种道路，在广大的公民个体与其代表之间架起了互动的桥梁，且当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主主义的民主传统①。所以，共和制度也可由此分为直接民主的共和、代议制民主的共和与协商民主的共和。直接民主的共和制度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代议制民主的共和制度侧重于议会对政府的控制作用；而在共和制度里，协商民主主张通过沟通与对话来建构社会共识。当然，在不同的民主理论和文化类型的作用下，共和主义理念实现的实际效果必然是千差万别的。

所有的共和国在政体建设方面都具有一个共性规律，即追求各个社会阶层和谐共处、相互依赖的混合政体；至于混合政体中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分配政治权力，那就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国情来具体确定。作为第三种道路的民主类型的协商民主强调政治共识，似乎与混合政体的政治价值观念更加契合。为此，美国学者约·埃尔斯特（2009 年）对政治协商民主进行了审视与反思。“协商民主”，结合二者的优点——协调大众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尝试克服前者的暴政性和后者的寡头性政治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较为广泛的次制度层面的政治试验，但尚未捍动得了代议－选举民主的制度范式。费什金（James S. Fishkin）则认为：“追溯到雅典民主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其民主制度体现了协商民主形式。雅典为许多关键的职能而使用了由民众选举的公民协商微观组织（deliberative microcosm）。”② 协商民主并非一种新兴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而是一种在不断发展的民主理论。在中国，协商民主最初是由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发展而来，最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马奔（2006 年）讨论了政治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缘起及发展。李贺林、左宪民（2008 年）和林尚立、赵宇峰（2016 年）等人重点研究了政治协商民主在中国共和制中存在于生根的基本规律与内生逻辑。因此，政治协商民主与中国的共和制之间到底具有何种关联、协商民主如何促进共和主义的政治实践？这些都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协商民主：作为共和语境下的政治实践

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进程中，共和国屡屡向帝制复辟和制度倒退，这是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同时，这在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现代所有的共和国都存在着制度上的不完善和不健全，需要通过长期的政治改革实践来摸索着改进与完善。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多元化成为

① 马德普：《人民同意与人民主权——西方近代以来两种民主理论与传统的区别、困境与误读》，《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47 页。

② Robert L. Simmon：The Blackwell Guid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2002，pp. 221—235.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纬度，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收入分配的增长、对外贸易的强度增加等因素，都在给协商民主提供着制度运行的前提和条件。[①] 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及其“白色恐怖”事实上引发了社会阶层的共识撕裂与利益碎片化，这为法国从第一共和国演化到第五共和国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学者们评论为“西方的中国”的法国到最后良莠不齐地抛弃了他们赖以建立法兰西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度，犯下了马克思所说的“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的历史错误。似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在法国共和语境中出现了话语障碍，后来建国的美国人则果断地修正了这种历史错误。这给我们当代中国的启示是现代共和国建设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至于采取何种民主制度，则完全需要视一国国情而定。

（一）协商民主肇始：帝制走向共和

在西方人眼里，只要能确保共和是“人民的公共事业”（公共利益）的终极目标即可。詹姆斯·哈林顿在《大洋国》（1656 年）中所述的“共和国”是亚里士多德式混合政体意义上的：“共和国既通过元老院而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通过人民大会而具有民主政体的性质，通过行政机构而具有君主性质，所以便是完美无缺的。”[②] 理论上的共和国首先要排斥君主单独执政模式，因为那正是西方人最为厌恶的君主专制（帝制）。作为共和主义或君主主义的制度形式，前者以美德为价值维系，后者则以荣誉为价值基础。帝制走向共和的政治媒介是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理性的沟通与对话，例如，在近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等级会议、近代中国的立宪会议等。虽然将共和话语引入到中国，是一个文化移植现象，然而，这种共和话语若不能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实际国情相适应，也断然无法成功。所以，“何以民主协商”“何人民主协商”将成为所有新诞生的共和国所必须着重思考的关键问题。

1. 协商民主价值：美德与荣誉之争

共和制由于美德的存在而使人产生道德羞耻心，学会道德自省（理性）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君主制则围绕君主生成荣誉，君主操赏罚大权、恩威并用，一切子民都变成具有被奴役心理的臣民，他们对荣誉（物质的或精神的）患得患失进而产生了对君主的恐惧与敬畏（“忠君”本质），这也是君主赖以统治的根本。区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理论目的是考察民主协商或者协商民主在这两种不同制度前提下实现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君主制的荣誉价值观虽然一度获取传统国家的认同，但其在近代的民主潮流下显得极其不合时宜。譬如，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路易十六召开的等级会议可能有协商，但缺乏真正的民主，最终导致 1789 年的大革命暴发。换言之，君主制下采取的荣誉维系统治体系，只会将国家认同直接转化成为对君主个人的忠诚，这一点与强调个人权利自由价值的民主主义完全格格不入（见表 2）。

表 2　维系共和与帝制的核心要素对比（该表为作者结合资料自制）

	价值维系	维系机制	制度联结
共和制	美德	道德自省	羞耻心（理性）
君主制	荣誉	恩威并施	恐惧心（忠诚）

共和制强调的美德，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美德，而公民认同的是现代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政治人物，这就不会与民主主义的权利保障价值观相冲突了。这就会让人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与共和国相对立的是君主国而不是贵族（或现代意义上的精英）国或民主国呢？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演绎为：为什么共和国要极力防范君主专制的复辟？君主可以通过个人的形式来操纵元首权，其具有不断蚕食一切政治权力的潜能。君主一旦侥幸获取专制权力，就会很容易迁就自身脾性而养成个人专制习惯，加之血缘世袭制的配套，会导致铲除君主专制的代价要比贵族（或精英）或平民专政大得多，也残酷得多。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制在政治内涵上与贵族（或精

① 吴进进、何包钢：《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 36 个城市的定量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84—94 页。

② ［英］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26 页。

英）国、民主国没有绝对的冲突，但与君主制之间的价值矛盾却完全不可调和。由此，在现代共和国里，荣誉将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即便是在君主立宪的共和国里（如英国、日本等），君主（女王、天皇）赐予的贵族头衔荣誉已经不是很重要的身份标识，但是，美德、知识却成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标志。难怪杰斐逊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固执地认为，血统已变得不重要，知识却会成为新的贵族。

亚当斯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1787—1789 年）一书中，承认共和国必须包含民主的成分，“宪法中没有一个民主的分支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但是反对把共和国理解为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认为共和国的原则是混合或平衡政府（宪法）和法治。只有在混合的、平衡的共和国里，民主协商才更有可能开始。一方面，共和国宣布民主主义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共和国由此更能实现社会宽容。这就为社会中通过真正的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共识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据此推断，较之于代议制民主，以混合的、平衡的政体观为价值导向的共和主义更倾向于协商民主。

2. 协商民主途径：代议与集权之争

事实上，共和政体受到贵族的精英与平民的大众权力（表现为议会）的制约，则会被迫隐藏其中的侵略性与专制性。贵族与平民是以集体的形式来操纵精英权或大众权的，是分权而不是集权，而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政治低效率显然比君主专制给人们的自由权利带来的危害要轻得多。共和国所致力于的是某种适宜形式的民主，所以也不能尽然铲除贵族（精英）或平民的民主因素。在西方，代议制首成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理论集成于约翰·密尔，修正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人类在政治实践中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共识是，代议制尽管可以最大化表现民主的价值，但是对于共和国作为国家的基本类型所要追求的政治统治秩序的价值目标而言，它又不能发挥出尽善尽美的功效。所以，法国人进行了五次共和国的政治试验，而美国人将建国之初的邦联制改造成了联邦制。这说明西方也并不排斥中央集权制。

同时在另一方面，实行共和还要把政治目标继续放在铲除帝制的不利影响上。自孙中山先生发出“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诛之”一语之后，当代中国社会对共和的政治认同已深入人心，传统集权制度的积极政治因素也会给共和政体建设带来巨大的制度能量。在铲除帝制传统消极影响方面，现在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强化共和主义的公共教育来实现彻底消除残留的王权思想与奴役心理的毒害。在实践理性和制度层面，一旦明确了协商民主在推进共和制度、防止帝制复辟的重要作用并使之贯穿、贯彻于整个制度架构和体系中，中国的共和政体建设就值得国人拭目以待。应当辩证地看到，中国帝制在历史上的长期存续和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王权思想与奴役心理的社会毒瘤，也在传统上贡献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因素。在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度里，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巩固，会给共和政体带来极为重要的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预见，只要中国能够彻底清除帝制政治的负面因素，就可以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基因来实现共和主义的政治理想追求。因而，共和国建设应当合理吸收传统集权制度的各种合理成分，使之释放出应有的制度能量。

代议与集权之间的争论仍然是技术层面上的，而并非存在于价值层面之中。代议制的久议不决困境和集权制的专制弊端都是现代共和国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制度问题。当然，代议与集权所共同要实现或维系的价值恰是政治伦理所要关心的核心——道德善的问题。在政治的伦理来源中，正义是其中的根本。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西方人也认为正义的政治是善的政治，反之就是恶的政治，扬善抑恶应为政治之宗旨。为了确保正义与善，政治衍生出了政治权威、政治理性与政治公共性等基本概念。政治权威，代表的是一种人们对权力的政治服从与认同，韦伯认为可分为人格权力（传统型与魅力型）与理性权力（法治）权威，在现代社会主要是后者，这意味着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运作的保障程度。政治理性之谓，意含理性主义，指的是人类运用理智排除感性与意志干扰的政治状态，也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一种共和主义政治理想。要实现政治理性，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解决代议与集权之间调和的技术困境，而这可以通过政治民主协商来得到有效实现。

在中国，人民政协践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其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协要发挥好其作为人民民主重要形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其履行职能全过程；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实现政协系统与政权系统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各项相关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综合效能，充分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两个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票决制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相得益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目标的协同推进。由此，不仅合理地解决了代议制的效率困境，也同时确保了中央集权制的理性权威，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制度建构与实践，为人类政治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协商民主灵魂：混合政体构建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经典政治学把社会主要分为君主、贵族、平民三个阶级，这严格来讲是一种混合了血统、经济、资源、文化、能力等因素的阶级划分方式，也是构成社会制度的阶级基础。那么，上述三种阶级的掌权与统治形式只不过展示了共和主义的不同实践类型。在人类社会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君主、贵族、平民背后所代表的精英因素和大众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实际国情支配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比例偏重情形。在长期存在过帝制社会的国家里新生的共和国中君主因素和精英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就更加浓厚，比如，法国、德国、中国、日本等；但社会在长期的分权思想浸礼之下的国家一旦走入现代共和国时代，就会一直受到强大的平民因素和大众因素的影响，比如，英国、美国等海洋（判例）法系国家里长期存在的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中央集权。无论如何，任何社会中的这三个广义的阶级及其精英因素或大众因素，都会在混合政体的制度框架中自然而然地走向协商民主。因而混合政体事实上成了实现协商民主的灵魂。

1. 协商民主的逻辑进路：政治公共性与混合政体

政治公共性体现的是作为公共意志力量的民意，是公共利益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共和状态下，社会三大阶级——元首、精英、平民使得政治权威、政治理性、政治公共性各自具有了相适应的主观载体。元首象征着政治权威，精英代表着政治理性，平民始终捍卫着政治公共性。三者之间的理性协商是构筑共和政治的通栈鸿桥。中国历来不缺乏象征君主的中央集权传统与代表精英主义的士大夫（知识阶层与官僚集团）群体，但是由于千百年君主主义对民本主义的践踏与压服，民权不得伸张，以致中国的政体建设容易滑向君主专制或贵族（士大夫）专权。而共和主义的理念与原则的初衷，更倾向于建构一种旨在使君主（元首）、精英（知识阶层与官僚集团）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形成平衡与制约状态的混合政体。而中国浓厚的中央集权传统决定了其更适合采取共和制这种混合政体，从而使元首这一元素得到合理保留与改造，使之从政治建设的对立面转变为有利因素。

表 3　共和制度建设与协商民主（该表为作者结合资料自制）

共和制度	政治目标	制度目标
	人民的公共利益	阶级的利益共生
	制度架构	制度运作
	代议制 + 阶级（层）之间的民主协商	效率与价值（公平）的实现

如表 3 所示，为了实现共和制度的人民公共利益取向，必须使元首、精英（知识阶层与官僚集团）、民众之间形成阶级利益共生状态（直接表现为对国家与民族的政治认同），这是由于三大社会主要阶级的各自利弊决定的。传统政治中，君主因素利在中央集权，弊在独裁专制；贵族（知识阶层与官僚集团）利在理智，弊在腐化堕落；民众利在多数人意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弊在知识与理性的缺乏。共和国的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在民主思潮的支配下，政治公共性驱使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各个阶层为了维系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实现共和国国家建设，就会形成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共生（依赖）的状态。而这种利益共生（依赖）的状态产生的前提就是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理性的沟通与对话，即实现民主协商。

从理论上来看，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民众通过君主来强化中央集权，由贵族（知识阶层与官僚集团）来进行精英治国，而民众重在政治（民意）监督，则可以确保政治在阶级上的权利义

务均衡与制度的有效运作，实现合理的协商民主。政治公共性的维系与混合政体的建设既从价值层面上吸纳了民主主义思想、追求了社会公平正义，又在效率层面上消除了理论上变态政体的制度弊端，自然成为了协商民主的逻辑进路。

2. 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政治权力重构与阶级共和

共和主义强调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和谐共处的价值目标，以追求阶级（阶层）共和、社会共和、民族共和等基本内容。人民民主主权尽管要求伸张民权，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消灭元首因素与精英因素。大众因素与精英因素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才是共和国混合政体建设的和谐目标，这就牵涉到政治权力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与解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接下来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此才能整合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利益结构。新时代，传统道德已显力不从心、新的道德秩序正在建构，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共和国内的公民美德尤显其时代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但这种公民美德不能仅仅落实在空洞的道德说教之中。“衣食足而知荣辱”，共和国的公民美德教育应当伴随着社会中的分配正义而同步展开，才能最大化地得到全民的拥护与支持。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权力的碎片化现象是由于为了制约权力而分权过度造成的权利重构困境。知识体系的破坏、历史传统的断裂等成了政治权力重构所面临的绕不开的障碍，也是社会中政治权力碎片化正在加剧的根本原因。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时代给这个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精英元素，使中国的元首元素、精英元素比大众元素更为强大，历史上强行铲除的政治改造措施不但没有收到良好的制度效果，反而给后来的政治改革埋下了隐患。我国的精英制度源自于传统帝制的官僚机器，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遇到各种难以适应的症状。现代共和国的核心政治价值目标是在适应本国实际国情的前提下保持上述三种元素之间的平衡，从而在政治权威、政治理性、政治公共性三大方面形成共合的混合政体模式（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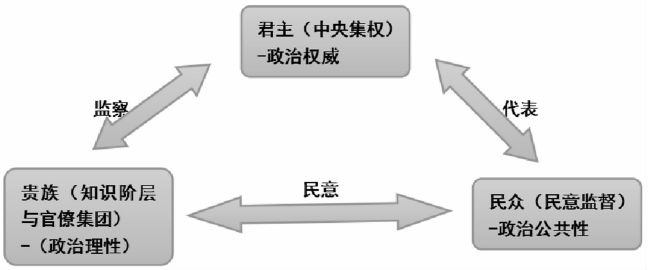

图 1　共和国的混合政体（该图为作者结合资料自制）

协商民主在中国共和国建设中的价值意义在于可以促使社会中上述三种阶级和两种因素之间形成理性的沟通与对话，在政治权力解构与分配方面实现合理的政治方案，确保政治改革能够让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均表示满意。代表中央集权的君主因素在混合政体中可以监察贵族因素的精英理性的功能发挥，与代表民意的民众因素之间分工与合作，以共同构成共和国里政治统治秩序稳定的混合政体。国家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公民美德在社会中的传播与固化，有效地将政治公共性与政治权威、政治理性结合起来。秩序、正义、节制、宽容等政治价值观念反映的是政治伦理的道德善，将成为共和国公民美德的核心。人人关心公共事业，共和国才能在社会中进入人心、实现现代国家认同，这也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共和国建设中存在的基本意义。

如果说古代的共和制度与直接民主相适应，那么现代的共和制度就不一定与直接民主相适应，代议制民主或协商民主将成为它的选项。现代共和制度既需要防止帝制的复辟，又要提防社会中的专制。较之主张用议会控制政府及其公共权利的代议制民主而言，协商民主在吸取了直接民主的大众因素与代议制民主的精英因素的前提下，侧重于强调社会各阶层的理性与克制的沟通与对话，以实现社会中政治秩序的稳定。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一种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和国塑形过程，因而作为民主理论第三种道路的协商民主成了最佳选择。

三、结语与展望

共和主义的基本内涵是社会中全民共同建设、推进政治发展的价值理念，主要类别包括社会

共和、阶级（阶层）共和、民族共和等，并在现实中有与一国实际国情相适应的政治实践，即共和国建设，古今中外皆有形态各异的共和国。在共和国里，社会利益往往表现为多元化，这使得阶级（阶层）的利益产生了共生状态，他们之间相互依赖、共同致力于社会建设。这些阶级（阶层）主要是君主（元首）、贵族（精英）、平民三大阶级，他们各自代表着的精英因素与大众因素会在维系政治统治秩序稳定的价值导向下保持比例平衡，这就是共和国所要追求的混合政体建设。

不同于君主制以荣誉来维系政治统治秩序稳定，共和国主要是依靠公民美德的政治社会化途径来实现阶级依赖与利益共生，从而实现政治公共性与政治权威、政治理性之间保持的动态的平衡。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共和政体建设的政治任务中所要防范的帝制复辟是过时的各种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而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则要加以吸收和借鉴。共和也非完全一定排斥君主（元首）因素。毋庸置疑，现代共和政体脱胎于传统的帝制政体，这意味着传统的君主制度中的积极政治因素可以用来为当代所继承、改造与利用。传统帝制在政治实践上提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及相关的制度，如强化对官员的监察、国家法律的公开化、官僚机器的精细化、郡县制的设立等，使得古代中国政体日臻完善。所以，我们应当取帝制之长补共和之短，借鉴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全面推动中国共和政治制度的发展。

如何通过政治权力的分配与再构推动混合政体建设，以广泛地实现社会中各阶级的民主协商，是现代共和国所亟须处理的发展难题。中国的共和政体最终将是一个兼有法治国和民主国的混合政体，这样一来，协商民主才能在社会建设中发挥自身极其重要的作用。法治建设应摆脱对社会规范的软弱困境，迅速步入到对政治权力的刚性制约状态中。并且，中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应当使法治建设的强制性变迁效果明显起来，为共和政体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制度基础。在中国的现代共和国里，政治协商制度是体现共和主义中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设计。人民政协就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①]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并非一朝一夕，须着眼于现实中的基本政治逻辑规律并不断深化改革。人民政协作为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中受到进一步重视、更充分地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强力助推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辅助人大的立法权能，最终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格局的实现。

总而言之，共和主义既是一种文化上的政治思想理念，也是一种现实中的政治实践路径，可以与不同的民主类型理论相结合，并形成形态各异的共和国。在不同的实际国情支配影响下，共和国建设应择取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类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发展型共和主义的政治实践，旨在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及政治参与，实现有序的民主协商。以协商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们共和国立国之初的首要政治大事，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完善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中的共和主义基本内涵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下，共和主义话语语境中的协商民主不仅是修正西方代议制民主理论的第三种道路民主理论，也是推进现代共和国建设的有力保障。西方代议制民主难以调和精英因素和大众因素之间的冲突与碰撞，或是精英因素出头导致专断的寡头政体，或是大众因素出头导致混乱的街头政治。我国的共和国建设突出政治秩序的价值导向，结合“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通过政治权威实现全民团结、凝聚一心，既保持政治理性，也倡导政治公共性，较好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集权的历史传统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是政治权威是引领政治理性与政治公共性的基础性保障，在协商民主的制度助力下，其确保了共和主义的混合政体建设目标的达成，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相互依赖、利益共生，共同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6 页。

参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张　星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050）

摘　要：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有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参政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丰富治理主体、把脉治理客体、完善治理过程、创新治理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协同化、高效化等，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参政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协同化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60－07

现代化的大潮引发了诸多落后的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综观不同国家的转型过程，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时，人们不禁会追问：能够保证落后国家稳妥地开展现代化并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到底是什么？有很多研究者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有效的国家。“对于现代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来说，有效的国家的本质意义在于能够有效的供给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所需要的制度资源。制度能够为转型和发展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序的发展空间和规范的行动逻辑。”[①]也就是说，保证落后国家稳步推进现代化需要有效的国家，有效的国家本质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制度供给和制度治理。“制度治理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革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有制度，二是还要让制度运转起来。制度与制度运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政治过程。没有制度就谈不上制度运转，但没有制度的运转，也就等于没有制度。”[②]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健全完善的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提升治理能力，是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质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保障。对中国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是治理主体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关键要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研究”（ZK20200225）；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委托课题“参政党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星，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政党政治。

① 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46 页。

② 曹沛霖：《在制度运转中推进政治知识化》，《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第 78—79 页。

的积极作用。”[①] 参政党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丰富治理主体，助力形成协同治理新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公共事务公共治理，也即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善治”。因此，多元主体的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协同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丰富了治理的主体，其依托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的制度化参与机制，可助力实现公共治理主体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行动协同的目标。

（一）参政党是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

“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②] 依照有关制度规定，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三大基本职能。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主要职能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当然主体之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值得信赖和倚重的重要伙伴。

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支持他们发挥作用，推动国家政权建设。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均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担任着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并有序开展监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助力形成协同治理新格局

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为满足有关界别群众的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需求，为维护、保障和实现有关界别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了重要途径。通过参政议政等基本职能的履行，参政党不仅能够将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建议反映到政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党派组织的政治吸纳、社会整合等功能，团结凝聚党派所联系的广大群众，助力形成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在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参政党协助党委政府推动各级党政部门、党派组织、统战及社会团体等，实现政治资源、政策资源、行政资源、组织资源等优势互补，以及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共享、推动互融共进，为较好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和整合贡献了力量。

因此，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履行职能中发挥着各自的界别特色和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加强对所联系群体的思想引导、政策阐述，有利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形成共识，推动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动员广大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二、把脉治理客体，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复杂多样的公共事务、层出不穷的治理难题，需要治理主体及时、全面了解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的对策建议。这就需要治理主体掌握和了解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动态，及时、科学地进行研判，并形成科学认识。参政党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八个民主党派各有界别特色，成员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汇集了大量专家学者，可谓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这是参政党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的重要优势所在。参政党围绕社会决策、社会问题等治理客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严密论证，对

---

① 习近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15 年 5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2021 年 5 月 2 日。

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6 日，第 1 版。

于提升国家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有着重要作用。

（一）参政党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履职尽责

参政党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发挥自身界别特色、人才优势，在相关领域积极参政履职，助力国家决策科学化等。例如，近年来，民革在社会、法制等方面发挥着自身的界别特色，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完善法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志愿服务法制化建设”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① 民盟发挥在文化教育领域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围绕高等教育改革、职业教育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等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政履职。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因而其积极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独特优势，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问题积极发声、出力。民进的界别优势在教育领域，其组织会员聚焦教育领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农工党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领域有界别特色，其针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等提出真知灼见。致公党以“侨”“海”为特色，围绕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人才工作、国际国内双循环等主题献计出力。九三学社以科技界为主体界别，其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国家等问题提出了大量建议。台盟以台湾省人士为主体，他们关注祖国统一大业，围绕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与互信，为促进两岸交流往来积极建言献策。

（二）参政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

参政党积极参与中央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涌现出许多鲜活的案例。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至 2019 年 6 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报送书面意见建议共 647 件，其中 527 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为中共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② 近年来，民主党派提出的推进雾霾治理、加快推进平潭综合试验区建设、科学设定“十三五”期间 GDP 增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等建议都转化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③

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湖南省等地创新性探索出“中共党委出题、民主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方式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与治理的作用，及时将民主党派的有益意见建议转化为治理举措。此外，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作用，在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过程中既反映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诉求，也为党委、政府做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对于凝聚共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 2021 年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习近平对民主党派的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出主意、想办法，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⑤

---

① 《万鄂湘：继续发挥在社会和法制领域的参政议政优势》，2019 年 10 月 14 日，http://cppcc.china.com.cn/2019-10/14/content_75298354.htm，2021 年 4 月 15 日。

② 李晗雪：《习近平寄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作为》，2019 年 09 月 26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09-26/8966638.shtml，2021 年 4 月 12 日。

③ 刘维涛：《权威访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223/c430519-31517450.html，2021 年 4 月 15 日。

④ 刘敏捷：《为新型政党制度发展探索湖南经验》，2018 年 4 月 27 日，http://www.xiangshengbao.com/nd.jsp?id=3939，2021 年 4 月 19 日。

⑤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2017 年 01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3/c64094-29042601.html，2021 年 4 月 20 日。

三、完善治理过程，提升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水平

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涉及决策、执行、监督、问责等全过程。“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多党合作治国体现在多党在‘治理决策的协商—治理施策的监督—治理绩效的评估’等多个环节。”[①] 参政党也通过制度化的参政议政、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的广泛协商、贯穿全过程的民主监督等，助力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等的提升。

（一）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提升国家治理民主化水平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要义，就离不开畅通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体现人民群众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实现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更为广泛的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效度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情况，体现着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水平。

各民主党派所具有的参政党地位和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方式，不仅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乃至个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组织化的渠道和途径，也保证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政治参与在总体上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的特征。

具体而言，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都是合法、能够公开活动的政党，能够帮助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等已有的体制内渠道，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压力，提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有利于实现现代政治体系政策选择与决策的互动，使政策的输出反映社会的要求，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性。各民主党派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和参与，能够使不同党派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体的利益意愿和诉求通过多党合作的渠道得到表达，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加充分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二）发挥政治协商作用，助力科学民主决策

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直接进行协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协商，是政治协商的两种重要形式。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商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总的来看，政治协商在运行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协商内容的政治性。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国家、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广泛协商。二是协商形式的民主性。协商以会议或书面等丰富的形式进行，在协商过程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三是协商程序的规范性。依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文件规定，政治协商从协商议题的提出，到协商形式的确定，再到协商成果的转化等都有着相应的规范。四是协商深度嵌入国家治理过程。政治协商被纳入决策程序，协商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广泛开展，使得协商深度嵌入了国家治理过程。

（三）开展民主监督，规范国家治理行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监

① 任世红：《国家治理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47 页。

督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没有监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①] 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公权力的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参政党不仅通过参政议政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实现对治理过程的参与，提升治理的实效，还通过民主监督实现对治理过程的把关，防止公共政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倾斜或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起到警示和纠偏的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支持民主党派创新民主监督的形式，推出专项民主监督。从 2016 年开始，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云南、广西等 8 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区，围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贫困县摘帽、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等开展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在 3 年多的时间里，各民主党派中央深入 8 省区 1200 余个乡村，开展座谈、协商、沟通近 400 余场次，涉及近 240 多个县，提出意见建议近 1500 条，[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③] 民主监督正逐步成为规范国家治理行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有力方式。

四、创新治理方式，提升国家治理实效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意味着国家治理本领、手段、方式、路径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规律和社会演进的时代潮流。参政党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和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量，通过协商治理、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等方式，助力国家治理实效的提升。

（一）以协商治理助力国家治理实践创新

协商民主也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里，“广泛”就是协商内容和参与范围的民主要求；“多层”就是协商层级和形式多样化；“制度化”就是协商常态运作的制度化。要推动协商民主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常态，协商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协商治理能够培养出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促进社会成员的包容、节制、责任感等美德的养成，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④] “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的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⑤]

参政党积极参与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实践，通过对话协商，有效地发挥了柔性治理的作用。参政党参与协商，既有层次较高的政治协商，也通过参与“民主听证会”“党群议事会”

① 李铁映：《论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02 页。

② 李晗雪：《习近平寄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作为》，2019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09-26/8966638.shtml,2021 年 4 月 12 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93 页。

⑤ 《习近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居民议事会”“区域协商议事会”“区域性劳资协商会议”“行业协商制度”等多种基层协商型民主治理方式，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重要支撑。例如，一些地方党委与政府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包含参政党成员参与的协商对话联席会议，搭建各种形式、不同层级的协商对话平台，构建了协商议事会和网络协商对话机制等。一些党派组织通过相关平台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与党群组织和其他丰富多样的自组织一起，调动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丰富社会治理形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参政党联系广泛、身份超脱，接地气、亲民情，能够通过民意吸纳有效地化解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激、感性、带有一定极化倾向的民意，有效地做到了问情于民、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这些协商治理较好地实现了具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尽可能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消弭社会冲突和对抗情绪，对于提升治理实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以社会整合营造国家治理的稳定环境

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前提之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群体分化加剧，旧的制度规范、价值体系逐渐失效，新的制度规范、价值体系尚未成熟定型，因此，利益分化、价值冲突、信仰迷失、行为失范就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革命极大地加深了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突发事件和难以预测的因素都可能带来各种风险挑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触及的利益调整，使国内社会和谐面临重重压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对的严峻情势。

参政党能够协调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建设大局，对于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参政党组织向自己所联系的社会群众传达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实现意识形态整合；通过参政党组织吸纳、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实现政治资源整合；通过利益表达、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维护所联系的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利益关系整合。

以意识形态整合为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的政治共识和行为准则。这就为参政党所联系的社会群众提供了具有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利于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协助政府做好凝聚共识等工作，“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①]

（三）以提供社会服务助力国家治理效能升级

各民主党派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设立社会服务部（处），主抓社会服务工作，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开展各类社会服务工作，推动和实施智力支边、光彩事业和“温暖工程”等活动，开展职业培训、兴教办学、捐资救灾、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

如民革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健全全国法律援助组织体系，为困难群众提供诉讼方面的法律援助。仅2014年至2017年间，民革各级组织就累计实施法律援助1.3万例，开展法律咨询和普法活动1.3万次，11.5万人次受益。[②] 这些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助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民

①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人民日报》2021年2月2日，第1版。

② 栾絜洁、张雯宁：《助力脱贫攻坚　服务社会发展——5年来民革社会服务工作综述》，2017年12月19日，http://www.minge.gov.cn/n1/2017/1219/c415747-29716327.html，2021年4月17日。

盟从 2007 年开启“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关注农村教师成长和生活改善，助力乡村教育发展。[①] 民盟还不断丰富社会服务品牌，打造了“黄丝带帮教行动”“明眸工程”等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②] 民建发挥自身联系经济界别的优势，民建中央自 2003 年起每年举办非公经济论坛，帮助非公企业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③] 民进发挥教育界别优势，民进中央和各级组织，持续举办教师培训班、支教助学等活动[④]，助力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提升。农工党结合界别特色和自身优势，在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保健养生等方面积极作为，积极参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清洁水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等。[⑤] 2003 年以来，致公党中央逐步建立起包含“致福·侨海报国”“致福·支边扶贫”“致福·科技扶贫”等在内的“致福工程”社会服务工作综合品牌。[⑥] 九三学社社会服务工作秉持“与时代同行”“坚持科技特色”，以科普和“九地合作”为重要方面[⑦]，1986 年开启“九地合作”模式，推动九三学社省级组织与数十个地方政府开展了深度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⑧] 台盟近年来打造“两岸同心”品牌，在各地开展助学、义诊等活动。[⑨]

这些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形式的拓展和创新，不仅丰富了国家治理手段和方式，也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能。

结　语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也是开展国家治理活动的基本载体……因而，一种恰当的国家治理理论必须以组织为中心，它既要解释组织的合理之处，也要直陈组织的积弊之端。”[⑩] 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参政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和关键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参政党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和成员的能力素质等仍存在一些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完善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为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营造更好的环境，显得十分紧要。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烛光行动简介》，https://www.mmzy.org.cn/zgxd/summary.aspx，2021 年 4 月 18 日。

② 《2019 年民盟社会服务工作座谈会在重庆召开》，2019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cqtzb.gov.cn/portal/article/index/id/22236/cid/29.html，2021 年 4 月 19 日。

③ 胡珉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推——各民主党派深化社会服务纪实》，2018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minge.gov.cn/n1/2018/1213/c415139-30465125.html，2021 年 4 月 19 日。

④ 《民进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议进行大会交流》，2015 年 6 月 4 日，https://www.mj.org.cn/news/content/2015-06/04/content_184460.htm，2021 年 4 月 20 日。

⑤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hbng.gov.cn/index.php?id=1238，2021 年 4 月 20 日。

⑥ 汪俞佳：《尽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致公党中央社会服务工作纪实》，2013 年 05 月 23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523/c64107-21585559-3.html，2021 年 4 月 20 日。

⑦ 九三学社中央社会服务部：《九三学社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议召开　丛斌出席》2021 年 5 月 28 日，http://www.93.gov.cn/xwjc-snyw/756622.html，2021 年 5 月 28 日。

⑧ 戴红：《九三学社为社会服务的故事》，《光明日报》2013 年 12 月 6 日，第 12 版。

⑨ 胡珉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推——各民主党派深化社会服务纪实》，2018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minge.gov.cn/n1/2018/1213/c415139-30465125.html，2021 年 5 月 3 日。

⑩ 王家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一个组织现实主义的视角》，《管理世界》2015 年第 2 期，第 80 页。

民族工作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意蕴

卢石英，周朗生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固化、民族理论上的观点纷争和模糊、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失调和碎片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作出回应和澄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如何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这是一个需要从“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的逻辑进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国家治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67－08

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和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近代以降，外患内忧致使我国传统的王朝国家秩序崩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快速而又深刻的变迁，民族自治地方出现以往传统社会不曾经历的诸多新问题，包括民族观点上的纷争、民族关系融洽问题的凸显、个别民族的认同模糊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抑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理论界和社会上曾经有过不同声音，为此，党中央与时俱进，及时作出回应和澄清，理论界也需要在学理层面进行积极回应。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的价值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思路进行思考作答。

一、何以必要：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价值逻辑

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社会变迁提出的全新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化和落实。中国自古具有“百国之和”的美称，从封建邦国到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你来我去、我来你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19BZZ037）。

作者简介：卢石英，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周朗生，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

元一体而又渊源共生的统一的多民族格局。历代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时采用“怀柔”“羁縻”“抚远”等政策。然而，民族的区域聚居与分散的不平衡，以及族际之间的内在张力并未消弥。面对这样一种境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民族分布的区域格局和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创制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以这一制度为依托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了民族识别、地域界定和具体政策的落实。这一制度的实行，在制度及实践层面保障了民族自治区域的合法权益，推动这些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由此奠定了民族区域治理的最为基本的制度架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制和推进充分考量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等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新时代，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和重要任务，是衡量我国民族区域治理绩效的一个基本指标，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治理难题的客观要求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这一总目标统摄和涵盖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的建设。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发展进程的一大轴心力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从全国的工作大局到一个小的乡村地方都存在治理的特定主题和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有自身特定的问题。其中，既有与全国各省、市、县、乡镇普遍的共性问题，也有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区、州、县（旗）、民族乡的个性问题。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如何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解决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抓住区域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展开深入研究，这始终是贯彻在民族区域治理研究过程中一个基本指导理念。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改革那些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过时的体制机制及治理难题，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制度体系的优化。譬如，我国民族地区[②]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在 2011—2017 年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民族地区的降速明显快于全国，其中，到 2017 年，民族八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7. 9% 。[③] 脱贫攻坚和进入后扶贫时代的任务依然繁重，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污染、人口迁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跨境犯罪、“三股势力”及其暴恐活动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给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带来风险和挑战，严重威胁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要不断优化治理的体制机制，使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更加科学合理，推动民族自治地方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民族自治地方更加科学有效的治理提供民主法治保障。通过制度体系的建设和优化，确保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在内“六位一体”新格局全面协调和整体推进。

（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全面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新中国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行，为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构建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急速的社会变迁，民族自治地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② 我国“民族地区”通常指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5 个民族自治区，以及贵州省、云南省和青海省 3 个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省份。在一定意义上，民族地区和民族八省区可以通用，而民族自治地方是一个泛称，泛指所有民族自治区、州、县（旗），甚至乡的区域范围，在总体意义上使用，有时也与民族地区通用。

③ 张丽君、吴本健、王飞、马博等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8）》，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 年，第 7 页。

方出现以往传统社会不曾经历的诸多新型问题，包括民族间利益分化、涉民族因素的负面舆情和案（事）件易发多发、民族观点上的纷争、各民族非均衡发展的凸显、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同时，在国家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升级转型和开放发展的过程中，还突显出以下问题。“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后的“送一程”问题；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新旧产能转化尚未完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易地搬迁的后续产业支撑弱化；互联网领域中“网络大V”等重点人物的教育引导；生态保护压力加大等。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治理难度与以往相比显著增加。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上诸方面问题的合理、有效、及时解决，从根本上依赖于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民族自治地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落实和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等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①]，是一个主体性多、层次性强、领域性宽、互动性强的制度集合体。从整个国家治理的战略构成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整个中长期行动框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统一与自治、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同时，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对国家治理具有反作用，没有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功，很难说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功。因此，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民族自治地方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落实和丰富，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达成和实现。

（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为全球治理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民族问题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欧美民族问题出现极端化和民粹化趋势，处理不善导致严重后果——种族屠杀、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情况已有先例。在我国，党的民族政策和对民族地区的制度安排为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世界意义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实践上的溢出效应。党和国家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处理民族问题的同时，其治理的角度、方式和解决程度也会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治理。具体而言，一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周边及其以外的世界产生影响。即当一国民族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或处理得比较彻底，这种良好效应具有放大功能，有利于邻国及其以外民族问题向良性发展，有助于邻国及其以外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我国在民族自治地方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偷渡贩毒等国际犯罪，既保证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也降低了邻国边疆民族区域动乱的风险。相反，当一国民族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甚至进一步扩大，超出国家控制范围，就会殃及邻国及其以外国家，给它们解决民族问题造成巨大压力。例如，一国边疆居民贫困、社会动荡，邻国边疆富裕、社会稳定，若边防管理松弛，一旦具备某个诱因，就会有大量边民外逃，涌向邻国，这无疑会给邻国边疆增加压力，导致邻国边疆秩序紊乱。二是理论上的导引功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民族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既保证了民族问题解决中科学理论指导的普遍性，又确保了民族问题解决的方法论的特殊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民族政策体系。正是基于正确的民族理论指引，党领导治理民族自治地方取得了历史性成效，形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稳定有序，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协同进步，文化繁荣昌盛，生态日益良好的“中国之治”。与此同时，世界上一部分国家的族群区域政治无序，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族群分裂，战乱频仍，居民流离失所。党和国家在治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过程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可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国模式”，它应该是雷默所称“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同样对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提供镜鉴，从而赋予现实的世界意义。

二、何以紧迫：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逻辑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间一环扣一环，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意义非同寻常。中国民族自治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及其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及其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路径需要同时考虑三大问题：一是中国性，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作为一种内生性演化的地方治理体系，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关注本国本地区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二是时代性，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对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各个阶段性目标的权衡与抉择；三是共享性，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增进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福祉，让改革红利惠及民族自治地方全体人民，这是检验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根本标尺。其中，以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为引领和以什么样的基本制度为保障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并深刻反思这一历史进程，是全面思考和总体设计国家治理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路径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民情、党情、舆情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产生诸多新型的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及时处理和回应社会关切，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变得尤为紧迫。

一是满足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族自治地方的民生改善一直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问题被提到了新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精准扶贫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硬任务，把改革成果共享、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协调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活力被激发，经过四十多年迅猛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在国内，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总量及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与非民族自治地方相比，差距还较大。

表 1 全国居民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组的可支配收入[②] 单位：元

组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东部地区	23658. 4	25954. 0	28223. 3	30654. 7	33414. 0	36298. 2
中部地区	15263. 9	16867. 7	18442. 1	20006. 2	21833. 6	23798. 3
西部地区	13919. 0	15376. 1	16868. 1	18406. 8	20130. 3	21935. 8
东北地区	17893. 1	19604. 4	21008. 4	22351. 5	23900. 5	25543. 2

为此，习近平把民族自治地方现阶段治理的特征概括为“五个并存”[③]。这“五个并存”反映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治理能力不强、体制机制不活的现实状况。因此，援与建并举，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生产生活条件，使民族自治地方群众更好地享受发展成果，过上美好生活，已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4 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9》，http://www. stats. gov. cn/tjsj/ndsj/2019/indexch. htm,2021 年 6 月 25 日。

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58 页。

成为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紧迫课题。

二是回应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主体自身存在危机与挑战的需要。民族问题的内容很复杂，民族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问题的治理也必然是多方面的综合治理。在我国，民族问题治理主体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民族群众、各类媒体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实际的治理体系运行中，各类主体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着民族自治地方不断发展。但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和地方形势对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形成了新的危机和挑战，除了常说的民族关系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毒品与艾滋病问题和特殊群体问题，以及本身自然条件和发展落后外，还存在一些阻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难题。譬如，在中心工作上，经济发展与其他各项工作的统筹，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政治文明建设上，政治安全与稳定、民主法治建设、各种府际关系等；在社会建设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局部改善和总体形势严峻的态势；以及网络安全、危机突发事件的联合应急反应不畅等等。这些难题不断地考验着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三是增强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群众“五个认同”[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传统社会所不曾经历的诸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博弈问题、跨境民族问题、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问题、“三股势力”等问题相继出现；各民族跨区域流动中还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排斥问题、民族污名化问题，以及栖居于城市的少数民族异域融入困境和他者认同危机等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尤其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分化出现的结构性紧张，[②] 这种结构性紧张又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族际之间矛盾冲突加剧，而当前社会转型期又尚未完全建构起化解这种结构性张力导致的矛盾冲突的有效解决机制，导致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出现一定程度的阻滞。加之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在国际交往中一些国家利用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情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之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民族自治地方，以民族宗教问题为抓手，在中国民族宗教问题上制造事端[③]、频频发声和施压，包括最近美国国会众院相继通过所谓的涉疆、涉藏等“法案”[④]，企图为“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张目，导致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部分民众出现国家认同淡化、中华民族认同弱化、中华文化认同虚化、政治认同退化等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边疆多民族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认同的淡化、弱化、虚化和退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由于民族团结是中国多民族社会和谐的根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崛起的前提，再加上边疆多民族地区又是国家安全防御的战略屏障和军事回旋之地，如果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不能从根源上斩断一些民众错误认同问题蔓延升级的趋势，那么，不仅将从深层次上影响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和谐与安宁，而且还会对国家长治久安、国家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成难以言喻的伤害。一言以蔽之，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同时，要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任务，坚决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对我国民族关

①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② 朱碧波、王砚蒙：《论中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29—34 页。

③ 周朗生：《云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制度整合机制的现代构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39—45 页。

④ 在 2019 至 2020 年的年末岁初之际，美国罔顾事实，炮制了所谓的涉疆、涉藏等“法案”。即 2019 年 12 月 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通过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 年 1 月 28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所谓“2019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对此，中方给予坚决反对。

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和远景期许，更是当前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构建的价值导引和行动方案。

三、何以可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实践逻辑

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族地区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准备和国外借鉴的结果，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检验。当前民族自治地方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否通过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解决？这是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当然，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因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是一个涉及到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综合体。

（一）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要不断对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研究框架进行深化与拓展

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及其意义。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应该有明确的理论支持，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治理善治理论”，从中国国家治理演进的规律出发，分析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中存在问题的表现、根源和危害，阐明为什么要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透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根据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目标，揭示出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的目标规划，即回答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走向何方的问题。三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放宽历史的视界，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检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的来龙去脉，可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四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即通过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即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结构体系的现代化、治理功能体系的现代化、治理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治理方法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运行体系的现代化，通过条分缕析，全面认识其成败得失。五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运用实地调查获得的经验资料，总结民族自治地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弄清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 70 年构建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六是优化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对策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思考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路径，这也是科学研究的落脚点。

（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要不断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设计的定型

就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而言，邓小平在 1992 年视察南方的著名谈话中谈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①]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把“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时间确定在 2020 年。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分段实施的时间节点和内容：即 2021 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 2049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对于社会治理层面而言，特别是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清醒的认识，因而，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答案，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②]，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一是把“加快形成”修订为“完善”；二是新增“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两条；三是把“社会管理体制”修订为“社会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72 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4 页。

治理体系”[①]。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如何“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转化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统一而又明确的指导要求，但民族自治地方又不能与非民族自治地方完全一样，如何在落实自治权上发挥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和而不同、特色鲜明的和美社会（社会治理共同体），就需要充分了解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党政情况、社会结构、人口状况、公众参与、民族宗教、法治力量等，这是推进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做，因为探索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针对民族自治地方。

（三）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不断关注治理主体的现代转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治理主体主要关涉党的各级组织、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当前民族自治地方出现的各种治理难题和治理体系失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和族际分化导致的利益结构紧张直接相关，以及治理主体未能及时转型发展的问题，表现为党的领导力弱化、政府能力老化、社会协同力淡化。因此，当前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就是要积极推进治理主体的现代转型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协同问题，即如何实现民族地区党政军民学的能力提升，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从而实现各民族包容发展。在推动各民族包容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域主义”视角和“弱势关怀”取向，要尽量实现同一区域不同民族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决战决胜全面小康关键期，精准解决好各民族底层群体的贫困问题是头等大事，“按可比价格计算，2011—2017 年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 9. 8%，比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7. 5% 的年均增速高 2. 3 个百分点”。[②]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把扶贫与扶志（智）统一起来，不断改善民生，走出发展型脱贫新路，这是进入后扶贫时代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③]

（四）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不断落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构建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设计，它在发展民族地方经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推动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正确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深刻内涵、演生逻辑和价值意义，以获得理论上的突破性认识。同时也需要实践上的操作，即通过目标、利益、行政安排和信任等治理主体关联的核心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机制操作，引领构建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框架体系。[④] 健全和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在整体上兼顾民族与区域相协调而不顾此失彼，又要把民族与区域、政治与经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结合好。要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是片面简单地强调“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自治”与“区域共治”的统一，是少数民族在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各民族共同探讨民族聚居地方治理体系的善政与善治之道。

（五）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要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的法治化

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在民族事务、民族问题上的体现，也是民族

---

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② 张丽君、吴本健、王飞、马博等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8）》，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 年，第 2 页。

③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03 月 07 日，第 02 版。

④ 郁建兴、张利萍：《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机制及其整合》，《思想战线》2013 年第 6 期，第 95—100 页。

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究其本质来讲，“不仅对‘单一制’结构下尊重各民族主体地位、激发创造精神发挥出重要作用，还对在不同区域和地方差异性地、科学地投放公共政策，确保政策效能和治理绩效提供了法律渠道，它是对‘单一制’国家结构非常重要的制度补充”。[①] 法治化是检验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成熟的重要标志。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要求在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过程中，要将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与法律问题脱敏，防止“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还强调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身份不能逾越法律－公民身份，任何人不管何种身份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还要求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暴恐活动的分子，不论出身什么民族、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②]。可见，民族地区事务治理、问题解决的法治化构成了民族自治地区治理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的建构和完善，就没有后者的实践和展开。

总之，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自觉自信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实践中，不仅有民族、民族发展、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事务、民族互嵌、两个共同发展、三个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供给，而且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现代化理论、治理理论、核心边缘结构等理论基础，以及各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给予的大量政策支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族区域治理体系。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确保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 70 多年来卓有成效的实践展开及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秦德君：《中国国家制度型构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基础》，《理论与改革》2020 年第 5 期，第 130—142 页。

② 丹珠昂奔：《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民族论坛》2014 年第 12 期，第 9—17 页。

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谈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董国菊

（德宏州社会主义学校，云南 芒市 678400）

摘　要：民族文化自信根源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民族传统节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是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最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德宏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承载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含促进民心相通、增强民族凝聚力、愉悦精神生活、强化文化认同、激活市场潜力等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一系列挑战，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力任重而道远。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文化导向，创新发展传统节日文化，发挥地方媒体优势，推广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以此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民族文化自信力；养成

中图分类号：G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75－07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有赖于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觉醒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

民族文化自信根源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民族传统节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地区的标志性文化，民族传统节日具有丰富生活、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满足情感需求、缓释心理压力、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等多种社会功能，是民族大众的精神家园，是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最为深厚的文化土壤。挖掘并利用好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对养成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一、德宏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价值

在德宏州众多的民族传统节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傣族的泼水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德昂族的浇花节、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傈僳族的阔时节，此外还有烧白柴、新米节、采花节、能仙节、撒种节、火把节、关门节、开门节等等。随着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好，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德宏州一年到头月月有节过，周周有节假。过不完的民族传统节日共同展示着德宏民族文化，由此也彰显了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董国菊，中共德宏州委党校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宗教发展问题。

（一）促进民心相通，维护边疆繁荣稳定

德宏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南、西和西北三面与缅甸联邦接壤，国境线长 503. 8 公里，在 11526 平方公里的境内居住着 40 多种少数民族，其中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为世居主体民族。这 5 个民族原本长期生活在传统聚居地，由于历史原因或国家领土的变更，同一民族被国界线分隔成为跨境民族，但他们相互毗邻、同宗同源同文化，过同样的民族节日。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德宏正逐步成为内连大西南、外连南亚东南亚，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南北联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大通道。2019 年 8 月，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挂牌成立，将全力打造沿边开放先行区、中缅经济走廊的门户枢纽，德宏战略地位日趋显现。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以及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来看，德宏各民族传统节日的隆重举办，彰显了国家强盛的同时，对缅甸跨境民族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表达出愿意共同交流的强烈愿望。双边跨境民族同过一节、共同寻根，探究民族文化灵魂，回归民族文化本真，促进了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心灵融合。这不仅在境内产生极好的社会效益，引导各民族牢固树立起国家意识、公民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维护边疆繁荣稳定，而且还在境外各民族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彰显了“国门文化”的巨大魅力，塑造了我国民族政策的良好形象，提升了民族自豪感。

（二）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本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传统节日便是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作为各民族传统文化外在表征的语言、习俗、服饰和风俗等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民族传统节日通过一定程式化的文化展示、节日行为和节庆仪式，建立起公共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是少数民族集体意识的反映，体现了少数民族共有的精神追求。

以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为例，有“天堂之舞”“万人狂欢舞”美称的目瑙纵歌舞，堪称世界上最壮观的集体歌舞，只要场地允许，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跳舞。“目瑙纵歌”是景颇语的音译，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目瑙纵歌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涉及景颇族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集中展现了景颇族的道德观念、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等特点，是研究景颇族社会历史最好的活材料。早在 1983 年，目瑙纵歌节就经德宏州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确立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

在德宏景颇族聚居地，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村村寨寨都要举办目瑙纵歌节，届时景颇族各支系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成群结队聚集到目瑙纵歌场，伴着欢快的旋律，踩着同一个鼓点纵情歌舞，任何一个民族或游客都可以参与其中。少则成百上千人，多时过万人的宏大规模，震撼力极强，展现了目瑙纵歌节超强的民族凝聚力，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节日中还将织锦、传统体育、美食等具有景颇族文化特色的元素或项目纳入比赛。人们在节日聚会中相互祝福，在欢声笑语、载歌载舞中联络了彼此的感情、增进了理解与互信，在相互切磋交流中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从而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大大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进步。

（三）愉悦精神生活，提振民族精神

民族传统节日源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又高于生产生活，是带有本民族温度的特殊节日，代表着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是民族特性的象征，是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沿袭的结晶。在节日活动中，各民族齐心相聚、共度佳节，共同享受节日的欢乐，体验生活互助、语言互学、民俗同尊的节日文化和民族情感。

以傣族的泼水节为例，作为德宏州法定民族节日的泼水节是德宏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农耕文化现象，展示了傣族人民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是傣家人丰富多彩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民族情感表达的最佳方式。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傣家人在节日期间，用专门采摘的

泼水花枝沾水，互相泼洒，相互祝福！无论你是谁，只要参与其中，就会被满满的祝福包围和感染，享受水的洗礼，生活工作中积攒下来的压力因此得以释放。泼水节期间还会举行赛龙舟、丢包、赶摆、歌舞表演、放孔明灯等活动，人们通过参与歌舞、娱乐、体育等活动，敞开心怀、放松心情、宣泄情绪、释放压力，愉悦了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与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提振了民族精神。

（四）强化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洗练，沉淀而成并延续至今的不同种类、不同环境的文化。它承载着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符号元素，彰显了少数民族的优秀精神气质，是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最有效、最直接、最集中展现民族文化的窗口，是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它用语言文字、地方风俗、文学艺术、游乐竞技、亲属关系、服饰传统、饮食习惯等元素构成一张文化之网，每个个体都是参与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是促进民族文化展示、交流与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强化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精神纽带。

经过德宏傣州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整合创新后的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阿昌族阿露窝罗节、德昂族浇花节，自 2006 年 6 月起先后被批准成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节日在顺乎民意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民族传统文化规律的地域特点，还原了传统民族节日仪式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体现了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导向和对边疆少小民族社会政治地位、文化信仰的呵护，是更高层面的文化认同。无论是哪种民族，传统节日就像一根线，把民族成员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人们从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每一个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发展、传播及相关动人传说，无不包含着关于该民族的大量历史和人文信息，全面展示了该民族的音乐、舞蹈、服饰、饮食、宗教、审美等元素。通过对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元素的整理与提炼，精心组织民族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服饰、特色村寨、特色饮食等标志性文化符号的展示与交流，使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在“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的和谐氛围中得到充分发挥，在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人文关怀需要的同时，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在相知、相亲、相惜过程中强化了各民族文化认同感，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心。

（五）激活市场潜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是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舞台，也是当地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随着社会的了展，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传统节日商业化趋势日趋明显。“节日搭台，经济唱戏。”节日期间，各种节日活动不仅吸引当地群众的参与，也吸引了许多游客，众多商家更是慕名而来。由此带动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歌舞、民俗、乐器、服饰等产业，向游客展示了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从德宏州近几年民族传统节日举办的情况看，在政府主导、各民族积极参与下，州内 5 个主体民族的主要传统节日，除 2020 年因新冠疫情暂停举办外，每年都热闹非凡。发展节日集贸经济，扩展节日的内涵与功能，通过民族传统节日激活市场，满足农商贸各层次的需求，已成为有效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以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来说，近年来目瑙纵歌节在政府主导下，经多种模式打造，得以传承利用和保护，比如采取非遗文化 + 伴手礼 + 乡村游、展示 + 文创产品、非遗 + 旅游等模式，打造非遗文化一条街，形成了品类繁多的文化消费，已成为德宏州的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从规模来看，德宏州每年举办一次州级目瑙纵歌节，参与人数多达数十万，设有正式商品摊位 300 多个，加上众多零散摊位，一个节庆下来，约有二千多万元的交易额。各县市每年举办的县级目瑙纵歌节也有五六万人参与，各乡镇举办的乡镇级约有两三万人次参与。平时在芒市珠宝小镇、瑞丽“一寨两国”、云南民族村等旅游景区都能看到目瑙纵歌表演，游客可以即兴加入纵歌，给人们带来了快乐的同时，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化产业和地方

经济的发展。目前，除目瑙纵歌外，德宏州借助民族传统节日形成的产业还有户撒刀、葫芦丝、织锦、茶叶、象脚鼓、玉雕等。[①] 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在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力。

二、影响德宏边疆各民族文化自信力养成的因素——以民族传统节日为视觉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进步，国际地位提升的同时民族文化自信力也空前提升。但作为边（边疆）少（少数民族）穷（贫穷）的德宏州，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各民族文化自信力养成任重道远。

（一）以节日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不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互联网已使世界联系日益紧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广泛。以节日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先进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思想以及新媒体的助推下，伴随资本在全球流动和扩张，侵蚀着中国的文化土壤。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南向战略的实施，德宏的沿边开放中心重要地位正在凸显，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也不断丰富。外来文化价值观通过新媒体的手段，以节日文化的形式冲击着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人民的传统价值观，民族传统节日被各种现代民俗节庆及外来节日所蚕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特有的文化生态受创，民俗色彩越来越淡，娱乐逐渐成了节日的主调。而各民族年轻一代在更多注重传授知识技能，较少关注德育的现代教育框架下，往往偏向于学习实用性较强的专业知识，认为传统人文科学知识无关紧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责任感，导致传统文化素养不断缺失，真正懂得本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人越来越少。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的人，自然也就缺少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价值取向很容易发生扭曲，必然会影响到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

（二）对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重视不够

翻开德宏各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在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中迁徙、融合、变迁、发展，努力寻求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形成了自身的鲜明文化特色。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德宏传统社会里，信息的闭塞，使得约定俗成的民族传统节日在人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盼望。由于从小浸润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便习得了与节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对节日拥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如今虽然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在基础教育阶段得以开展，但重视不够的情况仍然很普遍。在少得可怜的传统文化具体教学实践上，往往单纯强调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偏重于知识点的灌输，较少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内涵等深入挖掘。教育内容缺少系统规划，教学环节缺乏整体设计，通常是各自为阵，教育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传统歌舞、民族器乐教材缺乏，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处于松散状态，难以得到系统的继承和完整的延续，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的土壤仍然贫瘠。

（三）商品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节日日趋商业化的负面影响

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德宏州传统民族节日赖以生存的农村环境正在演变为城市环境，商业组织、媒体机构、政府部门及相关团体组织逐步发展成了维系民俗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满足商家、媒体、官方及相关组织机构的利益诉求，天生自带经济价值的民族传统节日，往往被过度商品化解读。在商家和媒体的大力推动下，在节日到来之前就效仿西方节日营销策略，对传统节日宣传造势，设计和推出各种活动及相关商品，以刺激民众过节的神经，诱发其节日消费欲望。商家对民族传统节日过于物质化、商品化的解读，使节日主题异变为世俗狂欢，节日资源被

① 管毓树：《魅力德宏 处处欢歌》，《云南日报》2019 年 2 月 28 日，第 8 版。

滥用，节日中可能充斥的欺骗、虚假消费内容，对社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民众对传统节日习俗和庆祝活动的感受被代入到依赖于消费刺激而产生出的节日体验中，这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民众，使其遗忘了民族传统节日所蕴藏着的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人文情怀。节日看似举办得热闹非凡，实则不再对公民的内心形成冲击，逐渐诱导民众脱离了民族传统节日中所饱含的细腻乡愁，进而产生对民族身份认同的迷惘与迷失，深层次暴露的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不足。

（四）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挤压了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空间

节日既是一个时间节点，也是一个空间场域。从时间维度来看，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展演性，所有的礼仪文化、民间艺术、信仰习俗、商业文化、生产文化，都会在传统节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演，可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时间载体。从空间维度来看，传统节日空间要素包括城市与乡村、官方与民间、家庭与社会等，既是民间个体和组织的活动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集中演练场，是一个有文化热度的物理空间。

从德宏州各县市的情况看，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有适合的物理空间培养文化传承队伍和人才，但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使传统节日原先赖以生存的农业社会逐步淡出。城市中高楼大厦、高档社区、大型广场、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日渐增多，而民间技艺则失去了表演和炫技的场地。地方政府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只着重扶植少数职业的民间艺人，却丢失了最重要的民间技艺的群众基础，民间文化成了观赏文化，而不是生活文化，只在节日期间进行一些表演。平时老艺人无处可教、无处可演，年轻人无处可学，很容易忘记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责任，不利于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

三、利用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节日的内容非常丰富，充分挖掘并利用好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对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意义重大。

（一）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文化导向，是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的保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利用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不仅需要少数民族自身努力，更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党的领导作用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 70 余年的治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使得人民满意度大增，各民族安居乐业，党的凝聚力空前向好！尤其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党的执政能力经过了严格的考验，在世界上得到了公认，空前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各民族过上了好日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各民族传统节日举办的形式内容上看无不彰显了文化自信力的提升。

对于德宏边疆各民族人民来说，如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像党和政府那样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党和政府所弘扬的文化旗帜便是各民族所广泛追求的文化信仰。党和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搭建平台、投入资金、引进人才、更新设施、建设场地，多方面给予支持，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节日文化，打造文化品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构建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服务体系，比如建立展览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满足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需求，使传统节日真正根植于民众内心，为各民族通过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社会功能，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提供了方向和制度保证。各民族唯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政府的有效引导，依托国家不断完善的良好的民族政策，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才能把握正确的文化导向，由自发到自觉不断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

（二）充分挖掘民族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在创新中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是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动力

文化源自历史、走向未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生成的一个动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① 民族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生活气息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有着丰富的内涵，表达了各民族顺应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景，传递着先民的生活方式，体现着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思想观念发生了剧变，民族传统节日也需要淘汰掉一些旧有的不适应的内容，并逐渐产生出新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意义。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要让传统节日焕发光芒，就必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充分挖掘民族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在创新中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要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从理念、制度和实践几方面，发挥民族传统节日的感召力和精神引导力，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功能做出适应性的调整。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如今德宏州已在 4 个主体民族的传统节日的创新上取得诸多经验。但不可否认，仍有许多传统节日在民间仪式上处于良莠相间、各守其俗的状态，亟待关注和引导。要在政府引导下，选择性地继承那些适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将原先以宗教祭祀为主旨的节日仪式，转化为融合多种时令性活动的新型民族节日，注意避免修补式、填充式的简单化倾向，对节日中体现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优秀内涵加以保留并传承和发展，强化其原有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而对一些节日中的陈风陋俗要除旧布新，逐渐淡化其原有的浓重宗教色彩，使其更富有民族民间特色，更接地气，更具互动性和娱乐性，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保持节日文化的生命活力，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发挥地方媒体在助力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优势，是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催化剂

地方媒体是区域传统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催化剂。2017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指出，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明确提出：“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在新媒体的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播方式日趋多元化，由过去实物记事、口口相传、图画文字、代代传习等传播方式走向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直至当下流行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对于德宏州各少数民族来说，各主体民族的主要节日就是“我们的节日”，地方媒体作为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公信力强的传播媒介，无疑对本地各民族文化是最了解的，能在宣传报道时更有效地抓住重点，更好地发挥宣传作用。基于德宏州目前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地方媒体可大有作为。当然，前提是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担当和独特作用，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节日知识储备，明晰宣传思路，增强策划能力及融通多媒体资源和创新表达形式的能力，形成宣传重点，避免人云亦云的应景式宣传。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追求良好的传播效果，助推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切忌无视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优良本质和它背后承载的民族精神。

近年来，德宏州注重新媒体发展，抢抓网络阵地建设，除了传统的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

①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地方媒体，还按照云南省“全省一朵云、一县一个端、州市一体化”的建设思路，依托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智慧云”搭建了“芒市云”“掌上瑞丽”“云上陇川”“盈江云”“梁河云”等新的地方融媒体平台，并已全面投入使用，新闻资讯及政务、服务进入“云时代”。德宏州是云南省第一家实现了县级融媒体 APP 全部试上线的州市。[①] 通过融媒体平台，当地群众可以了解身边发生的时政、民生、人文、公告等新闻消息。同时建立了德宏州“政务微信公众号联盟”“德宏抖音联盟”“德宏微视组”等一批新媒体团队，并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德宏州边疆网络红色小 V 队伍，成为了德宏网上宣传的“小喇叭”、网上舆论场和网民意见的“顺风耳”，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生态环境保护、对缅交流、野生动物保护、摄影、短视频制作等领域遍地开花，迅速扩大影响力，成为德宏州网上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一支重要力量。[②] 这同样可以更好地对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进行宣传报道，深刻诠释其内涵，全面呈现德宏民族传统节日的新变化、新内涵，更有效地倡导民众参与、社会关注，使其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以此唤起各族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真正成为涵养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催化剂。

（四）推广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培植民族文化自信的优良土壤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需要针对各民族特点，长期、有序、广泛深入地开展实施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德宏州各主体民族丰富的民族节日中，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它独特的美妙传说、经典记载、历史渊源，是经过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汇聚而成的精华，每个节日都反映了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宗教观念等等，寄托着整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推广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培植民族文化自信的优良土壤。小学民语课上优质的教材、科学的教学设计必不可少，但配备民族文化素养较高、责任感较强的优秀民语老师是关键。优秀的民语老师能生动有趣地给学生传讲关于民族节日的由来和传说、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并收集民族传统节日信息资料，有目的地布置节日主题作文，带着学生模拟节日等等，使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心中生根开花，从小就在情感上认同和享受民族文化，发自内心地景仰本民族文化，并主动寻根、探究，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从而养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同时，广播电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应提供各种学术研究平台，持续不断地对各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深入的学术研讨，准确把握住民族传统节日的本质、精华，从根基上竭力发掘和培植渗透着特定优良民族文化基因的土壤，长此以往必能守住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灵魂，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力。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黄磨西：《全省第一家！德宏州实现县级融媒体 APP 全部试上线》，《云南网》，2019 年 09 月 29 日，http://dehong.yunnan.cn/system/2019/09/29/030389916.shtml，2021 年 4 月 12 日。

② 《德宏州举办 2019 年新媒体从业人员暨“边疆网络红色小 V 队伍”业务培训班》，来源：德宏州委统战部，2019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swtzb.yn.gov.cn/xjc/201910/t20191011_897056.html，2021 年 5 月 6 日。

边民补助：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

曹　莉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陆地边境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为巩固边防，改善边境地区民生，国家先后出台了许多专项政策加强陆地边境治理，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边民补助作为其中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是边境地区边民的一项政策性收益，也是国家联结边民的政策纽带。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蕴含着陆地边境治理的多种功能，但在实际的发放中不能简单地完成补助发放任务，更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一政策，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培养和塑造边民的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而引导边民守土固边，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边民；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边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82－06

边民泛指生产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在陆地边境治理中既是守土固边的主体也是客体。近年来，国家实施的多项边境政策让边民切身感受到了生活的变迁，而边民享受边境惠民政策的同时也有着特殊的责任和义务。边民补助政策作为我国边境惠民政策的一种，蕴含着多种边境治理功能。自 2000 年正式启动兴边富民行动以来，国家为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不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资金投入。然而，每年边民补助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边民补助政策是国家和边民互动的体现，从政策的价值逻辑看，国家实施这一专项政策主要是推进边民国民身份的塑造，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而发挥边民守土固边的作用。从政策实践逻辑看，边民补助政策机制有利于鼓励和引导边民抵边居住，对巩固边防，改善边民生活，对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边民补助是国家联结边民的政策纽带

陆地边境治理关乎边境安全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长期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在发展的各方面都处于末梢，这不仅增加了边境治理的难度，也影响了边民的生产生活。边民补助作为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旨在改善边境民生和促进边境发展，是对常年在边境地区抵边居住生产生活的边民予以的补助。边民补助对于边民来说是一项政策性收益，实实在在发到手中的一笔钱，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项倾斜边境发展的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本质上凸显着国家与边民的互动关系，是国家联结边民的政策纽带。随着国家边界的清晰，主权意识和领土意识的增强，国家通过边民补助政策与边民进行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越云南段边境虚空化调查与引导边民抵边居住研究”（项目编号 2021Y058）；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边民补助机制的国民身份塑造作用研究”（2020120）。

作者简介：曹莉，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边境治理。

有效互动，使得边民直观地感受到“国家权力在边境”。国家不仅通过边境政策来建构和形塑边民的国家意识，同时还推进边民角色转型与国民身份的塑造。①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各地的边民补助名称杂乱不一，如广西的“0～3 公里边民生活补助”，云南的“沿边定居边民生活补助”“边境居民补助”等，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把边民简单界定为沿边定居居民。这既不利于强化边民的国民身份，也不利于科学规范补助标准。从各边境地区相关的边民补助管理办法看，广西的补助对象为户籍和固定住房都在陆地边境 0～3 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而新疆扩大到 0～10 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且还需持有草场证。基于多地边境政府的相关文件与边境现实情况，可将边民补助对象大致概括为：户籍在陆地边境一定范围内且拥有固定住房，居住满 6 个月以上的中国公民。边民补助对于边民来说，是关乎切身物质利益的政策，就补助标准而言，率先建立边民补助制度的西藏，实行差异化补助，2020 年未定边界一、二线边民补助年人均分别为 6000 元、5400 元，已定国界的分别提高到了每年 5000 元/人和 4500 元/人/年。② 随着国家能力的提升，边民补助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动辄上亿的资金，这背后彰显着国家财力的雄厚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党和国家对边境的关怀。

近年来，“国家在场”的象征意义不断在边境地区延伸，边民补助政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搭建起了国家与边民互动的桥梁。边民补助是联结着国家与边民的情谊纽带，也蕴含着国家和边民的利益关系互动，在边境地区，建立边民补助政策机制既是国家力量和国家象征从中心延伸到边缘的过程，也是培育边民爱国固边意识和加强国家认同建设的过程。对此，边民补助绝不能简单地发放，更多的需要各级政府将该政策宣传到位，发挥好这一政策机制具有的边境治理作用。例如，云南省陇川县在慰问活动中就强调，“边民补助是宣传中央惠民政策及国家对沿边定居居民的关心和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爱边境居民，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好生产生活，守好边境一线，千万不能用之吸食毒品、参与赌博，做违法乱纪之事”。③ 可见，边民补助对边民边民具有一定的调动性和约束性，在边境治理中，我们需要抓住这一政策契机增强边民意识，塑造国民身份，从而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民意识本质上属于一种国家意识或国家认同，具有特定的区域性和群体性内涵。④ 无论是边民意识还是边民身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国家，国家以不同的制度、政策机制来整合边境治理资源，塑造着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边民补助政策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助推了边民摆脱贫困生活，另一方面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国家与边民互动的政策纽带，切实维护着国家和边民的共同利益，但是边民补助政策在实际的运行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现行边民补助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边民补助发放来看，边民补助蕴含的陆地边境治理功能都还未凸显，仍然存在着标准不统一、政策宣传不到位和管理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边民补助政策的效能大打折扣，若要不把边民补助发成“糊涂账”，我们就需要厘清现行边民补助政策存在的问题。

1. 边民补助标准不统一。具体表现为：管理办法不统一、补助对象不统一、发放标准不统一、补助名称不统一、补助范围不统一和发放时间不统一六个方面。目前，从中央到边疆省区的政府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多数边境州（市）或边境县（市）都实施自定的管理办法，并且很多细则不完善，在补助对象的界定和补助范围上存在较大争议，甚至一些边疆省区至今仍未出台明

① 杨丽玉：《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86—91 页。

②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西藏自治区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1 年 2 月 10 日，http://www.xizang.gov.cn/zwgk/xxgk_424/zxxxgk/202102/t20210210_193050.html,2021 年 4 月 25 日。

③ 陇川县人民政府：《陇川县举行边境地区边民补助发放现场会》，2014 年 1 月 14 日，http://www.dhlc.gov.cn/Web/_F0_0_045TAJUUM31MI71MO0LOE4REYN.htm,2021 年 4 月 25 日。

④ 孙保全：《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5—73 页。

确的管理办法，笼统地发放这笔钱。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管理办法缺失，导致各边境县在因地制宜执行政策时缺乏政策依据，形成了边民补助标准不统一的局面，边民经常糊涂地得到这笔钱又糊涂地用之。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中，通常可以看到边民询问：为什么同样情况他有边民补助，而我没有？今年边民补助何时能发？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表明边民补助政策亟待统一标准。

2．边民补助政策宣传不到位。边民补助通常是依托金融机构间接将钱分批发到边民的个人账户中，在政策宣传时间上比较迟缓。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和边民对补助政策的认知都较为模糊且普遍存在认知偏差。边境地方基层政府承接着发放边民补助的工作，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一政策的目的传达给领取补助的边民。但是基于工作的繁杂与认知不全面，分管这一业务的多数工作人员对这一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都一知半解，在工作中只是核对应发补助的边民名单，形成数字数据的划定者。因此，自上而下的宣传不到位，使得边民对政策出现认知偏差，有的边民误将该补助混同其它惠农补贴或者扶贫收益，有的则直接不知有补助政策。这种“领钱不知政策，认钱不认政策”的现象，极不利于增强边民守土固边意识、加强边民国家认同建设，从而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边民补助动态管理难度大。边民补助的对象并非泛指的边民群体，各边境政府都会依据边境情况作出界定，而边境地区进城务工人口较多，人员流动频繁，在边民的动态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为更好发挥边民补助政策的守土固边作用，政府相关部门多按照“应发及时发，应退及时退”的原则予以补助。一般边民获取补助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是在户籍地居住满 6 个月及以上，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很少将其严格贯彻落实。由于边境地区的数字化政府建设较落后，核定边民抵边居住是否满半年及以上是一个庞大繁杂的工作，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忽视这项工作，将边民补助最大限度地发放给边民。此外，边民户籍变动情况影响着边民补助的发放，而这些信息缺乏共享机制，出现人走后还仍然领取补助的现象，这极易引发边民投机取巧地骗取补助。信息化系统、数字化政府建立迟缓，阻碍了边民补助政策引导边民抵边居住和发挥守土固边的作用。

4．管理职能不清晰。目前，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政府部门的权限还不清晰，尤其涉及财政权，边民补助资金是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由财政部门逐级下达。这笔钱实行专款专用，各级政府仅承担转接和发放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协助完成，如民政、财政、公安等部门，但在管理职能上则较为混乱。在管理实践中，时常出现政府部门间的推诿扯皮现象，各部门都不愿承担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不仅出现问题需要担责，还面临着其他部门以及边境群众的监督压力，所以导致负责部门不统一。一些地方的边民补助管理是财政局牵头，而一些地方则是民政局，至今未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这样使得边民补助的发放、管理和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受到极大影响。

现行边民补助政策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对于我国建立完善的边民补助政策机制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边民补助是调动边民守土固边积极性的重要政策机制，我们需要针对问题去挖掘出它所蕴含的陆地边境治理功能，以更好发挥其政策效用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

三、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蕴含着陆地边境治理功能

边民补助政策对于边民来说是国家关怀边境最直接的感知，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中，边民拥有领取边民补助的特殊权益，同时也有着特殊的责任义务。从权责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守土固边始终是边民补助政策机制的一个目标导向，所发挥的守土固边作用蕴含着以下几方面的陆地边境治理功能。

1．财政杠杆功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边境治理的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越来越大，这凸显着国家有实力、有条件地改善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缩小边民的收入差距。陆地边境地区发展条件落后且生活条件艰苦，国家特此建立边民补助政策机制来调节地区差异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首先，边民补助是一种财政补助，在发放中一般以边民个体计算，个体边民的补助汇集到边民家庭就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数目，不仅增加了边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边民的生活水平。其次，边民补助是国家倾斜性的补助，为贯彻落实兴边富民行动，鼓励边民抵边居住生产生活，履行守土固边的责任义务，我国不断地加大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边民补助标准。最后，边民补助是调节性的补助，补助发放多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一线、二线和内沿边民补助三种，

主要依据抵边居住地到边境界线的距离来划定，不同档次调节着边民守土固边任务的轻重。边民补助政策机制是国家与边境共同发展的一种具体方式，从不同方面凸显着财政杠杆和调节作用，以引导边民从政府的约束变为自发自觉的守边固边。

2．符号象征功能。边民补助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既是对边民身份的象征，也是国家“在场”的象征。边民补助的对象是特定范围内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边民，在边民身份的基础上同时还具有国民身份。国民身份作为“元身份”，承载着“国”与“民”之间的关联，不仅包括以民族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情感关联，而且还包括这种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目标诉求。[①] 边境地区虽处于国家的边缘部分，但是通过边民补助这一政策机制将边民和国家凝结在了一起。对于邻国而言，边民补助是国家政策交往交流的符号象征，其背后暗含着国家实力和财力的比较。边民补助政策作为边境地区的一种符号象征，首要的就是符号的政治性，可以促进边民的政治社会化和塑造国民整体性，其次才是符号的经济性，是为改善边境地区的民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政策，最后是符号的社会性，是国家与边民、边民与非边民、邻国两侧边民交流的连接点。作为符号象征，边民补助政策搭建了国家与边境地区政治沟通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功能。

3．认同建设功能。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联结着国家边缘和中心，对于边民具有重要的认同建设功能。首要是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和国民意识等紧密相连。在中越边境调研中发现，中方的边民通常会说“越南人的爱国意识比我们强，我们如果有人去他们那边，越南官兵很快就会知道”。可见，越南边民对于国家意识有强烈的认知，据了解，越南对居住在边境一线的居民给予的补助是为了鼓励边民收集边情及维护边境管理，这无疑凸显了补助政策对于国家认同的功能。其次我国的边境地区大多是民族地区，在国家认同建设外，我们还需建设边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即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实现边境情感治理的价值最大化。[②] 认同建设是政治心理的一个渐进过程，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边民补助政策机制中不断去加强边民的国家意识。最后是边民对地方政府的认同建设，边民补助是由边境乡（镇）一级政府进行补助对象的审核及发放，在这一环节中直接与边民联结互动，地方政府做的好与不好直接影响边民对政府乃至国家的认同。

4．身份塑造功能。在边民补助政策机制中，主要包括边民身份和国民身份两方面，两者并非是完全孤立的身份，在边境治理中多有重合之处。无论是边民身份还是国民身份，都是国家塑造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每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身份最后总是要回归到国民身份，因为这是伴随国家产生而自然衍生的国民，需要通过各种机制去不断地建构。随着我国陆地边境勘界的基本完成，国家界线的明晰，边民的自由流动空间是相对缩小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边民的身份塑造，从而推进边境地区的人口国民化。[③] 在边民身份塑造方面，边民享受该政策福利的同时也有守土固边的义务，需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然而，目前各地区公开的《边民补助管理办法》中，仅有绿春明确规定享受边民补助的居民，有参加巡边、守边、固边、维护边境安全和稳定的义务。在国民身份塑造方面，边民首先是作为国民存在，国民身份是第一位的，边民仅是以边界区域来进行区分的群体，并且依托国家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国民身份带来的地位和便利远超过边民身份。在具体的边境实践活动中，两者的身份往往融合在一起，我们需要不断塑造这双重身份来增强边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稳定边境。

5．权责调适功能。边民补助资金来源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有权管理和支配资金，但也有权规定边民具有守土固边的责任和义务。符合条件的边民领取国家给予的边民补助是其合法权

---

① 袁年兴、李莉：《身份治理的历史逻辑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的实践困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76—81 页。

② 方盛举、朱海威：《边民帮扶政策与边境治理现代化——以云南省 X 县为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第 6—16 页。

③ 周平：《国民对现代国家的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135—146 页。

益，当这项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维护。近年来，各边境地区关于边民补助的信访件越来越多，在网络上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当边民的这项政策权益未能保障时，都会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诉求，然而在维护权益的时候往往忽视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边民补助的标准按照各村寨抵边的距离分为不同的档次，如云南省麻栗坡县分为三个等级①，不同标准承担的责任也有所区别，在边境疫情防控中尤为凸显。依据边民补助的差异对边境卡点防守天数做出不一样的要求，这就蕴含着边民补助的权责调适功能。除此之外，边民的法律义务也尤为重要，边民作为国家公民，需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若违反相关的法律将取消整个家庭的边民补助。边民补助作为边境治理中边民权责调适的政策机制，直接与边民的责任和义务挂钩，不仅体现边民有权益领取这笔钱，还有责任和义务守土固边。

四、边民补助政策机制的优化

边民补助政策蕴含的陆地边境治理功能强化了边民守土固边的国家意识，对边境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边境惠民政策，边民补助政策对邻国的边境政策有着交流和象征作用，我们在建立和完善我国边境政策的同时也要吸收借鉴邻国的边境政策。但在边民补助政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该政策机制。

（一）制定专门管理办法，统一边民补助标准

现行的边民补助政策在实施方面存在标准不统一，极易引发边民或边民与政府间的矛盾，需要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为边境州（市）、县（市）实施边民补助政策提供参照依据。首先，在补助对象和补助范围方面，不能简单以边境距离来划分，需要结合实际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作出合理的界定，坚持引导边民抵边居住生产生活为原则。对常年抵边居住生产生活且发挥守土固边作用的群体，也应该纳入边民补助发放之列。如抵边农牧场的居民、牧民。其次，应在发放标准上各边疆省区作出统一，明确一线、二线、内沿的标准，在发放时间上全国各边疆省区统一分层次发放，并将相应的发放标准明确在具体管理办法中，及时予以公开。最后，在补助名称方面，所有边疆省区需要统一，以便于边民补助政策的宣传和规范。可从边民补助政策蕴含的功能中将名称统一为“边民守土固边生活补助”，可简称为“守边补贴”，这一名称不仅体现着边民补助发放的作用，也让边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抵边居住的责任义务。

（二）建立边民补助奖惩机制，动员边民守边固边

边民补助作为边境治理的一种奖惩杠杆，须与边民的职责义务挂钩，以引导边民抵边居住发挥守土固边的功能。对非法出境和协助他人入境、雇佣“三非”人员，破坏界碑、界桩，走私制毒物品，贩卖、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行为的边民，都视为不履行守土固边义务，停发边民补助。然而，目前的边民补助管理办法中，只把部分违法行为作为惩罚机制，在边民守边固边方面并未作出奖励机制，这就需要我们注重边民补助奖惩机制的对等性，不能只作为一种惩罚杠杆，而忽视奖励杠杆。为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云南省红河州对群众举报作出了高额奖励，通过举报线索抓获“三非”人员可奖励 1000 ~ 50000 元，举报走私、暴恐等边境重大案件的，奖励 1 万元至 10 万元。②显然，边境地区虽有对违法犯罪举报的奖励，但未发挥边民补助政策的财政杠杆和权责调适功能。边民补助的资金来源中央对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实行专款专用，在管理办法中仅列出不予发放的细则，而没有列出奖励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动员边民守边固边。边民补助需要紧紧与边民行

① 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边民补助标准：一线边境居民每人每年 2500 元，其中建档立卡户每人每年 3000 元；在抵边行政村居住除一线边境居民以外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 1000 元；在抵边乡镇居住除一线边境居民、抵边行政村居民以外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 600 元。

②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红河州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对群众举报出入境违法犯罪给予奖励的通告》，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www.hh.gov.cn/zfxxgk/fdzdgknr/zdlyxxgk_1/tjmxzylhrydfwgk/wjgk/202009/t20200922_471306.html,2021 年 4 月 15 日。

为联结在一起，以利于建立边民补助奖惩机制，从而调动边民守土固边的积极性。

（三）完善国防教育体系，加大边民补助政策宣传

发挥边民补助的国家认同功能需要定期组织爱国教育，将国防教育课堂融入边境教育中，培育边民的爱国意识。如黑龙江省抚远市将国防教育课堂设在边境线上，与宣传边境政策、处理边境违纪事件、普及法律相结合进行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不仅仅是课堂形式，还可以融入更多灵活的方式进行，紧紧把边民的国防意识与爱国意识联系在一起。边民补助政策在实施中通常表现为边民“领钱不知政策，认钱不认政策”的现象，因此，边民的国防教育应该从娃娃就抓起，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围绕更多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从而让国家意识牢牢嵌入心中。近两年，边境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深入边境一线，就地露天审理或在抵边村委会审理案件。以案释法，其中涉及停发边民补助结果，从侧面凸显了边民补助政策的权责调适功能，一方面加强边民的国防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是对边民补助政策的宣传。

（四）搭建边民补助信息共享平台，嵌入大数据治理模式

在边民补助政策的实施中，涉及到政府间多个部门的信息沟通，如财政局、民政局、公安部门、教育部门、代理金融机构等，而边民补助政策核实一般为边境乡一级的政府和村委会，对于基层而言，信息共享是其堵点也是痛点。每年各省区的边民补助发放，从上到下各部门间都有不同的职责，需要协助合作完成边民补助发放，每个部门的信息都关系着边民的利益。然而，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边民补助信息共享平台，这不仅影响了边民补助管理的效率，还加重了各部门的工作事务。大部分边境地区在每年领取边民补助的资格审核中，都需要边民带着相关证明材料到村委会进行登记，有的边民要跑多次才能拿到这笔钱。基于此，我们在建立完善的边民补助政策机制中必须具备大数据思维，采取大数据模式。同时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到边境基层政府服务国家和人民，开发相应的系统管理边民补助工作事务，建立完善边民补助信息系统。

（五）健全政策运行责任机制，强化各主体管边控边意识

边民补助政策机制的运行涉及多个主体参与，每个主体都有相应的职责所在。每年或者每月的边民补助发放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各责任主体必须厘清自身职责，压实各级各部门的责任，加强有效沟通。健全边民补助政策的责任机制。一是落实调查、审核、认定和发放的工作责任制，划定各个环节的责任负责人，对边民补助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追究责任。二是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了解边民补助政策的目的以及特有的治理功能，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做好这一政策与边民的联结。三是加强边民补助工作的监督，不仅是上级部门的监督，还有社会公众的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做到及时回应。在管边控边中，不仅要落实政府部门的责任，更需要看到边民的责任，边民守土固边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元。[①] 依托家庭固边的形式，增强边民守土固边意识。如孟连县的多个边境乡镇形成了“班户联建”管理模式，以“班”为主体落实个体责任，切实维护边境安全，保障人民健康。[②]

在陆地边境治理中，守土固边既是边民的责任也是义务，这不仅保障着边境人民的健康与安全，也保障着国家安全和稳定。国家通过边民补助政策机制将边民联结起来，让边民直接感知“国家在场”，这对动员边民抵边居住和守土固边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现存问题，我们需要从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高度来看待和审视边民补助。而建立边民补助政策机制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各主体积极参与和整合边境治理资源形成合力完成。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夏文贵：《以家固边：边民家庭发展政策的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48—57 页。

② 普洱市人民政府：《孟连：深化拓展“班户联建”强化边境治理》，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www.puershi.gov.cn/info/1340/98300.htm，2021 年 4 月 20 日。

文化建设

现代华人“异中求同”的艺术创作

——以郎静山摄影中国化和张大千泼彩抽象化为例

刘梅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台湾 台北 100）

摘　要：笔者探讨现代华人“异中求同”的艺术创作，主要是因为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在《中国现代美术革命》一文中说到：“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怎么能拒绝文化艺术的现代化呢?”既然文化艺术不能拒绝现代化，现代华人处于过往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异质文化交汇的时空之中，面临着传统文化精神如何实现现代化及如何创造符合世界性的视觉语言等问题。在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异质文化”的融合将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基础，现代艺术家的创作手法亦多是在不同文化思维与形态中寻求“异中求同”的创作表现，这在文化认同上可视为一种“同化”现象或是一种“异化”现象，不论是哪一种都可以说是文化思维的变革与创造。“文艺复兴”的文化思维便可说是最具体的表现，“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发展与创造将为未来的中华文化开启面向世界的新局面，郎静山将西方摄影科技艺术诠释为中国古典绘画意境；张大千将传统色彩与绘画技法重新诠释为现代西方抽象意象，这便是“异中求同”的文化精神与表现，也是现代华人面临现代世界所创造出的世界性的文化意象。

关键词：现代华人；异质文化；现代文艺复兴；摄影中国化；集锦摄影；泼彩抽象化

中图分类号：J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88－11

一、前言

西方哲人黑格尔曾形容中国文化是背对海洋的文化，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就面临来自海洋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战争所导致的民族迁移。在现代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华人[①]艺术家自 20 世纪以来益发活跃于世界舞台上，20 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可以说开启了现代中国文艺复兴，如“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博士《孔学今义》序文中所说“今日之时代可称为文艺复兴的大时代”[②]，这带动了中华文化艺术对内现代化以及对外世界化的发展。除了面向西方世界、融贯中西之外，张其昀还认为“要向未来前进，必须打开过去之门”[③]，明白指出现代华人艺术家在海洋异地与大陆本土的差异性下要开创现代性、世界性的艺术创作，须先打通传统文化才能面向世界开创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新

作者简介：刘梅琴，“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馆长。

＊本文所涉图片见封三前彩色插页“插页 1”“插页 2”。

① 明清以前中国迁往海外的移民在当地聚集通称“唐人”，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便以“华人”称之，其聚居地通常称“唐人街”。

② 张其昀：《孔学今义》序文，台北：文化大学华冈出版部，2011 年，第 2 页。

③ 中华学术院主办，大会秘书处编印：1968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第一届国际华学会议实录》，1969 年，第 71 页。

局面。是以，现代华人艺术家要为中华文化艺术找到登上世界艺术舞台的共通性语言，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海洋与陆地等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中创造出“异中求同”的共通性，才能开创现代中国文艺复兴。以下便以郎静山的“摄影中国化”和张大千的“泼彩抽象化”为例，说明“异中求同”的文化内涵与西方传统“文艺复兴”的精神如何表现在现代华人的艺术创造之中。

二、现代华人艺术的现代化课题——“异中求同”与“文艺复兴”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以“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简单的两句话来表达时空概念，“古往今来”涵盖了传统与现代，而“上下四方”则包括了东方与西方、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实际上现代华人正是身处于古今传统与现代时间的交错与面临海洋文化与陆地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之下。因此，现代中华艺术要跃登现代世界文化艺术的舞台，就必须了解“异中求同”的文化内涵与“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进而从差异中创造出共通文化价值，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其意义就如同传统西方文艺复兴[①]的概念，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再诠释，以及异质文化相互融合后的统一与创新。

现代西方文化思维的特质源自于两种文化，亦即东方希伯来宗教文化与西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两希文化（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在西方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本意虽为「古典的再生」，但其实质却是在现代的时空背景与异质文化交汇之下的重新再诠释与再创造。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Mixed technique，460 * 880cm，Convent of Aanta Maris delle Frazie，Milan），虽是中世纪以来常见的宗教艺术题材，但已不再强调基督即将上十字架为世人牺牲的神圣的宗教情怀，而是以基督所说的“你们之中将有一人背叛我（one of you should betray of me）”一句作为绘画主旨，描绘以犹大为代表的人性的背叛。所以，虽然同样是名为《最后的晚餐》，但艺术意涵已从中世纪的以“神”为主转换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以“人”为主。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中说：“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那里，宗教主题、题材和形象的借取，往往只是体现纯粹的世俗内容的一种独特的方法……这种同宗教观念不相容的世俗内容……就连神学家也都承认……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那一时代的其他许多艺术家的宗教主题画，并不符合教会艺术的要求。”[②] 这就说明文艺复兴的文化功业，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神圣性转换为现世的世俗性，借用恩格斯的话就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③]，同时也使西方的古典文化走向现代化，在异质文化的融合中产生变异并创造出新的文化艺术。如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画家波提切利（BOTTICELLI，Sandro）1475年创作的《贤士的崇拜》（Adoration of the Magi，c. 1475，Tempera on panel，111 * 134cm，Galleria degli Uffizi，Florence），画作中便以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取代东方三博士朝圣，并由大家长 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 跪在圣母与圣婴面前，将历史的、宗教的、神圣的时空与现代人物结合以凸显出现世世俗人物透过绘画艺术与宗教的神圣同时存在。波提切利的另一幅画作《春》（Primavera，c. 1482，Tempera on canvas，207 * 319cm，Galleria degli Uffizi，Florence）中描绘着衣的维纳斯，其所代表的美与圣洁可比拟基督教女性形象的圣母玛丽亚，而其

① 参见拙文《从大千画艺看现代中国文艺复兴》，《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第 3 期，第 105 页：“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一词即 ribirth－‘再生’之意，从传统复古的角度而言是‘古典的再生’，但实际上是将千年中世纪以来在希伯来宗教与蛮族入侵之下消亡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三者的融合，因此这不但是传统与现代或是不同地域空间的差别，更是异质文化相互融合之后的重新再诠释，因此与其说是‘再生’，实则上是融合后的统一与创新，所以‘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整合，而其文化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异中求同’的统一与创新，而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开端。”。

② ［苏］乌格里诺维奇著：《艺术与宗教》，王先锐、李鹏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第 97—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59 页。

《维娜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c. 1485，Tempera on canvas，173 * 279cm，Galleria degli Uffizi，Florence）中描绘裸体的维娜斯，是非基督教女性的裸体艺术作品。古典希腊罗马女性裸体艺术的文化，是表现“人性”与“自然”的美之代表。维娜斯诞生自海洋，属于“无性生殖”，代表人性裸体自然纯洁的美，以及将人的原罪经过宗教神圣洗礼后的圣洁的美。这两种美，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宗教神圣的，两者异质但同为“美”的象征，互不矛盾冲突。可以说裸体的维娜斯在文艺复兴的文化氛围下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基本精神。

上述作品说明在基督教文化世界中，西方“文艺复兴”如何以“异中求同”的概念表现出代表现世的、人性化的、世俗性的时代精神。而关于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之关系，谢寿康于《中国绘画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之影响》一文中介绍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博西纳（Pouzina）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在巴黎刊行《中国意大利与文艺复兴初期》一书，博西纳通过系统性的分析，认为中国绘画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源泉，“西方绘画之重要对象为人像。文艺复兴造像之特点为生动。依据博教授，当时造像之所以能别开生面，使其生动，系由于模仿中国技巧”。[①] 对此，谢寿康引述博西纳教授举出的四个例证，认为在技巧、构图、题材、造型等方面有如下特点：一是手势与动作。认为中世纪的造像无一例外两手下垂，但文艺复兴画家则效法中国绘画的“手势表情”来表示“引诱”、“拒绝”、“崇敬”等情感表现，同时“画面的手掌手指亦均采用中国画法。从前的手掌画得宽，手指甚短。此后则手掌更小，手指长，指尖细”。二是脸部面向与姿势。14 世纪以前的欧洲绘画，人物面部多正对观众，“文艺复兴画家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缩写方法，在西方首先画侧面，背景人物及蹲坐斜卧等缩景”。三是眉眼造型。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有细长的眼眶与细眉，眼珠直视或斜视或半斜视，而非传统正圆的眼眶与直视的眼珠，故认为“文艺复兴初期画家描写眉眼，一律用中国方法”。笔者以为如对比张大千临摹敦煌《普贤菩萨赴法会像》粉本局部与马提尼（SIMONE MARTINIM）《受胎告知》（Madonna in Glory with Musician Angels）脸部与眉眼描绘，或概可见相似之处。博教授还列举了乔托的耶稣造像与马提尼的圣母造像，认为其“简直是中国人的模型”。而乔托的三王来朝图（Adoration des Mages）中的人物是“两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其中一人并留有下垂的‘八字胡’……”四是此外博西纳教授亦认为文艺复兴初期画家不画裸体女性、创造群众结构、将天然风景融入绘画、描写妖怪及神话动物等等亦是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②] 中国绘画不画裸体女性，这与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是一致的，欧登大教堂北面门楣上雕刻的裸体夏娃（Giselbertus，Eve，limestone relief sculpture，Saint Lazare，Autun，France – Romanesque），代表的是人类原罪的象征，从中不难看出与中国文化的“同”与“异”。如将张大千《安西榆林窟第五窟普贤菩萨赴法会像》中普贤菩萨与马提尼《Madonna in Glory with Musician Angels》中描绘的圣母形象相对照，便可看出两者相似之处（见图 1）[③]。

如果说“文艺复兴”让西方文化有了新的契机并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开端，那么我们会发现“文艺复兴”在回归西方传统的同时也是望向东方的（见图 1）。从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流、融合、统一与创新一直持续进行着。同理，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就应该是也必须是在回归传统“打通过去之门”的同时也是“望向西方”沟通中外的。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再显的时代。”[④] 那么，下一阶段未来

① 谢寿康：《中国绘画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之影响》，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中意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6 年，第 2 页。

② 谢寿康：《中国绘画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之影响》，第 2—3 页。

③ 图片来源：张大千《安西榆林窟第五窟普贤菩萨赴法会像》局部，“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典藏。图片来源：https://www.wga.hu/index1.html 马提尼（SIMONE MARTINIM）《Madonna in Glory with Musician Angels》，（detail）1311 – 14，Fresco，Oratorio di San Lorenzo in Ponte，San Gimignano。

④ 张其昀：《〈中国之文化复兴〉序》，《张其昀先生文集》第 21 册，台北：“国史馆”出版，“中国文化大学”发行，1989 年，第 11545 页。

图 1

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将是中华文化与代表西方世界的两希文化的整合。张其昀曾引朱熹（1130－1200）《晦庵续集·卷二》中记载：“岂非天旋地转，浙闽却是天地之中也耶。”[①] 认为未来的中华文化是否可以翻转世界文化，让中华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之中心，就要看中华文化艺术是否能打开传统的大门走向世界，如孙中山先生《自传》中曰：“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仁岛 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先生对于中西文化，“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②]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即在于不论是革命精神或博爱的文化理想，都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中革命精神的两个来源，一个是汤武放伐，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博爱”的文化理想则是来自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相承之道统”[③]。此外，便是孙中山先生崇仰西方基督教耶稣神爱世人，为世人牺牲的宗教情怀。如他曾自言：“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能博爱，即可谓仁。”“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何谓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④] 是以从孙中山先生思想“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知难行易”等，皆可看出其融合中西的创新思想是“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重新诠释并于“异中求同”中再创造，这也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现代海外华人艺术家应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文化使命，即是一种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激发挑战之下的文化创造，而“异中求同”的创新思维亦应是现代华人创造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艺术的现代化课题。

英国艺术史学家苏立文在《中国现代美术革命》一文中曰：“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怎么能拒绝文化艺术的现代化呢？”[⑤] 而所谓“文化艺术的现代化”，笔者以为除了画坛上所提出的“现代国画”“中西融合”等艺术的变革外，最重要的当是“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博士所提出的现代“中国文艺复兴”[⑥] 的文化理想与基本精神，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更须去己之短，取人之长，参考欧美已往之学理与经验，顺应世界之新思潮”[⑦]，向未来前进的同时也须

① 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九册，台北：“国史馆”出版；“中国文化大学”发行，1988 年，第 4657 页。

②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 年，第 389 页。

③ “《国父年谱全文检索系统》”，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2gsweb.cgi？o＝dchronicle&s＝id＝％22YC0000001923％22.&searchmode＝basic，检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7 日。

④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第 912 页。

⑤ 麦克尔·苏立文著，陈瑞林译：《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年，第 229 页。

⑥ 参见张其昀：《文艺复兴刊号致辞》，《文艺复兴》1970 年 1 月 16 日。其中提到：“‘两柯相接，乃成异卉’。文化发展的程序，也是如此。一个旧的文化，吸收了新血液，焕发了新生机，从而创造出新时代，这就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化复兴，或民族复兴。”并言：“从中国历史来看，每一个新阶段，实际上都是由于文艺复兴而促成了新机运的来临。”

⑦ 张其昀：《“国父”全书序》，《“国父”全书》，第 1 页。

“打通过去之门”，并将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分别以玄奘法师、徐光启和孙中山为代表人物[①]，说明这与西方文艺复兴融合异质的文化并重新诠释传统，进而创造现代文化新的生命的精神意涵从根本上是相同的。是以，笔者以为不论是“两柯相接”或是“兼采众长”，文化艺术的创造必须符合人类生命共通的本质才能创造出世界性的语言，因此“异中求同”将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异质文化的差异中，找到文化视觉思维的共通性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才能开创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而实践中国“文化艺术的现代化”。以现代时代的独特性而言，现代艺术如何赋予传统以现代化的再诠释，并与异质文化融合之后进行再创造，是实现这种“异中求同”的关键。以下便以郎静山和张大千为代表作论述，虽然一为摄影一为绘画，表现的媒材不同却皆能在中西文化艺术的差异中找到“异中求同”的统一与创新。

三、郎静山与张大千“异中求同”的艺术创作

郎静山（1892 – 1995）与张大千（1899 – 1983）同为 20 世纪中国艺坛大家，郎静山以现代摄影蜚声国际，张大千则以中国书画扬名世界，两位大师艺术成就共通之处就在于皆以中国传统艺术之文化理念与根本精神为基础，重新诠释并创造出符合现代视觉艺术的世界性语言，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代表。郎静山得谢赫“六法”，将中国画理运用到西方摄影，是以“传移模写”之理变化西法而得中国绘画意象之“集锦摄影”（Composite Photography）之第一人。而张大千得敦煌壁画“六法之神皋”，变传统“泼墨”为“泼彩”，融入现代抽象画之表现手法，变传统色彩平涂技法的象征性，为现代色彩自由表现的独立性，都是藉“古法生新奇”的创新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艺术家皆同时爱好书画与摄影艺术，私下亦以兄弟相称并相互赞赏。1967 年 9 月张大千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博物馆（Cantor Arts Center）、旧金山克密尔（Carmel）乐凯美术馆（Laky Gallery）举办展览，郎静山受邀前往，后于《我和张大千先生》一文中提到：“……他的作品有人物、风景、花、鸟，各种题材，有中国传统的艺术，也有新颖的创作。所谓新派，实际也是中国早发明的，如泼墨是本来有的，不过他的泼墨有新奇的见地。所谓‘行万里路’，这又是他实地研究的地方，人家不易及此。他的大青绿泼墨，这是他发明的，古人虽有点这意味，不能有他各种面目，各种境地，各种造意，所谓无所不能，才有今天的成功。”并言：“他现在也会照相，但是他的胸中，已将海岸的大自然景色囊括而去，我的摄影比不上他的用处多。”[②] 对此张大千则于《郎老觅景图》中谦虚地说：“与静山兄同游克密尔为摄此影，真俗所谓孔子门前卖孝经也。”[③] 并于 1979 年题郎静山《群峰耸翠》（图 2）[④] 曰：“静山先生摄取全国诸胜，并远及海外，集以为卷，妙造自然，有如天孙云锦之衣，无觅其针线之迹，抑何神也。静山固工画，得荆关倪黄遗意，纳之镜中而镕治之，非信手拈弄者。”而 1981 年“九十叟郎静山”作《秋色满湖亭》（图 3）[⑤]，大千题曰：“清芬之气如接眉宇”并“添写小舟远山”，[⑥] 概可见两位融贯了中西、传统与现代、绘画与摄影之艺与道。以下便分别以郎静山“摄影中国化”与张大千“泼彩抽象化”来说明之。

（一）郎静山“摄影中国化”

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郎静山曾言：“本人从事摄影的最大志愿，乃凭西方科学的机械

① 张其昀：《会议开幕词》，《第一届国际华学会议实录》，台北：“中华学术院”主办，大会秘书处编印，1969 年，第 71 页。

② 郎静山：《我和张大千先生》，“《中央日报》”1967 年 10 月 20 日，第 6 版。

③ 蓝玉琦：《松柏千年茂 乾坤一镜收 华冈博物馆“郎静山与张大千艺术展”》，《典藏古美术》2020 年 1 月，第 74 页。

④ 张大千：《群峰耸翠》，18 ×100 厘米，1979 年，“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藏。

⑤ 张大千、郎静山和绘：《秋色满湖亭》，45 ×84 厘米，1981 年，水墨纸本，图片来源：https://auctions.artemperor.tw/2017_spring/details/3159，检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8 日。

⑥ 文震斋：《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 郎静山大师的八十年摄影生涯》，《更生日报》，花莲：1984 年 4 月 27 日，第 11 版。另见《帝图拍卖》，https://auctions.artemperor.tw/2017_spring/details/3159，检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8 日。

工具，辅以我国国画理融合，而表现东方文化，以纠正偏差。”① 并言：“我主张在技巧上，应吸收西方科学文明，使照相不再是件难事，但要谈到艺术视界，无论取景或色调，我都认为应多研究国画中所蕴含的旨趣。”② 他认为“唯有让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我们民族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才能显出他的特性来。”③ 是以其以中国绘画“六法”为艺术理念基础，运用西方摄影科技创造出“集锦摄影”，成为代表中国现代艺术之独特风格，而广受西方摄影艺术界之好评，如美国摄影学会会长肯尼迪（Col Joe E Kennedy，1908－1990）便说：“郎先生为中国人，并且又研究中国绘画，所以他是以中国绘画的原理，应用到摄影上的第一个人。”④

对于“集锦摄影”技法之由来，郎静山说是“一百多年前，由一位名叫瑞连德的瑞典人所创。不过，这种表现方式在中国画理上早即出现，像南齐（479－502）谢赫的六法，同出一理”。⑤ 瑞连德即瑞士出生的英国摄影家雷勒登（Oscar Gustav Rejlander，1813－1875）1857 年创作《人生分歧路》（Two Ways of Life）（图 4）⑥ 摄影作品，便是用了超过 32 张底片完成⑦。郎静山于《摄景艺术》一文中便曰：“余自习摄景垂六十年……吾国绘事六法实为艺术之本……集锦摄景之法，传模移写、经营位置、构图成章，创造环境超乎现实……所以摄景艺术与吾国绘事艺术殊途同归，亦足证中国艺术之集于大成也……”⑧ 并言：“我就细心地体会摄影和绘画间的密切关系，发现谢赫的‘绘事六法’……与摄影中光影行动的原理暗合，心中喜之，并感觉摄影的意境重于实体。并从第六法传模移写一法中，悟会出多数底片的局部，放印在同一相纸上，能造成另一种新的艺术性，称为‘集锦摄影’。”⑨ 而其幼时的国画老师纪月庄曾将一丈二尺的宣纸对折多次后在小桌子上作画，画完一面翻面继续再画，最后将一丈二尺的宣纸整张摊开来变成一大幅山水画。这种“拼图”式的创作方式与“集锦”之法亦有“相合”之处。⑩ 1928 年《良友》画报便曾刊载《试马》（图 5）⑪ 集锦之作。集锦摄影成为郎静山摄影艺术之代表并融合了中西不同的人文精神，对于两者的异同其在《关于“集锦摄影”》一文中便解释曰：“……摄影为图画；绘事亦为图画，其工具虽异而构图之理相同，尤以集锦之法，更能与画理相通。”并言：“一以笔墨渲染，一以光化感。”⑫ 进而言及“集锦摄影”之优点：“摄影初限于机械，只能在天然境地中取景，不易改造环境，今有集锦之法，则可取舍万殊。”⑬ 这是人文超越自然的再创造，有如中国传统画论中的“雪中芭蕉”，结合不同时间空间景物，以现代西方艺术言之，则类似于现代艺术拼贴技法或电影

---

① 郎静山：《郎静山先生致词》，《四华文日报联合主办 郎静山摄影名作展》，曼谷：《世界周报》1964 年 1 月 17 日，第 5 版。

② 郎静山：《静山语录》，《郎静山百龄嵩寿摄影回顾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1990 年，第 8 页。

③ 郎静山，《镜里乾坤七十载》，台北：《台湾时报》1978 年 11 月 10 日，第 9 版。

④ “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学会”创会理事长郎静山大师简介》，http://www.chinaphototw.tw/book/aboutme/学会简介/郎静山大师简介/郎静山大师简介.pdf，2020 年 2 月 25。

⑤ 郎静山：《镜里乾坤七十载》，《台湾时报》1978 年 11 月 10 日，第九版。

⑥ Oscar Gustav Rejlander：《人生分歧路》（Two Ways of Life），41×76 厘米，1857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Moderna Museet，Stockholm）藏，图片来源：https://sis.modernamuseet.se/en/objects/40402/two－ways－of－life?ctx=b462849262c18a74d49cef886f00d287b442c7c3&idx=0。

⑦ Rejlander's Two Ways of Life － Part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JwFEHAOxg，检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5 日。

⑧ 郎静山，《静山摄景艺术》，台北：摄影学会印行，1964 年，封底内页，无页码。

⑨ 郎静山：《乾坤一镜收》，“《中国时报》”1978 年 4 月 18 日，第 26 版。

⑩ 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第 13—14 页。

⑪ 郎静山：《试马》，1928 年，图片来源：《良友》画报，1928 年 4 月，第 25 期，第 4 页。陈万里题记：“……固一平淡无奇之情景也，而构图极精妙，布局侧重上部，别以草地一小区遥相呼应，此岂侈谈择景者所能梦见耶……”。

⑫ 郎静山：《关于“集锦摄影”》，《世界周报》1964 年，第 164 期，第 5 版。

⑬ 郎静山：《关于“集锦摄影”》。

中的蒙太奇（photomontage），如其《匠心独运》（图 6）[①] 画面中表现着“工程人员设计构思铁路绘图工作之意”，而工程人员伏案桌前绘制工程图的当下，被画面右方工人铺设铁轨施工与左方铺设完工后笔直的铁轨包围着，将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空间浓缩，同时呈显在一张画面之中，形成了现实与想象结合的艺术张力，让视觉升华为意象性的表现。而其创作“集锦照片”的初衷则是希望“以最写实、最传真的摄影工具，融合我国固有画理，以一种‘善’意的理念，实用的价值，创造出具有‘美’的作品”。[②] 最后其认为“摄影艺术与吾国绘事艺术殊途同归，亦足证中国艺术之集于大成也”。不仅于此，更是因为其体认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摄影家镜头下所呈现的东方人的文化生活，如约翰·汤姆生（John Thomson，1837 – 1921）《中国及其子民》（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3 – 1874）图像集中出现 1870 年代《缠小脚的中国妇人》《福州港的街头乞丐》《在餐馆里抽鸦片》等[③]，“多偏向落后及令人难堪的部分，其实东方文化值得介绍与多采多姿令人向往者，并不在西方文明之下。尤其是文化艺术方面，东西方的观点，是能够达于共通和一致的。所以本人从事摄影的最大志愿，乃凭西方科学的机械工具，辅以我国国画理论，融合而表现东方文化，以矫正偏差。”[④] 并言：“摄影是国际语言。因此，我决定用这种最有利的国际语言，把中国山川之美，文物之博，道德之善，介绍展示给全世界。”[⑤] 郎静山更自豪地说：“自信我的作品都很中国，因为我感觉唯有表现我们民族特质的作品，才有更大的价值。”[⑥]

这一种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自信与创作实践，可以说与张大千如出一辙。早年两人多次登黄山，郎静山 1932 年拍摄《张善孖》（图 7）[⑦]，前景为黄山松，中景为善孖坐在山石上，远景则为远山云雾，旁侧有张大千所题对联：“先仲兄善子五十一岁重游黄山于狮子林，棋枰松畔郎静山先生为之写真，壬寅春八弟张爰。”他还回忆同游情景：“……余登莲蕊后复去始信峰，此次并与大千同行，其峰矗立……惟西海之峰别具生面，多似画家所作之矾块石，峰峰露骨，更无草木可见，望之雄厚而不癯瘦，西洋画家以不着衣人体为线条美，而此群峰婀娜争艳，曲线美尤过之，此国画家之曲线美也，黄山之锋奇而独有，天下所无也。”[⑧] 而张大千亦曾为郎静山绘《郎锦堂遗像》（图 8）[⑨]，描绘其父于松下盘石上独坐闲逸之状，盖可见两位艺术家交情之深厚。游历黄山，郎静山拍摄《旭日晨雾》又名《迎客松》（图 9）[⑩]，张大千拍摄《蓬莱三岛》，并于“黄山书画摄影展览”[⑪] 中共同展出书画与摄影作品，1942 年 7 月 21 日英国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 – 1864）于上海曰：“郎氏（摄影）精纯而引人入胜，既集天才、魅力、激情、灵感于一身，同时却又高深莫测！……当我翻阅这些照片，不禁惋惜董（源）巨（然）、郭（熙）范（宽）和马（远）夏（珪），无缘在今天与我们一起，从郎氏举重若轻的精辟指引中获益。”[⑫] 将郎静山的现代摄影提升到了与古代名画相同之地位。并提及此“photomontage”需要具备审美品味和巧妙的摄影技巧，否则无法成功地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而张大千当时的摄影作品《蓬莱三岛》则与 30 年后（1965 年）其画作《幽谷

① 郎静山：《匠心独运》，图片来源：郎静山：《静山集锦作法》，台北：中华丛书，1958 年，全书无页码。

② 郎静山：《镜里乾坤七十载》，《台湾时报》1978 年 11 月 10 日周五，第九版。

③ 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第 26 页。

④ 郎静山：《郎静山先生致词》。

⑤ 郎静山：《乾坤一镜收》。

⑥ 郎静山：《乾坤一镜收》。

⑦ 郎静山：《张善孖》，1932 年，图片来源：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台北：雄狮图书，2004 年，第 120 页。

⑧ 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第 120 页。

⑨ 张大千：《郎锦堂遗像》，图片来源：萧永盛：《畫意·集錦 郎静山》，台北：雄狮图书，2004 年，第 39 页。

⑩ 郎静山：《旭日晨雾》（又名《迎客松》，27.3×38 厘米），1933 年，“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藏。

⑪ 《郎静山：光之绘画》，2017 年 3 月 13 日，http://www.sothebys.com/zh/specials/eye – on – asia/2017/03/long – chin – san – moments – of – flash.htmlQ，2020 年 2 月 26 日。

⑫ 《郎静山：光之绘画》。

图》之构图相彷佛，除了表现两位绘画与摄影的渊源外，更可看出“照相要照得像绘画，绘画要画得像照相”[①] 的理念。可以说，因这一次黄山之游，让中国绘画意境进入了朗静山的西方摄影之中，也让张大千从摄影中找到了传统绘画笔墨之痕迹。张大千拍摄《狮子林后奇峰》后题曰：“神似云林仿荆浩，笔秀劲处，虽大痴犹有不逮。”[②]

1960 年代张大千邀约郎静山分别于 1963、1965 两度赴巴西八德园拍摄，并于 1966 年出版《八德园摄景》序曰：

“五十二年七月及五十四年十二月两度至巴西张大千先生之八德园……大千先生经营此园已七八年之久，松竹夹道成阴，花木到处繁茂，完全中国风趣不沾洋气，入园则不知身在异土……古树盆景，丘壑幽深，千钧巨石……松阴听涛，雾池观水，移山运石，自强不息，频频创造，大涤瞿山真境，犹挥毫而泼墨，是以园景无尽，余摄景几百幅，仅麟凤一毛，经三阅寒暑，尤集锦数幅，聊尝心愿耳。丙午（1966）夏静山识于留云精舍（钤印：郎静山）。”[③]

八德园所摄作品宛如画中意境，如《一渠春水三曲桥》《意匠惨淡经营中》《万壑松风怒气豪》《松壑听涛声》等，将西方摄影艺术之科技与中国传统绘事之画境融合，最终都“要得神随，使气韵生动，又在乎造型之上矣”。《松荫高士》（图 10）[④] 便是在远山与近景松树间前后置入张大千与飞鹤影像，特别的是此松为八德园之盆栽，经过图像处理后便成为参天巨松，除了乾坤挪移之外亦是伸缩自如。张大千于《群峰耸翠》摄影作品中便题曰：

“静山先生摄取全国诸胜，并远及海外，集以为卷，妙造自然，有如天孙云锦之衣，无觅其针线之迹，抑何神也。静山固工画，得荆关倪黄遗意，纳之镜中而镕治之，非信手拈弄者。卷中第一段为黄山祥符寺，汤池亭前一枯槎，则予三巴八德园物也。至第二则宝岛狮头山之窄堵坡也，末段则为昆明圆通寺园亭也，至四山绵亘、千里不绝为黄山前后瀛，不能悉呼其名矣。展观嗟赏并记。六十八年（钤纪年印一方：己未）长夏八十一叟爰（钤印二方：张爰之印、大千居士）。”

句首言及静山摄影外，接着便强调“静山固工画，得荆关倪黄遗意，纳之镜中而镕治之，非信手拈弄者”。从郎静山 1943 年于刊行《桐云书屋书画摄影合展目录》中水墨画作《峨眉圣积寺》（图 11）[⑤] 与郎静山写树石，吴湖凡补远山《汀树遥岑》（图 12）[⑥]，便可证张大千夸誉不虚。

画面铺陈如山水画卷由右至左观览，依张大千所说卷中景物分别为黄山祥符寺汤池亭前八德园一枯槎、宝岛狮头山之窄堵坡、昆明圆通寺园亭，以及画面后方绵亘千里的黄山前后瀛，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所拍摄之景物“纳之镜中而镕治之”，并以传统书画手卷的形式呈现，可见其所谓自绘画“六法”“传模移写”所得之领悟：“收集材料时，不限于地，不限于时，不限于远近，不限于气候，随游所至，任意取舍。一花一木、一水一石，皆足为集锦照相制作之资料。”[⑦]

除了以上大千于郎静山作品中题记外，溥儒亦为文赞曰：

“古者文以记其事，图以象其形，自海西摄影之术兴而图之为用备然，六法变化之妙替焉，盖陈钟而取形逐物，而摄影比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静山先生始以绘事六法通摄影之术美化山川，旋移云树，善书之有结经，文章之有法则，前无古人，有之自静山始，自西学东渐，国人株守，或不能画其道，君由能改其不善而使之善，诚善用西学在此，宜为之传而光辉口（无法释读）艺

① 郎静山：《静山语录》复印件。

② 汪毅：《张大千张善子与〈黄山画景〉》，2019 年 6 月 15 日，https://kuaibao.qq.com/s/20190615A03TR800?refer=spider，2020 年 3 月 12 日。

③ 郎静山，《静山摄景艺术》。

④ 郎静山：《松荫高士》，33×26.51 厘米，1933 年，“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藏。

⑤ 郎静山：《峨眉圣积寺》，1943 年。图片来源：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台北：雄狮图书，2004 年，第 145 页。

⑥ 郎静山、吴湖凡：《汀树遥岑》，1943 年。图片来源：萧永盛：《画意·集锦 郎静山》，台北：雄狮图书，2004 年，第 148 页。

⑦ 郎静山：《静山语录》复印件。

苑。西山逸士溥儒识。”（见图 13）[①]

而郎静山摄影艺术之地位，从溥儒为其七十祝寿画的《松鹤长寿》和张大千为其八十祝寿画的《松》（图 14）[②]，便可看出南张北溥与郎静山摄影艺术之缘。

郎静山“集锦摄影”如易君左《序》文中所形容：“似画非画，似影非影，而妙在即影即画，即画即影。”（见图 15）[③] 之创作表现，并言：“外乎中国，无此艺术；前乎今日，无此艺术。西方摄影之超妙者止于表意而未能表神，中国绘画之超妙者只于显美而未能传真，唯静山能兼之。”[④] 实际上可以说是“绘事六法”与“善用西学”两者融合之后，“摄影中国化”之一绝佳表现。

（二）张大千“泼彩抽象化”

对于传统绘画的现代化，张大千则认为需要“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⑤] 这一点可以其 1960 年代泼彩画作为代表，而这也是其一生画风中最接近西方抽象形式的表现。张大千一方面“以彩代墨”，转换了传统文人绘画“水墨为上”的视觉观念，并以敦煌壁画艳丽的丹青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强烈色彩的视觉经验融合，并将“泼墨”转化为“泼彩”，即让“泼”所表现出“不质不形”的用笔技法，创造出与西方现代抽象形式相似的“泼彩”，从而将中国绘画升华为世界性的视觉语言。

事实上张大千一生画艺的开创，可以说是以传统临摹功夫为基础。从幼时受庭训到仿石涛，再到临摹敦煌，由近而远溯流而上，由明清而宋元而隋唐，临摹传统一直都是张大千画学之根本，诚如其《故宫名画读后记》所言：“明清之必法宋元，宋元之必法五代，五代之必法唐人，又若有阶陛便其登焉，非可躐而升也。”[⑥] 并言：“盖必习之也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气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以余谫陋，何足以尚论古人，惟事斯艺垂五十年，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差足傲古人。[⑦]”临摹的过程也是不断与古人切磋的过程，所谓“揭古人面目之真，以示来学途径之正”[⑧]，故于《大风堂名迹序》自豪地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之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

而敦煌求艺非但是张大千以“三年之艾”而起“八代之衰”，更是他以华人身份跃登世界艺坛的最大关键，此一关键就在于其以泼彩画打通了东西方共通的视觉语言——抽象。那么他的“泼彩画”是如何“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首先必须了解西画的长处以及其与中国绘画的根本差异是什么。笔者以为这两者之间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概念差异，一是抽象表现，二是装饰性色彩，三是光。西方的现代抽象是与具象抽离，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抽象是大象无形、不似之似，属于超越具体写实意象似的抽象，所以屋漏痕、锥画沙，从外在抽象形式中仍可以感受到内在真实的神韵，并且从唐代泼墨的动感表现中便可体会出大自然山水的酣畅淋漓与人文创作的自由与快感。

1．抽象表现

张大千的“泼彩”则为传统无形乃为大象的抽象做了现代的新诠释，也为现代水墨画开创了新境界。至于他为何会从传统临摹、写意转向“泼彩”表现，笔者以为从他 1972 年的《四十年回

① 溥儒：《溥儒赞郎静山文》，“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复印件。

② 张大千：《松》，137.5×69 厘米，1971 年，“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藏。

③ 易君左，1958 年于香港书曰：“若郎静山之摄影，中外一人而已；千古一人而已！……其作品，似画非画，似影非影，而妙在即影即画，即画即影。盖以现代西方之精湛摄影技术参融于古代中国高深之绘画原理，可谓夺造化之大功，窥神明之真府矣！”图片来源：“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复印件。

④ 郎静山：《乾坤一镜收》。

⑤ 何如珍、何鸿主编：《穿越敦煌 美丽的粉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 年，第 31 页。

⑥ 张大千：《故宫名画读后记》，乐恕人编纂：《张大千诗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年，第 119 页。

⑦ 张大千：《故宫名画读后记》，第 116 页。

⑧ 张大千：《大风堂名迹迹》第 1 册，东京：便利堂，1955 年，第 113 页。

顾展序文》（图 16）[①] 自述中便可窥知一二，其云：“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视茫茫矣，不复能刻意为工，所作都为减笔破墨。世以为创新，目之抽象，予何尝新。破墨法固我国之传统，特人久不用耳。老子云：‘得其环中，超以象外。’此境良不易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其庶几乎。”[②] 由上可知，一是“目疾”影响不复细笔[③]；二是“泼墨始于王洽，逮乎元章衍为云山，此法遂绝，千年而后予拾取其法，盖以青绿泼之”（图 17）[④]，明白说明“泼彩”源于传统“泼墨”技法。然而何以“众为之惊叹，以为创新”？这凭借的是其能“古法生新奇”的功夫，也就是他引以自豪的“麻姑能变幻”的通天本领。而张大千能“变幻”中西绘画的艺术本领，可以从他在一段录制影像中论述“抽象”概念的内容中一探端倪，其云：“老子的学说，他所讲的就是我们抽象画的道理，他说以貌取舍，普通面貌不要，这是抽象，他又说无相之相，没有相（当中）有相，不必一定要就像这个样子，但是有他的精神财富，这是抽象，他还有两句话说得最明白，他说得其环中，超乎相（象）外，我们现在在圈圈里做功夫，最后跳出圈子就好了。”[⑤]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泼彩画技法与中国传统减笔、泼墨以及传统道家「大象无形」抽象意识之美之间的渊源关系。张大千在千年之后重拾古法，以青绿泼之，而今人皆以其现代抽象表现而惊叹为创新。实则张大千是以传统“泼墨”技法，并以“丹青”代“墨”来表现具有抽象意象的“泼”，将中国传统绘画或画论由“丹青”发展为“笔墨”，或者说翻转传统“笔墨”为现代“丹青”。他因目疾而自比“无弦之琴”，却由此跃升至“无音乃是知音”，更是超脱了自然生命的限制而飞跃自由翱翔艺术天地的境界。

2. 装饰性色彩

张大千的泼彩画除了抽象表现形式外，另一重要元素就是色彩。色彩是视觉最强烈的表现，西方绘画的色彩表现，一直追求视觉观看的真实色彩，强调色彩科学的真实性，到了现代抽象艺术才意识到纯粹色彩的独立性与自由表现性。中国传统艺术的色彩表现多具人文象征意涵，不过敦煌壁画中的强烈色彩也强调视觉的装饰性效果。如以珍贵宝石研磨成石青颜料绘制“佛头青”（图 18）[⑥]，除了显示宗教的“璀璨庄严”以及艺术经久不褪色的永恒追求外，更强化色彩装饰性的视觉效果，以石青颜料绘制佛发代替黑色的头发，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黑暗洞窟中视觉无法辨识黑色有关，但到了宋徽宗则将“佛头青”宗教意涵的“璀璨庄严”转为更具有皇家富贵象征的“佛头青牡丹”，也是因为装饰性色彩的视觉效果。张大千在其 1944 年的画牡丹作品《佛头青牡丹》题识曰：“唐人画牡丹，金碧辉暎，烂若云锦……道君皇帝（宋徽宗）佛头青，并效唐法。元明以来，写意虽复轻腻可爱，而秾姿贵彩不可得见矣。”

唐朝王公贵族视牡丹为珍品，大千题跋“秾姿贵彩”之语，便是出自于白居易《牡丹芳》诗中“秾姿贵彩信奇绝”之句。1947 年大千题《道君皇帝牡丹花》：“道君皇帝用佛头青写牡丹，庄严璀璨，如慈云加被。”[⑦] 并于 1949 年作《仿宋徽宗佛头青牡丹》（图 19）[⑧]，因此“佛头青”虽然不符合客观事物自然色彩，却因“秾姿贵彩”而具有“璀璨”“华丽”的装饰性，虽不符自然

---

① 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序文》，1972 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张大千九十纪念展书画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89 年，第 260 页。

② 孙云生口述、朱介英撰写：《大风堂一段绝美的生命交集》，台北：展之艺实业有限公司，2003 年，第 311 页。

③ 乐恕人编纂：《张大千诗文集》，第 31 页。另第 32 页《山水清音》：“我欲抽弦去轸，无音乃是知音，千古解人元亮，偶然短吟长吟，大千老子目翳两年，不能细笔书写，偶然遣兴，正如无弦之琴，聊以将意云耳。”

④ 张大千：《大千论泼墨》，孙云生口述、朱介英撰写：《大风堂一段绝美的生命交集》，台北：展之艺实业有限公司，2003 年，第 311 页。

⑤ 张大千口述老子抽，录象文件。

⑥ 张大千：临敦煌壁画《佛像》，90.9×69.6 厘米，局部，隋，绢本。图片来源：四川省博物馆编：《张大千临橅炖煌壁画》，香港：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 年，第 15 页。

⑦ 孙云生口述、朱介英撰写：《大风堂一段绝美的生命交集》，第 141 页。《道君皇帝牡丹花》粉本款识。

⑧ 张大千：《仿宋徽宗佛头青牡丹》，34.3×49.7 厘米，1949 年，水墨纸本设色。图片来源：“国立历史博物馆”编：《无人无我无古无今：张大千画作加拿大首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00 年，第 102 页。

客观视觉的真实，但却符合人文的装饰性需求与现代色彩的抽象表现。

3．光的视觉意象

最后笔者以为张大千泼彩画中另一独特表现就是“光”的视觉意象，这是中国绘画中没有，但是西方绘画中特有的表现。可以说中国有“阴阳”而无“光”的概念，西方有“光”而无“阴阳”的概念。两者的差异性在于，“阴阳”乃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生、循环不已。而西方“光”的概念则是对黑暗的否定，西方人类学家布留尔（Lucien Lévy – Bruhl ，1857 – 1939）《原始思维》（How Natives Think）中便认为中国文化“不能把影子想象成简单的‘光的否定’”①。而格罗特（J. J. M. de Groot，1854 – 1921）《中国的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一书中则说：“中国人至今还没有关于影子的物理原因的概念……应当想到他们在影子里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光的否定，而是其他什么东西。”所以西方根据科学的概念画出画中的光与影，而中国文化中没有“光”的科学概念，所以画中没有“光”也没有“影”。如同张大千所说：“西画是色与光不可分开来用的”、“中国画是光与色分开来用的”。② 而张大千 1967 年的《山雨欲来》（图 20）③ 以泥金题款“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与《加州夏山》同样描绘日光乍现“光”的效果与“彩”的融合，并以“泼”的技法表现“为云为水”“不质不形，如飞如动”的动感，呈显出画面“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象，正如其自言：“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④ 而山雨欲来中白如光的画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视觉效果，可谓为“计白为光”中西绘画概念的融合。

四、结语

郎静山说：“文艺永远不能超然，更不能孤立。它是附着于时代、附着于社会，以及附着于民族性。”并认为“摄影是一种国际语言，它能打破时空隔阂，沟通语言文字之障碍，它是增进相互了解，友谊和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最佳方式。”照相：“是万国语言，因此可用于沟通世界文化”。所以利用集锦摄影来阐述融合中西文化精神的现代艺术，张大千亦是以绘画作为人类共通视觉的艺术表现，他曾说：“近代西画趋向抽象，马蒂斯，毕加索都自己说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而改变的。”⑤ 中华文化的发展，到了现代已迈入“中国文艺复兴的大时代”，西方哲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地理空间概念描述：“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线；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⑥ 虽然中国唐宋时代已有海上丝绸之路，而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航向了非洲大陆，较西方麦哲伦发现好望角都要早个近百年，随后却在仁宗、宣宗时期再次强化海禁，而中止了面向海洋的发展。时间进入现代，中国面临西洋海洋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终于开始面向海洋，面向世界迎接“三千年来一巨变”（李鸿章语）。是以，中华文化艺术的现代发展，也就应如 16 世纪“西方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便迈出了走向东方的步伐”⑦ 一样，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在回归传统的同时也面向西方，并在这两个不同轴线中找到“异中求同”的统一与创新，而郎静山的集锦摄影艺术的中国化与张大千的泼彩绘画的抽象化应是其最好的印证。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布留尔（Lévy – Bruhl，Lucien）：《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 年，第 47 页。

② 张大千：《画说》，张大千绘著、高岭梅主编：《张大千画》，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3 年，第 16 页。

③ 张大千：《山雨欲来》，1967 年。图片来源：“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张大千九十纪念展书画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89 年，第 224 页。

④ 张大千：《画》，郭威编：《张大千画》，1970 年。

⑤ 张大千：《画说》，第 16 页。

⑥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年，第 135 页。

⑦ 麦克尔·苏利文：《1989 年英文版序言》，《东西方美术的交流》，陈瑞林译，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水经·穀水注》中的错简、脱文与汉魏洛阳城及其周边水系

杨萧杨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水经·穀水注》对北魏洛阳城及其周围的水系进行了详细描述，是研究汉代至北魏时期洛阳城的重要参考资料。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存在“分流复合”现象的水道进行叙述时有如下习惯，即总是依次叙述其分流之处、分流后各支流的情况、分流复合之处、复合后的干流情况。由郦氏上述习惯结合《水经·穀水注》文本及相关材料综合研究，笔者发现在今本关于洛阳城的叙述文字中，存在一些错简和脱文现象，影响了人们对汉魏洛阳城水系的理解。一是“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一段之后出现错简，正确顺序应是该段后续接“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以及“阳渠水又东流，逕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两段文字。二是按上述顺序更正错简后，仍发现“阳渠水又东流……莫知所去矣”与“阳渠南水南暨阊阖门……太和迁都，徙门南侧”两段文字之间存在脱文，脱去了述及穀水“北支”分流河道末尾与“南支”河道汇合的一段文字。笔者依此研究成果拟作出《水经·穀水注》洛阳城周边水道示意图。

关键词：《水经注》；汉魏洛阳城；水系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099－09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撰写的一部地理名著。在这部书中，郦道元通过为《水经》作注的形式，描述了一千余条河流的源头、流向以及所经地点等相关信息。尤为可贵的是，除了水道、地名信息以外，郦道元还援引了多部前代文献，叙述了与这些河流所经地点相关的很多景物与前代史事。因此，《水经注》中的记载，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更早时段的史学、地理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在《水经·穀水注》中，郦道元对北魏洛阳城及其周围的水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北魏洛阳城是在东汉、曹魏洛阳城原址上改建而成，与汉魏洛阳城的关系极为密切，故而《水经·穀水注》中的文字长期以来也一直是研究汉魏洛阳城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发现，在今本《水经·穀水注》关于洛阳城的叙述文字中，存在一些错简和脱文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汉魏洛阳城水系的理解。本文将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论述。①

作者简介：杨萧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文献、历史政区地理、先秦秦汉史。

① 为了更好地展现早期《水经注》版本原貌，本文所引《水经》与《水经注》原文，如无特别说明，皆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以下简称《大典》本）为准，《大典》本中明显存在讹误的文字也不作订正。如本文表 1 第十段文字之末句“穀水又南逕西门门”，在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等版本中改为“穀水又南逕西明门”，此处仍依《大典》本原文。

一、学术史回顾

本文讨论的问题既涉及《水经注》的文本校勘，也涉及《水经注》的地理考证。而《水经注》作为一部地理著作，其文本校勘问题必然与其中记载的地理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根据以往的研究，南宋以来，传世的《水经注》诸版本都出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 年）的成都府刻本系统①，现存的南宋刊残本《水经注》（以下简称“残宋本”）和此后的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以下简称“《大典》本”）、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以下简称“黄本”）等《水经注》重要版本，自然也不例外。从残宋本、《大典》本、黄本等早期版本《水经注》原文中，即可看出很多明显的讹误与错简问题。例如《水经·渭水注》中，关于渭水流经长安城以下直至华阴县的一大段文字，就存在极为混乱的错简现象；《水经·沔水注》中，关于沔水中段流经堵阳县至襄阳县的一段文字，又被错误地衔接到《沔水注》篇末“南江入海”的文字以下。这都是现存《水经注》早期版本中较为严重的文本问题②。明代以来，历代学者在这些早期版本的基础之上逐步进行了校勘，又形成了更多的《水经注》版本。对于早期版本中的讹误、错简等问题，诸家学者也做了不同程度的订正工作。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水经·穀水注》中，历代学者也同样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文本问题。在现存《水经注》早期版本中，《穀水注》最明显的一处文本问题出现在记载“金谷水”的一段文字之下。在残宋本、《大典》本、黄本等早期版本中，“金谷水”这段文字之后羼入了《水经·渭水注》的一段文字，共 320 余字。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明万历时期的朱谋㙔。朱谋㙔整理的《水经注笺》，即是上文所述诸家学者校勘、整理《水经注》的成果之一。在《水经注笺》中，朱谋㙔指出：“此‘药草蔽翳’以下，是《金谷诗集叙》文。而宋本至今俱脱，错以第十七卷‘渭水又东过上邽县’注中‘渭水又东得历泉水’至‘即洋水也北’三百二十二字入此。彼注自具，当删去之。”③ 由此即可看出其中存在的文本问题。

清代学者对《水经注》的文本校勘与地理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清代中叶，对《水经注》研究较深的学者主要有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他们也都分别整理出了各自的《水经注》版本，包括沈炳巽的《水经注集释订讹》、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注》稿本（以下简称“《五校》稿本”）、《七校水经注》钞本（以下简称“《七校》钞本”）、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和戴震整理的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以下简称“殿本《水经注》”）。这些学者对《水经注》的校勘成果，也都体现在这几种《水经注》版本之中。

如上文所述，《水经·穀水注》中羼入了《渭水注》的一段文字。在残宋本等早期《水经注》版本中，羼入的这段文字以下的《穀水注》文字为：“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沈炳巽在《水经注集释订讹》中指出：“但下文与此不接，当另有脱文。”④ 可以看出，沈炳巽已经发现，在早期《水经注》诸版本的《穀水注》文字中，除了羼入《渭水注》文字以外，在“西北角筑之”这句话之前还存在脱文。

全祖望在《七校水经注》中，除了上述“金谷水”以下这一处文本问题以外，还认为《水经

① 胡适：《袁又恺用顾之逵藏钞宋本〈水经注〉校本的残本》，《胡适全集》卷 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67 页。

② 参见李晓杰等：《〈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历史地理》第 31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59 页。

③ 〔北魏〕郦道元撰、〔明〕朱谋㙔笺：《水经注笺》卷一六《穀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李长庚刻本。

④ 〔清〕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一六《穀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301 页。

·穀水注》中的另外两处文本也存在问题。这两处文本都与洛阳城以东的“阳渠水”相关。其中，第一处有问题的文本位于《穀水注》对“建春门石桥”的叙述之后。现存《水经注》早期版本中，这段文字为：

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此而返。水南即马市也。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北则白社故里也。昔孙子荆会董威辇于白社，谓此矣。以同载为荣，故有威辇图。又东逕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

这段文字以下的文字为：

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

亦即叙述东汉王梁引穀水入洛阳之事迹。从现存的《七校》钞本可以看出，全祖望将“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此而返”一句，移到了靠近《穀水注》篇末的“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一句以下，并将“败此而返”改为“败北而返”。同时，全祖望又将“水南即马市也”至“并无文刻也”这段文字，移到了同样靠近《穀水注》篇末的“骏后被诛，太后幽死，折杨为之应也”一句之下[①]。在现存全氏早期的《五校》稿本中，还没有对《穀水注》中的文字次序作出调整；而在《七校水经注》中，全祖望虽然进行了调整，但他并没有对此处调整作出具体的解释。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全祖望认为《水经注》早期版本中的这一处文本存在错简，与上下文并不能很好地衔接，因此他才会调整这段文字的位置。

全祖望发现的第二处有问题的文本在《穀水注》篇末。在《七校》钞本《穀水注》篇末的“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一句之下，全祖望指出：“按此下不言阳渠水入穀之处，有脱文。”[②] 在《水经注》各版本中，“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之前的一段文字叙述的是“阳渠水”的流路，而“莫知所去矣”以下的文字则为“穀水又东逕偃师城南”。可以看出，全祖望认为《穀水注》篇末没有交代“阳渠水”的归宿，就直接叙述“穀水”下游流路，因此此处应该存在脱文现象。

清代以来，对于上述“金谷水”一处的脱文问题，诸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例如戴震在整理殿本《水经注》时，也同样认为此处存在脱文，并补充了一些文字。如上文所述，“金谷水”的相关文字与其下的“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一句，语义并不相接。戴震在殿本《水经注》中，补入了“金谷水又东南流，入于穀”以及“穀水又东逕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共 26 字。这样，关于“金墉城”的一句话就被补充为：“穀水又东逕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③] 这就使这段文字读起来更为通顺。

但是，对于全祖望指出的“阳渠水”相关问题，诸家学者的观点则差异较大。戴震在殿本《水经注》的“阳渠水又东流，逕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一句下的注释文字中写道：“案‘穀水自阊阖门而南’以下，并阳渠水。原本及近刻独此处及下‘逕亳殷’忽两称‘阳渠’，后复称‘穀水’。考其地相比次，非有错紊，而称名参差，或后人臆改使然，今姑仍之。”[④] 可以看出，戴震对于《穀水注》篇末关于“阳渠水”与“穀水”的记载，并不认为其中存在地理位置的错乱，也不像全祖望那样认为其中存在脱文，只是认为“阳渠水”和“穀水”名称的参差出现可能是后人臆改所致。

近代杨守敬、熊会贞著有《水经注疏》，杨守敬还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成为了《水经注》学术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对于上述“阳渠水”问题，杨守敬、熊会贞也不认为全祖望指出的

① 〔北魏〕郦道元撰、〔清〕全祖望校：《全祖望七校王梓材抄本水经注》卷一〇《穀水》，《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第 4 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 年影印本，第 682—683 页。

② 〔北魏〕郦道元撰、〔清〕全祖望校：《全祖望七校王梓材抄本水经注》卷一〇《穀水》，第 686 页。

③ 〔北魏〕郦道元撰、〔清〕戴震校：《水经注》卷一六《穀水》，《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年影印本。

④ 〔北魏〕郦道元撰、〔清〕戴震校：《水经注》卷一六《穀水》。

这段文字存在错简。熊会贞在《水经注疏》“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一句下指出：“全移陆机条与《晋后略》叙陆机事相比，似是。但阳渠自此以下，即七里涧之水，郦氏盖故意前后两载陆机事，以示阳渠、七里涧为一水之意，非错简也。至马市、白社，止去建春门二里，而马市石桥在建春门石桥之东，称东石桥，故《注》接叙于此。若后七里涧之桥，则去洛阳宫六七里。全移马市、白社及马市石桥诸事于折杨句下，则在叙七里涧之桥后，是远近倒置矣，尤非也。”[①] 可见，熊会贞认为“七里涧”与洛阳城以东的“阳渠水”是同一条渠道的两个不同名称。全祖望指出的“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一段文字中的马市、白社等地名，距离洛阳城较近，不应位于《穀水注》下文的“七里涧之桥”以东。因此，全祖望将此段文字移至“七里涧之桥”以下，是不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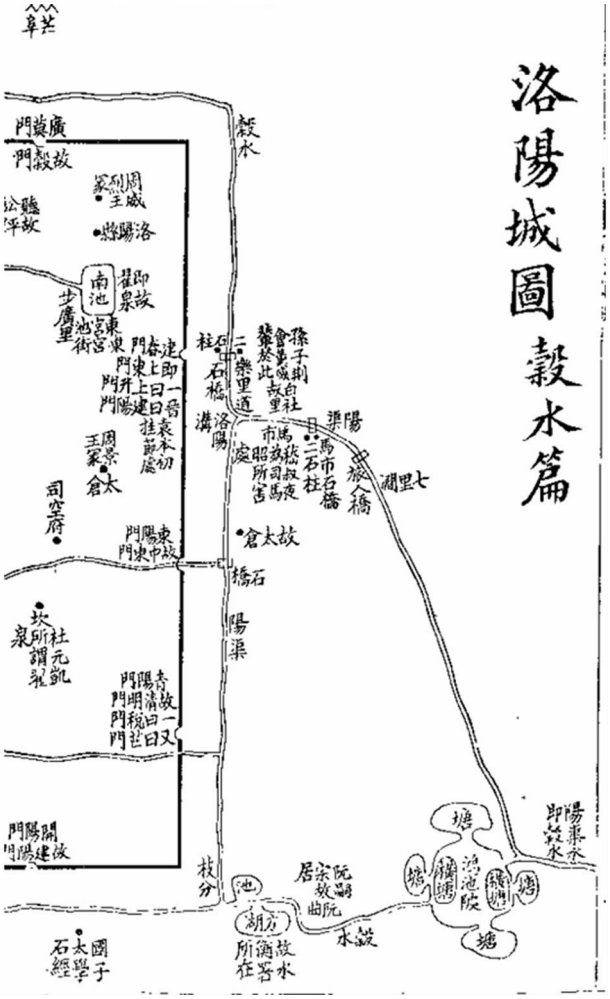

图 1　《水经注图》中的《洛阳城图》（局部）

此外，从《水经注图》中，也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杨守敬、熊会贞的观点。在《水经注图》中，专门有一幅《洛阳城图》，较详细地绘制了《水经注》中叙述的洛阳城内以及洛阳城周围各条水道。在这幅图中，洛阳城以东的“阳渠”和“七里涧”即被标记为同一段渠道的两个不同名称，此段渠道引自洛阳城东护城河，先东流，再转向东南流，先后经过马市、白社故里、马市石桥和旅人桥，在鸿池陂以东汇入穀水（见图 1），与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的注解文字相符。总而言之，可以看出杨守敬、熊会贞并不认为关于“阳渠水”的叙述文字存在错简、脱文问题。

自从《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问世以来，关于《穀水注》的文本问题以及洛阳城附近的水系问题，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后世学者都没有提出不同于杨、熊二氏的意见。然而，经过研究可以发现，杨守敬、熊会贞的观点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郦道元对《水经注》水道次序的叙述习惯与《水经・穀水注》水道次序问题

《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关于河渠流路的记载，可以说是《水经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我国幅员辽阔，河渠水道众多，除了自然河流以外，人们还会开凿出各种人工渠道。因此，这些水道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较为复杂。除了自然河流中典型的支流汇入干流的关系以外，还会出现水道分流的现象。在某些水系中，分流出的水道还会再次分流，这些分流出的水道下游可能又分别注入不同的河流。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要对他当时了解到的所有水道都进行叙述，这就必

① 杨守敬、熊会贞撰：《水经注疏》卷一六《穀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

然遇到如何叙述复杂水道网络的问题。只有搞清郦道元对水道次序的叙述习惯，才能更好地分析《穀水注》中的问题。

《水经注》这部著作，采用了为《水经》作注的形式来撰写。对于《水经》中记载的每一条河流，郦道元都撰写了相应的注文。因此，郦注中的内容实际上都是郦道元以《水经》中对应的河流（如河水、汾水、浍水等）为干流来进行叙述，同时也涉及这些河流的支流。对于支流中的分流现象，《水经注》中的记载较为复杂，本文暂不讨论。对于本文论述的“穀水”干流，自上游流至汉魏洛阳城西北角发生分流，又在下游的鸿池陂以东再次汇合，这在历代学者的研究中都没有异议。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水经注》所载河流干流的“分流复合”现象。

关于《水经注》河流干流的“分流复合”现象，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出现在《水经·巨马河注》中。对于“巨马河”这条河流，《水经》中仅此一称（“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而郦道元在注文中则交替使用“涞水”“巨马水”和“巨马河”的名称对这条河流进行叙述。在“涞水”中游有“督亢沟水”从“涞水”中分流而出，《巨马河注》中关于此处分流的原文为：

又东，督亢沟出焉。一水东南流，即督亢沟也。一水西南出，即涞之故渎矣。

可以看出，“涞水”河道分为两支，一支称为“督亢沟水”，另一支仍称“涞水”（郦注下文亦称“巨马水”“巨马河”）。在此处分流地点以下，郦道元先叙述了“涞水”这一支河道，此段叙述开头的文字为“涞水上承故渎于县北垂”，与分流处所叙述的“涞之故渎”相接。根据郦注，这一段“涞水”河道又经过“迺县故城”“范阳县故城”等地，并与易水、郦亭沟水等河流汇合。再向下游，到了“容城县故城”一带，郦注中提到：“又东，逕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显然，上述分流而出的“督亢沟水”至此又与“涞水”汇合。郦道元叙述至此，才转叙“督亢沟水”。“督亢沟水”这段叙述开头的文字为：“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可见，郦道元又重新强调了“督亢沟水”从“涞水”分流而出的地点。此后，郦道元才继续向下叙述了“督亢沟水”的流路。“督亢沟水”经过迺县、楼桑里、督亢泽等地，最终与“涞水”（即“巨马河”）汇合。将“督亢沟水”叙述完毕之后（亦即再次叙述“督亢沟水”汇入“涞水”之后），郦氏才继续向下叙述二水合流后的流路。

从《水经·洧水注》中也可以看出郦道元对“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洧水”中游有“濩陂水”从“洧水”中分流而出。《洧水注》中的记载为：“又东，洧水右迤为濩陂。”可见，此处有一条河道从洧水右岸分流而出，称为“濩陂水”。与上述“涞水”和“督亢沟水”的情况相似，此处分流形成的两支河道，一支称“濩陂水”，另一支仍称“洧水”。在此处分流地点以下，郦道元先叙述了“洧水”这一支河道。根据郦注，这支河道经过了匡城、洧阳城、茅城等地。到了下游的“思乡城”附近，“洧水”又与上文所述的“濩陂水”汇合（原文为“洧水又右合濩陂水”）。在此之后，郦道元才又转叙“濩陂水”这一支分流河道。“濩陂水”这段叙述开头的文字为：“上承洧水新汲县南，南逕新汲故城东。”此后，“濩陂水”又“积而为陂”，再“北出”，与“洧水”汇合。至此，郦道元才继续向下叙述二水合流后的流路。

从上述《巨马河注》和《洧水注》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水经注》河流干流中出现的“分流复合”现象，郦道元叙述至分流地点以后，总是先叙述其中的一支河道，沿着这支河道一直叙述到它与另一支分流河道重新汇合之处，并且专门有文字提到两支分流河道重新合流（如《巨马河注》中的“又东，督亢沟水注之”和《洧水注》中的“洧水又右合濩陂水”）。此后，郦道元才会转叙另一支分流河道。在第二条分流河道的叙述文字开头，都会重新强调它分流而出的地点（如《巨马河注》中的“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和《洧水注》中的“上承洧水新汲县南”）。然后，再沿第二条分流河道也向下叙述到合流之处。此次叙述两支河道合流以后，才会继续向下叙述合流后的河道。

在上述“分流复合”的水道网络之中，两支分流河道可能还会分别再分流出其他河道。例如

在《巨马河注》中，如上文所述，两支主要的分流河道分别为“涞水”和“督亢沟水”，其中，“督亢沟水”又分流出一条“郦亭沟水”，“郦亭沟水”下游又注入“涞水”。对于这种“再次分流”形成的河道，郦道元可能会在其中一支主要分流河道的文字中进行叙述（例如郦道元在叙述分流后的“涞水”这一支时，对“郦亭沟水”进行了叙述）。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郦道元对两支主要分流河道的叙述次序。对于两支主要的分流河道，郦道元的叙述次序仍然如上文所言，总是先后不相混淆地叙述这两支河道，次序非常清晰。

了解到郦道元对“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之后，再来观察《水经·穀水注》中的文字。首先，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以及《水经注图》中的描述，穀水自上游千金堨一带东流至洛阳城西北角，然后发生分流。此处分流形成的两支分流河道，第一支（以下简称“北支”）自西向东流，经过洛阳城北的大夏门、广莫门等地（此段河道亦即洛阳城北护城河），再南流至建春门，再东流离开洛阳城，经过马市、白社、七里涧等地，直至鸿池陂以东；第二支分流河道（以下简称“南支”）则自北向南流，经过洛阳城西的阊阖门、西阳门等地（此段河道亦即洛阳城西护城河），再东流经洛阳城南（此段河道亦即洛阳城南护城河），然后继续东流，经过阮曲、鸿池陂等地。两支分流河道最终在鸿池陂以东汇合。根据《穀水注》原文，郦道元叙述“北支”河道时，有“穀水逕洛阳小城北”“穀水又东逕广莫门北”等文字；叙述“南支”河道时，又有“穀水又南逕平乐观东”“穀水又南，东屈逕津阳门南”等文字。可以看出，郦道元把这两支分流河道都称为“穀水”，这更可以印证上述两支河道确实是穀水在洛阳城一带最主要的两支分流河道。

在洛阳城一带，从“北支”和“南支”这两条被郦道元称作“穀水”的分流河道之中，还分流出了其他一些渠道，这些大小渠道构成了洛阳城的水道网络。为了更好地研究《穀水注》中的描述以及洛阳城的水系问题，特将《穀水注》洛阳城一带的各段文字及其描述的水道信息列表如下：

表 1　《水经·穀水注》关于洛阳城及其周边水道的描述

段落序号	段落首句	段落末句	描述的水道
一	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	江无复髣髴矣	洛阳城西北角—大夏门
二	渠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	昔晋朝收愍怀太子于后池，即是池也	大夏门—南池
三	其一水自大夏门东逕宣武观	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	大夏门—建春门外
四	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	又东逕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	建春门外—马市石桥
五	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	又言“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者也	未详
六	阳渠南水南暨阊阖门	太和迁都，徙门南侧	洛阳城西北角—洛阳城阊阖门
七	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	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	洛阳城阊阖门—宫城阊阖门
八	渠水又枝分，夹路南逕，出太尉、司徒两坊间	元王东渡，魏代昌矣	宫城阊阖门—南渠
九	渠水自铜驰街东逕司马门南	东出阳门石桥下，注阳渠	宫城阊阖门—东阳门
十	穀水自阊阖而南，逕土山东	穀水又南逕西门门，故广阳门也	洛阳城阊阖门—西明门
十一	门左枝渠，东派入城	又东，于清阳门右，下注阳渠	西明门—青阳门
十二	穀水又南，东屈逕津阳门南	焚毁二学，尚髣髴前基矣	西明门—洛阳城东南角
十三	穀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	又北入洛阳沟	洛阳城东南角—建春门外

表 1（续）

段落序号	段落首句	段落末句	描述的水道
十四	穀水又东，左迤为池	故李尤鸿池陂铭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又东注，出自城池”也	洛阳城东南角—鸿池陂
十五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	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	七里涧、旅人桥
十六	阳渠水又东流，逕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	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	七里涧—亳殷

（说明：按《水经注》记载，洛阳城西城墙最北一门与洛阳宫城正门皆称“阊阖门”，此表格中分别称为“洛阳城阊阖门”与“宫城阊阖门”以示区分。）

同时，也可以将《穀水注》描述的洛阳城水系图绘制出来（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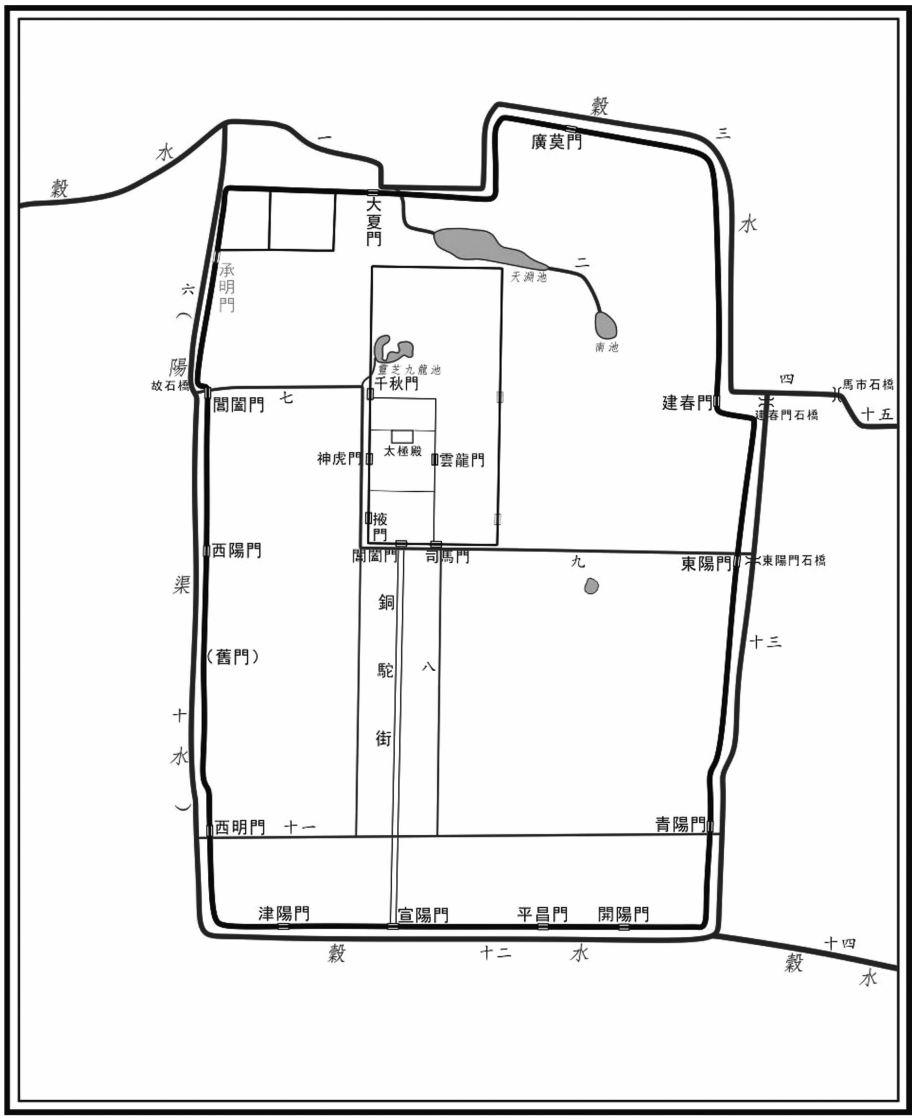

图 2　《水经·穀水注》洛阳城周边水道示意图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杨守敬、熊会贞认为《穀水注》对洛阳城以东河道的描述文字并无错简、脱文现象。《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问世以来，这一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结合上文中提到的郦道元对“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来看，可以发现这一观点仍有很大问题。按照杨、熊二氏的观点，表 1 中的第 4 段文字（“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至“并无文刻

也”）和第 15 段文字（“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描述的都是穀水的“北支”分流河道中的一段，其中第 4 段文字描述的是经过马市、白社的一段，第 15 段描述的则是“旅人桥”以下的一段。从这两段文字中提到的景物来看，它们描述的水道不但都属于穀水“北支”分流，而且地理位置直接相接，都位于“北支”与“南支”这两条分流河道汇合之前。从本文图 2 标记的序号之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问题。如果《穀水注》这 16 段文字中不存在错简，那么，郦道元叙述“北支”河道直到马市石桥（即第 4 段文字末尾），还没有到达“北支”与“南支”重新汇合之处，就突然转而在第 6 段文字中叙述了洛阳城西城墙阊阖门一带的“南支”河道（第 5 段文字自“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至“又言‘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者也”，是郦道元叙述“阳渠”相关史事，没有描述具体水道流路，此处暂不讨论）。这样的叙述次序，与上文中提到的郦道元对“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完全不符。由此即可看出，现存诸版本《水经・穀水注》文本中关于穀水“北支”分流河道的叙述次序存在问题，这段文字中应该存在错简的现象。

三、《水经・穀水注》错简、脱文情况分析

在上一部分的论述中，已经分析了郦道元对《水经注》河流干流“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并指出了现存诸版本《水经・穀水注》文本中关于穀水“北支”分流河道的叙述次序存在问题，这也是杨守敬、熊会贞观点中存在的最大问题。除此之外，杨、熊二氏的观点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问题，需要重新重视全祖望等前代学者的观点，并且结合这些不同段落中提到的地名来进行研究。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述，全祖望认为“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至“并无文刻也”一段文字为错简。如果观察本文第二部分中所列的表格（表 1），可以发现这段文字与表格中的第 4 段文字完全一致。在《七校水经注》中，全祖望将这段文字再分为两部分，都移到了第 15 段文字之中[①]。可以看出，全祖望确实发现了第 4 段和第 15 段文字所叙述的水道应该衔接这一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全氏将第 4 段文字后移，仍然没有解决上文中提到的最大问题。即如果第 4 段文字后移，那么郦道元在前 3 段文字中叙述穀水“北支”分流河道，至建春门外，未与鸿池陂以东的“南支”河道汇合，就转而叙述洛阳城西的“南支”河道，这仍然与“分流复合”水道的叙述原则不符。因此，《穀水注》中的错简问题，并不是第 4 段文字应该调整在后，而是第 15 段文字应该调整在前。也就是说，上文所述《穀水注》第 15 段文字，亦即“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至“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一段文字，本应接于第 4 段文字末尾的“又东逕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以下。

另外，对于第 15 段以后的第 16 段文字，杨守敬、熊会贞的观点也存在问题。这段文字首句为：“阳渠水又东流，逕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叙述“阳渠水”东流经过了“郦食其庙”。以下又叙述“阳渠水”继续东流经过了亳殷（又称尸乡）。根据杨、熊二氏在《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中的观点，上述第 15 段文字开头“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中的“其水”，指的是自鸿池陂东流的穀水“南支”河道，“七里涧”即穀水“北支”河道。那么，“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描述的自然就是这两支分流河道在鸿池陂以东汇合，再向下，第 16 段文字中的“阳渠水”指的就是合流以后的穀水下游河道。这样，按照杨、熊二氏的观点，第 16 段文字中的“郦食其庙”和“亳殷”就都位于鸿池陂以东。如果仔细观察杨守敬在《水经注图》“南五西二”分图中对穀水的描绘，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把“郦食其庙”和“亳殷”都画在了鸿池陂以东[②]。然而，根据考古发现，鸿池陂的位置在今偃师市市区南部，而“亳殷”今称偃师商城，在今偃师市市区西部，鸿池

① 〔北魏〕郦道元撰、〔清〕全祖望校：《全祖望七校王梓材抄本水经注》卷一〇《穀水》，《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

② 杨守敬撰：《水经注图》南五西二，《杨守敬集》第 5 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6 页。

陂的位置还在“亳殷”以东[①]。因此，杨守敬、熊会贞认为穀水“南支”河道出鸿池陂东流，再向东经过“亳殷”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由于“亳殷”的位置在鸿池陂以西，因此，上述第15段文字开头“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中的“其水”，不可能是指自鸿池陂东流的穀水“南支”河道。再结合上文中对错简问题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上述第15段文字和第16段文字应是《穀水注》中的一段错简，它们的正确位置应在第4段文字对“马市石桥”的叙述以后。第15段文字开头的“其水”，以及下文第16段文字中的“阳渠水”，只能是指马市石桥以东的穀水“北支”河道。这一段“北支”河道尚未与“南支”河道汇合，没有到达鸿池陂以东的合流之处。只有这样，第16段文字中“阳渠水”经过的“郦食其庙”和“亳殷”位于鸿池陂以西这一问题才可以很好地得到解释，这几段文字中叙述的地点才不会和实际位置发生矛盾。

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全祖望除了认为“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至“并无文刻也”一段文字为错简以外，还认为“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以下存在脱文。“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一句，即是上述第16段文字的最后一句。全祖望指出：“按此下不言阳渠水入穀之处，有脱文。”[②]根据上文中对穀水两支分流河道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祖望提到的“不言阳渠水入穀之处”正是指现存诸版本《水经·穀水注》中叙述穀水“北支”河道经过“亳殷”后，并没有叙述这支河道与穀水“南支”汇合的情况。从本文第二部分论述的郦道元对“分流复合”现象的叙述习惯来看，全祖望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对于穀水的“北支”分流河道，应该叙述到它与另一支分流河道汇合之处，像《巨马河注》中的“又东，督亢沟水注之”和《洧水注》中的“洧水又右合溱陂水”那样，此后才能开始转叙穀水的“南支”分流。对于现存诸版本《水经·穀水注》的文本，即使将上述第15、16段文字位置调整到第4段文字之后，也还是没有叙述到最终汇流之处。因此，“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一句以下确实应该存在脱文。

如果将第15、16段文字调整至第4段文字之后，其后衔接的是第5段“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至“又言‘遥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者也”与第6段“阳渠南水南暨阊阖门”以下的文字。其中，第5段文字主要叙述了“阳渠”的相关史事，没有出现像“又东逕马市石桥”这样关于水道具体流向以及所经地点的描述。因此，对于这一段文字在《穀水注》中的正确位置，只能暂时存疑。

对于其后的第6段文字，在《大典》本等现存《水经注》早期版本中，其首句为“阳渠南水南暨阊阖门”，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学者将此句改为“阳渠水南暨阊阖门”。不管是哪一种版本，这里的“阳渠南水”或“阳渠水”指的只能是上文所述的穀水“南支”分流河道。但是，在“南暨阊阖门”以上，并没有文字叙述这条“南支”河道分流而出的地点，这与郦道元对于“分流复合”的叙述习惯也不相符。因此，《穀水注》在这段文字以上也应该存在脱文现象。

最后，再结合上文所述的第16段文字以后存在脱文的情况来看，现存诸版本《穀水注》中脱去了穀水“北支”分流河道末尾与“南支”河道汇合的一段文字。在此段文字之后，根据郦道元的叙述原则，恰好应该叙述“南支”分流河道的开头部分。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郦道元原作中关于穀水“北支”分流河道的末尾部分和“南支”河道的开头部分在宋本《水经注》刊刻之前已经完全脱去，同时“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至“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一段文字又发生了错简，于是宋人刊刻《水经注》时，才形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水经·穀水注》文本面貌。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偃师市文物管理局：《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20—25页。

② 〔北魏〕郦道元撰、〔清〕全祖望校：《全祖望七校王梓材抄本水经注》卷一〇《穀水》，第686页。

历史与人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运行考察

邵　宇[1]，孙玲丽[2]

（1.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在继承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与借鉴西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严密的监察网络体系。五权宪法明确监察权的职能定位，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试。在监察权力运行中，运行机构、运行方式和运行关系形成监察权的运行基础。在监察人员管理机制、权力运行保障机制和监察回避机制的保障下，监察权运行富有一定的特点，但监察权运行的成效难以令人满意，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存在脱节，未达到监察立法的初衷。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五权宪法；监察权运行

中图分类号：K262.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108－08

一、问题缘起

监察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特有的政治功能与作用。从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到近代社会，随着传统社会的转型与近代西方文化的深入传播，在中国固有的权力制衡机制与西方分权原则的碰撞下，中国近代的监察制度，在继承传统监察制度与借鉴西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监察体制，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权力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既需要权力同时又难以脱离权力的控制。自权力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其在带来资源权威性分配的同时也导致权力腐化、权力滥用等“恶行”，进而使得人们对权力的质疑声不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国家权力活动的监督与制约，实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目的，在继承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与借鉴西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颇具特色的监察权运行机制。纵观从古代到现代监察发展的历史轨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体制发展已较为完备。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 22 年间，从北洋政府时期监察体系的初步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体系的日益完善成熟，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监察体制的构建中下足功夫，在继承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基础上，独立行使监察权，建立起监察院专职监察制度，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全覆盖监察网络体系。

2017 年 6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随后，党的十九大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重大的决策部署，我国开始启动监察体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边疆民族自治地区政治权力资源配置研究”（15YJC810004）。

作者简介：邵宇，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孙玲丽，普洱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改革。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被最终确定下来使，得我国由先前的行政监察和纪检监察向着国家监察转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监察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中开启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历史是现在和未来的镜鉴，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运行机制的研究，是有效回应当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时代呼唤，可以为深入推进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职能定位

（一）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是指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种权力，分别由五院独立行使的政体设计。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是对三权分立思想的重大发展。孙中山通过政党进行革命以实现现代国家建设，五权宪法思想是他对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总体设计。

孙中山自 1894 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对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开始走上“倾覆清廷”和“创建民国”的革命道路，同时也开始酝酿五权宪法。孙中山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的演说》中提到：“1904 年我和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①] 1906 年 11 月 15 日，孙中山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我期望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造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②] 由此可见，1906 年冬，孙中山不但初步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而且把其作为未来国家的治国方案。但是，这一时期的五权宪法思想还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尚无所谓国民大会的设立，也没有五院的名称，更没有提到政权和治权的分开，只是把考试、监察二权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并在宪法上成为独立的权力机关而已。

1910 年，孙中山在与刘成禺的谈话中，认为五权宪法是把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与中国古代的考试和监察结合起来。他指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为世界国家所有；监察、考试两权，为中国历史所独有。”[③] 但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由于革命党人对五权宪法不了解，并没有依据五权宪法进行国家制度的设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4 年 7 月，孙中山亲自制定《中华革命党总章》，其规定在党内设立协赞会，正副会长均由总理任命。协赞会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党员选举产生五院院长，对协赞会负责。同时还规定了各院的职权范围。可见，中华革命党就是未来理想的中华民国的缩影。1919 年春夏间，孙中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孙中山提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④] 1921 年 3 月 10 日，孙中山到广东省教育会作了题为《五权宪法》的演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和阐述。1924 年，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著作中，提出“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系统地阐述每个时期“五权宪法”制度设计及运行。

（二）五权宪法监察权的职能设定

国民大会行使“政权”，“五院”行使“治权”，监察权属于“治权”之一。五权宪法对国家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59 页。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20 页。
③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445 页。
④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5 页。

权力的划分和功能设置的前提是将国家权力分“政权”与“治权”。“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① 县以下人民通过地方自治行使监察权，体现“直接民权”。县以上，政府通过五院行使“治权”，通过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行使“政权”。监察院对“四院”进行监督，监察院对国民大会负责，接受国民大会的监督，体现“间接民权”。监察权履行着监察其它四院及人员的职能，协调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关系，而监察权在其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五权宪法”架构中，“政权”与“治权”的厘清和五权的功能定位，体现了“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的平衡。

监察院作为民国时期全国最高的权力监督机关，行使监察权。为体现五权平行运作，相互制约，监察院对其他四院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能直接行使弹劾权，需报告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对之进行弹劾。而监察院对国民大会负责，接受国民大会监督。监察权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主权在民，由人民掌握最终控制权，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民负责，也保证了监察权的相对独立运行。由于其他权力主体对国民大会的权力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致使权力制约出现了制度上的缺失。

“官员”对国家治理发挥关键作用，而监察权是“官员”依法履职的重要保证。孙中山主张政党以革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不但实现“主权在民”，也要国家治理的廉洁高效。他认为国家治理核心是“官员”选拔和监督。“官员”的好坏、德才状况、能力的高低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绩效以及民权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孙中山借助于考试权选拔德能兼备的“官员”，但也不能保证每个“官员”合格称职、依法履职，因此，也强调通过监察权对“官员”进行监督。孙中山在创制五权宪法时，受美国政体的影响较大，因此，借鉴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置的做法，采取了分权制的某些表现形式。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形成“五权分立”。可见，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不但接受西方政体的影响，也接受并且变通了古代的贤人政治观。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政体设计的伟大创造，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考试权主要依据“才”，解决官吏的选拔问题；监察权主要依据“德”，解决官吏的考核和罢免的问题。

总之，在政府权力配置上，孙中山既借鉴欧美政府的“三权分立”，主张学习欧美文化之所长，又把它与中国传统政府权力机构的设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创新。而五权宪法正是孙中山在融合中西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制出的独具一格的宪法学说和政体方案，监察权及其职能配置就是制度创新的体现。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职能调试

按照五权宪法的设计，政府治权分为五权，五权分别由五院行使，五院均要对国民大会负责。监察院对公职人员失职等行为不能直接行使监察权，需通过国民大会对其弹劾、罢黜。在五权宪法所设计的国家权力系统中，监察权作为其中的一个权力子系统，是在国民大会统领下发挥作用。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执行五权宪法，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南京国民政府对监察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将监察权从国民大会中剥离出来，由监察院独立行使监察权。1928 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按照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建国程序，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训政时期。训政时期，国民政府继续实行五权宪法，国民政府掌握五种治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国民大会掌握四种政权，即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

①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8 页。

复决权。

1931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在中央政府实施五院制，使得五权宪法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落实和实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①。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采用委员会制作为其领导体制，五院院长从常务委员中选出。五个政府常务委员分别担任五院院长。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国民政府领导体制变为主席独任职。1943 年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案》就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② 监察院由对国民大会负责改为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对“五权宪法”的“修正”，使政治权力的配置由组织分权转向领袖个人集权，这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实施“五权宪法”，推动中国国家建设。但在实施“以党治国”的过程中，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断强化中国国民党和领袖的权威，力推“一个国家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理念，形成独特的“党治”体制。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党治”过程中，不断强化向国民党集权，践行孙中山“党政分察”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党政两套监察系统：一是以监察院为代表的行政监察系统，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代表的党内监察系统。国民党组织主要分中央、省、县、区四级，在各级党组织中设立党内监察机构或监察人员，行使党内监察权。中央设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核委员会、中央党务工作考核委员会；省设有省监察委员会和监察专责委员；县设有县监察委员会和党务监察员；区设有监察委员。1945 年 5 月，撤除区级监察委员的设置。③ 在国民党的党治体制下，国民党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领导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国民党主导党政合一的监察体制，党权主导政府治权，党权支配行政监察权，影响监察权的独立运行。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运行机理

伯恩斯曾指出：“将权力赋予给管理国家的人员是必要的，但同时其也蕴藏危机，就是因为其是如此危险的才导致我们不再通过投票箱来防止官吏转变为暴君。”④ 为此，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如何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实践。纵观从古代到现代监察发展的历史轨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体制发展完备，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覆盖监察网络体系。尽管其监察权的实际运行成效难以令人满意，难以达到监察立法的初衷，但其做法至今在一些地区仍被沿用，其监察机制的设计运行仍有有益之处值得我们借鉴研究。

（一）监察权的运行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 22 年间，自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立体的监察网络体系，在中央层面将监察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监察机关，实际中央监察委员会掌握最高监察权。《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之下下设院长、副院长各 1 人，其人选均由国民政府委员担任，可永久任职无任期限制。监察院院长任会议主席，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它公职。宪政时期，南京国民

①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年，第 159 页。

②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852 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309—310 页。

④ ［美］詹姆斯·M·伯恩斯：《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89 页。

政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对监察委员的选用做出规定："经各省市议会、蒙古与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监察委员，其任期为六年，可以连选连任。"①

为使监察全面覆盖，监察成效明显，南京国民政府除在中央设立监察院外，还将全国分为若干个监察区，实行分区监察制度，设立监察使署代行中央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地方行使的这种监察区分区监察是对传统监察体制下科道监察的借鉴模仿。监察区分区监察自开始运作以来，其监察区由最初的 14 个一直增设到 19 个，在每区下设立一个监察使署做为其监察权力运行的机构。在《监察使署组织条例》《监察院组织法》等条文中规定秘书处、总务科、调查科等共同构成监察使署并协助其处理相关监察事宜。在监察使署下设监察使一人，监察使任期通常为 2 年，期满可连任。监察区在划分时以一省或数省为划分界线，宪政时期，将监察使署改名为监察委员行署，实行委员合议制，由三名监察委员共同主持监察工作，1949 年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全国各区的监察使署才随之消失。

除上述国民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设置的监察机关外，在国民党中央也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原因就在于借助党纪监督约束党员言行达到净化党员队伍的目的。作为监察国民党内部的机构，其将秘书处视为常设机构，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下推选秘书长，在常务委员的指挥下管理秘书处的事宜，在秘书长之下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三人监督指挥本处职员，在专员室、审查处、总务处等二级机构下增设科室。"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展监察工作时将重心放置在审议党纪、考核党政、稽核财务上。自训政以来就一直遵循"以党训政"原则，国民党就一直以人民领导者的身份自居，在《训政纲领》的授权下代人民行使政权，将党的主义视为当时政治的依归，中央监察委员会俨然成为全国监察的最高机关，监察院在对国民政府委员进行弹劾时要将弹劾案交付其惩戒，一定程度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影响着监察院的运作。

（二）监察权的运行方式

制度本身就是一套抽象、缺乏生命力的规则、体制，其制度效能的彰显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制度的有效运行。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制度效能的彰显离不开其监察权的运作。传统监察体制下，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目的，其监察权的运行主要通过审核各类政策法令、中央各部上奏的文书来检验其政绩和政务；定期或不定期出使地方巡查，考察政务民情；监察官员在国家重大政事、仪式典礼、经济及军事活动上亲自到现场实施督察；参政议政及检举控告官吏非法违纪的方式来运行监察权。在传统监察模式下的这种在监察权力运作中借助行政、司法活动来达到监察目的的方式，其或许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行政、司法权能运作上不可避免地会对其造成影响。相较于传统监察体制下监察权运行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力的运作更符合现代政治体制下对权力分化与分工的客观要求。此时期，监察权的运行仍可看到传统监察方式的影子，但其监察权在运行过程中，其它四院不得介入、干涉其监察权的运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党政分察，在监察院的整体运作下，国民党自身也有一套党内监察机关，两者共同运作发挥其监察效能。内外并重、分巡分道的监察传统一直沿用至今，此时期监察权的运行主要通过视察、巡察的方式来推动其监察权的运行，在视察时主要通过对一般事项和特定事项的视察来运行监察权。在中央层面的一般视察以机关为单位，由监察委员及监察院与审计部的高级职员视察行政院下属各机关的施政详情。一般事项视察在地方以区域为单位，由各区监察使巡回监察和特派监察委员分期视察与巡察。巡察是基于当时适应战时发展需要，成立战区巡察团以此来加强监察工作。

① 陈志华：《中华民国宪法》，台北：三民书局，1997 年，第 145 页。

（三）党治模式下监察权与党权的运行关系

党治体制自军政时期就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国家的政治体制，其后一直沿袭不变，南京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一直推行“以党治国”的模式，在党治模式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党政分察体制，除国民政府可通过监察院行使监察权外，国民党自身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中央、省、县、区四级监察网。在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并归于党是此时国家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在训政时期，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的权力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行使，形成“党在国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国民政府及其成员，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并对其负责。从形式上讲，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中央层面形成二元化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监察机构主要是负责国民党内部的监察工作，但在“以党治国”模式的实际运作下，国民党中央始终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一切权力集中到国民党手中，党权决定监察权，党权干预行政权。党权对监察权的这种决定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在国家机器的整个权力运作中权力都集中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章程规定国民党掌握决策权、人事权，在党政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国民党中央决定着监察权的配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监察权的运作上，“监察院根据中国国民党党纲组织之。监察院受中国国民党之监督、指导与国民政府之命令，掌理监察国民政府所属行政、司法各机关官吏事宜”。[①] 国民政府委员会主要由国民党员组成，依据国民党党章需接受国民党的管理和领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产生监察院的正副院长。国民党各监察分院的成立和组成，业务上接受其领导。监察权的行使以国民党党义为行使指南。在监察权的实际运行中，国民党拥有监察机关及其人员的配置权，监察委员中大多是国民党党员，在监察工作中需要贯彻、执行国民党的政策、方针，否则将面临纪律制裁。

其次，党权干预监察权的运行。在孙中山先生监察思想的设计构想中，监察权由监察院独立行使，监察院上下不能由其它机关命令、指挥监察权的行使。但在“以党治国”模式下，党权与监察权是矛盾与冲突的，监察权权能的行使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权的干预，具体体现在党权支配着监察权，监察权的独立性受到破坏。“顾孟余案”是监察权运行上影响重大的事件，1934年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因其违法失职行为受到监察委员的弹劾，在历时七个月的“顾孟余案”中，监察院监察权运行中与顾孟余在职权行使上似乎都以法律法规为运行依据，都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执行，但在弹劾案公布后，介于顾、汪两者的亲信关系，在中政会上，汪精卫利用权力对监察权提出限制以此来压制对顾的弹劾，在汪精卫与于右任及其监察委员陷入僵局时，蒋从中进行调和，由此既通过监察院打击汪派势力，又在压制监察院权力基础上维系了同汪派之间的合作，致使该事件最终以顾孟余不受惩戒宣告结束。一定程度上，此事件使得监察体制下弹劾运作的双重轨迹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监察权力的运作中从表面看其都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运行的，但一旦其触及到权力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官僚的权力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运作实际上是其内部权力、派系博弈潜规则运行的体现，法律成为随时可变的条文和党治的技术工具。

最后，党权破坏监察权的完整性。监察权作为一种制约权力运行的权力，其必须要具有权力性，必须以权力为后盾，才能真正起到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约束效果。若监察未能以权力为后盾，监察在一定层面上就会丧失权威性、约束性与强制性，其对权力的制约必将无力。在国民政府监察体制运作下，将监察中的弹劾与惩戒事宜分开，在弹劾的实际运作中往往以将惩戒事宜交由惩戒机关宣告监察机关弹劾工作的结束，在惩戒机关受理案件时无权对其进行干涉，这种在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303—304 页。

对权力进行监察时将弹劾与惩戒分开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监察权的完整性、权威性、独立性受到影响。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运行机制

制度的有效运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其中制度主体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制度效能的彰显需要依靠制度主体去具体执行。监察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组织机构，其在监察权的运行中，监察对象相对来说十分广泛，为有效担负起监察机关对全国公职人员的监督职能，激励监察官员在纠举、弹劾等过程中敢于发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统治者除在监察权的设置上赋予监察人员于充分的监察权能外，其统治者在监察人员的选用、管理等方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来确保监察效能的正常发挥以及监察权力的正常运作。

（一）监察人员管理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在推动监察制度运行上十分重视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该时期在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大多注重吸纳、选拔高素质的监察人员进入监察体系。监察委员具体行使监察院的监察权，其在监察权能的行使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基于对监察权加强控制的目的，在监察委员的任用上既未采用考选的方式，也未实行选举，而是由国民政府直接对监察委员进行任命；在宪政时期，监察委员的人选根据宪法分配的名额交由各省市议会、蒙古与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出，其任期有明显的时间限定，可连选连任。在监察人员的责任考核和奖惩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监察委员履行的职责都做出明确的规定，《监察委员审查室暂行办事细则》《监察使巡回视察规程》《监察院分层负责办事细则》等都对如何考核监察委员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考核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职权运作中其弹劾案、纠举建议案等的提出、受理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在视察、专察相关事宜、执行监事监赈事项时是否受到部门机关长官的指派；遇到人民投递诉状时是否核查、审阅并签拟办法；是否依法审查弹劾案；是否核阅调查报告；是否出席监察院召开的相关会议”。[①]

在抗战时期，为推进监察机构考核工作的落实，其借助法律条文《监察院分级考核实施细则》，成立专门的考核机构工作考核委员会来协助监察院院长实施各项工作的考核，制定分级考核的依据及考核的具体要求。在监察人员的考核奖惩上，对监察人员每月考核一次，针对监察工作中办事勤奋、监察工作任务繁重、重要事件有突出贡献的监察人员予以记功；对于监察中无故请假且超过一定期限的监察人员，无故迟到早退人员，工作成绩低于平均工作水平的人员予以记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委员在监察权的运行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监察人员个人的素质或多或少会影响监察工作的质量，为此除在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责任考核、考核奖惩上进一步规范监察机关的内部管理，在监察委员的选用上在注重对人员仁、智、勇等素质的考察外，也注重选用、吸纳高学历的人员进入监察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31 至 1947 年间，监察委员中包括留学和国内教育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占比高达 81%，[②] 一批接受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委员是监察权力运行的主要成员。在监察院领导层的任用上提名选拔像刘成禹、高一涵、杜重远、沈尹默等国民党内资深人士及各界社会名流。

（二）权力运行的保障机制

在监察权力运行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保障机制对该时期监察官的权威、监察官的人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309—310 页。

② 刘寿林、万仁元：《民国官职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17—432 页。

身及言论、职权行使做出规定。相较于传统监察体制下给予监察官员特殊礼遇的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监察官权威的保障上主要依托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权威。《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等宪法性文件中对监察权威做出明确的规定。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从第八十七条至九十七条都是对监察院的地位、权力、组织、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方式、任期、监察权限、特权、禁忌等方面的总则性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监察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构，下设监察委员辅助监察院行使弹劾、审计等监察职权。在监察委员人身保障及言论免责上规定："除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人员；受刑事处分人员；受惩戒处分人员的情形下可对监察委员进行免职、停职、罚俸，其余任一情形下都不得免职、停职、罚俸监察委员。此外，在非经监察委员本人同意的情形下不得对其进行转任；对监察委员的逮捕除现行犯的情形外，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逮捕理由告知监察院，经监察院同意方可对其进行逮捕。"① 在监察人员的言论保障上，监察委员行使职权时，只要其行为符合法律，不需承担责任，从而保证其独立履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委员制的监察体系下，弹劾案由监察委员依法单独对其提出，监察院院长不得对其指使或干涉。监察委员在执行监察事务时，各机关及其公立团体应该积极配合，所在地的军警机关应对监察人员的人身安全予以充分的保护。

（三）监察回避机制

监察人员是对政府机关和官吏的监视者，在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下，人情伦理、人情关系深刻影响着制度的运作，为此保证监察人员监察时的客观、公正显得尤为重要。在宗法社会下，为保证监察运作的公正与权威，我国历来重视官僚制度下回避机制的构建，规定监察官出巡回避本人籍贯地、工作地、居住处所；监察官员在监审与其有亲属关系、仇嫌关系的官员违法失职案件时采取回避态度。在维护监察公正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沿袭了这一历史传统，在监察权力的运作上与该案有关系的人，经监察院院长认定后应回避。随后在此基础上为避免监察人员假借职权牟取私利，滋生弊端，又进一步规定监察人员一概不得为他人作介绍信，以此来保障监察权力运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五、结语

在人类探寻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借鉴古今监察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探寻出一条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监察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保障监察机制的有效运行，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的监察网络体系，构筑起完备的监察法律体系，使得此时的监察机制向着体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在当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监察踏上新的历史征程，监察体制改革建设仍任重而道远，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运行的考察，反思教训，汲取有益的经验，以期取得新的建树。为适应当前我国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方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做出重大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将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的制度优势。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余克礼、朱显龙：《中国国民党全书》（上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14—115 页。

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的思考

魏永琴

（威信县委党校，云南 威信 657900）

摘　要：某调研组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采用其所认为的先进方法研究地形、天气有科学依据，但是却抛弃了时代背景、抛弃了二十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威信县文化工作者对长征期间老红军的座谈访谈得到的珍贵资料。这样的研究结论仅强调技术手段而恰恰忽略了党史、忽略了历史事实，失去了基本的支撑和依据。调研组对红军的行军路线的认知也较为片面和模糊，并且误把游击纵队队员墓当成了红军墓。调研组靠“换言之”和“推测”来认定中央红军重大会议召开地点是不严谨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信度。威信县对“扎西会议”的调研前后经历了 30 年，综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在长征期间的警卫员们的现场回忆、朱德的电文、老红军的日记和回忆等等，有人证也有物证可以确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会议地点“鸡鸣三省”，就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楼上社花房子所在的范围。

关键词：扎西；鸡鸣三省；水田；花房子；石厢子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2－0116－05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社”在 2019 年 9 月第 36 卷第 5 期刊登了某调研组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一文，指出：现博洛交权（博古和洛甫领导权的交接）的“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地点“确定在今天的四川泸州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而不在云南威信水田寨，更不在贵州毕节林口镇。”时间“确定为 2 月 4 日晚上至 2 月 5 日凌晨”。①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笔者对调研组把发生在 86 年前重要党史事件，仅仅靠“连续数日的调研”就得出“党史‘悬案’”的结论有所困惑，本着对党史负责的态度，笔者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作出自己的思考。

一、质疑调研组调研的方法

（一）历史没有假设

今天重走长征路是体验那段艰苦岁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追兵、天气、环境、地方势力等等不确定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数的艰难险阻不是我们今天能假设出真实状况的，模拟出来的永远都有误差。因此红军的行军路线和行军速度绝对不可以简简单单从今天的“我以为”来主观臆测。英国的两位学者用 1 年的时间重走长征路，出书《两个人的长征》，

作者简介：魏永琴，中共威信县委党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①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18 页。

得出结论“红军长征走了约6000公里即1.2万华里至1.3万华里”。[①]

中央红军长征25000里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据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李中权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过是如何算出的。这个算法是按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计25550里。其实当时战斗部队大部分每天行程不止70华里，如抢夺泸定桥最高纪录有一天走240华里的。”[②]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实际上从两合岩到扎西只有10华里。[③]

所以调研组所说的利用各种测量手段实地测量来计算距离，推测行军速度不可信。红军走几个小时、走哪条路、能到达哪里只是调研组在根据自己的调查方法作出的猜测，但是却忽略了红军当时被敌人追击等诸多紧急情况和历史背景因素，忽略了红军的迂回行军。总之，红军的行军速度和距离并非生硬地遵循正常状态下的正相关关系。

（二）“鸡鸣三省”就是云南威信县一个村庄的名字

据调研组考证，“鸡鸣三省”这样的地理环境全国到处都有，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以鸡鸣三省命名的村庄却不多，川滇黔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楼上社的花房子周围就有其名。

1. 调研组提到毛泽东说“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④]

调研组删减了1962年5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的部分内容，实属断章取义混淆视听。毛泽东提到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的二月”。[⑤]

毛泽东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三个事实，一是红军到达的这个地方，地名就叫“鸡鸣三省”，二是红军正在进入云南，因而“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这正是国民党统治下军阀割据的特点，各地方军阀盘踞、把守自己的地盘，并且也只关心自己的地盘。三是政治局会议是在前进受阻迂回的时候开的，而不是调研组推测的除夕夜在石厢子与群众联欢以后开的。

2. 调研组提到周恩来回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书记，换下了博古”。[⑥] 周恩来特别提到“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所以再次确认博古向洛甫交权的地方就叫“鸡鸣三省”。威信县水田村花房子所在的范围自古就约定俗成叫做“鸡鸣三省”。

3. 调研组提到“调研组认为，过去以今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岔河为中心，探寻‘鸡鸣三省’村的思路造成了好多问题解释不清楚”。[⑦]

周恩来已明确说博古向洛甫交权的地方是“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的“庄子”，这就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这个庄子的名字就叫“鸡鸣三省”，二是“鸡鸣三省”是一个

---

① 玄武卫：《竟有人质疑红军长征不到两万五千里？揭秘长征究竟走了多少路!》，2018年4月1日，http://military.cctv.com/2018/04/01/ARTIMEAyEBbhogbXHFV1EY9z180401.shtml，2020年12月15日。

② 玄武卫：《竟有人质疑红军长征不到两万五千里？揭秘长征究竟走了多少路!》2018年4月1日，http://military.cctv.com/2018/04/01/ARTIMEAyEBbhogbXHFV1EY9z180401.shtml，2020年12月15日。

③ 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北京：人民出版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④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3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⑥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113页。

⑦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113页。

既有的约定俗成的地名，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在地理特点上处于三省交界处，鸡一叫三个省都能听到的地方的特征性描述。“鸡鸣三省”是“名字”而非“特征”，此二者有根本性差别，绝不能现找一个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的地理上的“鸡鸣三省”来与历史上作为地名的“鸡鸣三省”相混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村庄的名字就叫“鸡鸣三省”，可见“鸡鸣三省”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命名的，而是之前就存在的具体地名。

4. 调研组提到“当地老人指证，石厢子场镇边上、毗邻赤水河北岸的凤凰山历史上就叫‘鸡鸣山’”。“那时的凤凰山顶上既叫‘寨子上’又叫‘鸡鸣三省’。”“因为没有人在山上住，山顶上‘寨子上’和‘鸡鸣三省’的称呼就很少有人提了。”“换言之，凤凰山上的人们下山聚居成村，成为了‘鸡鸣三省村’”。[①] 由是可知，红军长征到达这里的时候，村民早已经从凤凰山顶搬到了坝子，而这个“鸡鸣三省村”是调研组以“换言之”推理出来的。

5. 调研组提到飞地就是石厢子周边，这没有错，陈伯钧的日记、伍云甫的日记、朱德的电文均多次提到石厢子，那说明石厢子这个地名是非常清楚确定的。既然非常确定，那中央领导人绝不会不记得会是在石厢子开的，而非要说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

6. 调研组提到“学界确定了红军中央纵队于 1935 年 2 月 3 日下午（ 农历甲戌年除夕）进入石厢子，2 月 4 日（ 乙亥年初一）驻扎石厢子休整一天，与群众共度春节……故推测，开会时间在 4 日晚上直至 5 日凌晨。新年初一晚上开会，时间宽松，既不疲劳，又是喜庆，更意味着新的开始”。[②]

如果调研组的推测正确，那正月初一白天与群众在石厢子联欢后晚上开会，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记忆。但是周恩来却没说过石厢子叫“鸡鸣三省”，而是说“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③]。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会议的地点是水田花房子而不是飞地石厢子。

7. 调研组提到“综合计算，从石厢子乡到水田寨花房子的行军用时在 11 小时 30 分钟至 12 小时 30 分钟 之间。据此推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应在晚上 11 点以后，印证了伍云甫日记所记‘23 时半才到’”。“陈伯钧日记所载‘是日我的担架掉队十余里……到达宿营地时已次日 2 时了’。”[④]

调研组“据此推测”中央领导人应该比伍云甫迟到花房子，这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第一，伍云甫与陈伯钧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不能代表中央领导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伍云甫与陈伯钧的日记表明他们两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足足相差了 2.5 小时左右，这证明中央纵队行至花房子的时间各异，有早到的也有晚到的；第二，伍云甫所记“23 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说明二科先行到达花房子。这和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高度吻合：“二月五日晌午时分，太阳偏西了中央首长就到了水田寨。”第三，伍云甫 2 月 5 日日记的全文“二月五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⑤] 陈伯钧 2 月 5 日日记“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⑥]两人日记都明确记载红军已经进入云南威信水田寨，但是继续前进受阻。

2 月 5 日伍云甫、陈伯钧两人的日记与毛泽东给郭沫若的《〈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高度吻合，“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

①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 114 页。

②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 115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4 页。

④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 115 页。

⑤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 114 页。

⑥ 陈伯钧：《陈伯钧日记选》，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扎西暨扎西会议资料（选编）》，2006 年，第 68 页。

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的二月”。[①] 这段文字内容告诉我们三个事实，一是红军一渡赤水后被川军追击，进入云南地界又遇滇军强敌。二是红军“无法前进”，只能迂回到花房子，伍云甫、陈伯钧日记均有记载。三是毛泽东同志明确说到“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真相大白了，毋庸置疑会议是在前进受阻迂回到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并不是某调研组推测的在石厢子与群众联欢后召开。

（三）调研组撇开了当事人的访谈，信息失真

调研组虽提到采用了“座谈、访谈，测时、测距，查档、查史，问俗、问贤，访古、察今等方式”，[②] 但调研组没有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威信县大量征集红军史料的威信本地的同志进行座谈、访谈，因此有许多至关重要的材料并没有掌握。例如，调研组只字未提在1975年、1977年、1995年毛泽东、周恩来长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和范金标，都亲自多次到过云南扎西指认会址，这对于最终确认“鸡鸣三省”会议是在云南扎西召开的扎西系列会议之一，以及最终确认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博古向洛甫交权的地方就是云南扎西水田寨花房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毋庸质疑和无可辩驳的铁证。扎西、水田寨、鸡鸣三省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记忆里非常深刻，在警卫员们的记忆里非常深刻。

（四）调研组的论证自相矛盾

调研组提到“2月4日（乙亥年初一）驻扎石厢子休整一天，与群众共度春节”后又提到“三块铜板”“是毛泽东给肖家食宿三天两夜的火耗钱”。[③]

调研组到底认为红军当时在石厢子住了一晚还是三天两夜？文献表明中央领导在“鸡鸣三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只住了一晚上[④]，这与“毛泽东给肖家食宿三天两夜的火耗钱”相矛盾。

（五）调研组混淆了中央红军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调研组在石厢子到水田寨沿途，经过了几处红军墓，访查到烈士龙厚生牺牲处、采访到一个红军牺牲处。从经过的得胜桥、倒马坎和猴子岩等小地名，更佐证了红军此行的艰难。”[⑤]

实际情况是1935年2月10日在云南威信县，在扎西禹王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建根据地，决定抽调人员，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龙厚生任游击纵队特派员，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战争，并没有随中央红军继续长征，1937年1月上旬不幸牺牲，并非牺牲于1935年2月的长征路上[⑥]。

二、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思考的结论

调研组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采用先进科学的手段和工具研究地形、天气有科学依据，但是抛弃了时代背景、抛弃了20世纪60至90年代威信县文化工作者对长征期间老红军的座谈访谈得到的珍贵资料来空谈长征，这样的研究结论缺乏支撑。调研组对红军行军路线的推测性描述有多处引用文献时节略原文重要词句，断章取义、模糊相关表述和事实。调研组对一些基本史实存在严重认知错误，造成认知上的时空错乱。例如，误把川南游击纵队队员墓当成是1935年2月红军主力经过时牺牲的红军战士墓。调研组罔顾重要历史文献完整明确表述和当事人的现场指认，仅靠“换言之”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②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112页。

③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116页。

④ 贾永：《那年春节》，2019年2月18日 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19-02/18/content_227585.htm，2020年7月16日。

⑤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116页。

⑥ 编写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和“推测”来确定中央红军重大会议召开地点，这样的“结论”没有可信度，且不严肃、不严谨。

1．调研组声称，“‘鸡鸣三省’会议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云贵川三省乃至全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①] 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云南省政府早在 1987 年就把水田镇水田村楼上社的花房子确定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党史教育基地。

2．20 世纪 60 年代 70 年代，为了考证 1935 年 2 月讨论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及博洛交权的地址，威信县相关同志作了大量的调研和访谈，当年威信县为此奔波、调研、执笔的同志在世的还有几位，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威信县调研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客观、可靠的，也得到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相关领导和专家的认可。

3．1935 年 2 月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及博洛交权的地点“鸡鸣三省”，位于云南省境内威信县水田寨，这在毛泽东、周恩来及其警卫员陈昌奉和范金标，以及老红军吕黎平、曾三、李质忠等的记忆里非常深刻。陈昌奉和范金标曾在 1975 年、1977 年、1995 年，多次来到威信县，亲临水田寨花房子回忆 1935 年 2 月 5 日晚上发生的事情，核实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帮助落实扎西会议纪念馆的修建事宜。80、90 年代都有老红军回忆会议地址的记录，但当年曾经陪同老红军核实会址的知情者并没有得到接受某调研组访谈或与之座谈的机会。某调研组撇开或避开“鸡鸣三省”会议重要相关地点、相关人员、相关前期调查成果和权威结论、相关历史文献和基本史实，而进行所谓“座谈、访谈，测时、测距，查档、查史，问俗、问贤，访古、察今”，导致其调研和结论的可信度和严肃性几乎完全丧失。

4．“鸡鸣三省”会议关系到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的问题，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中产生，领导核心在花房子交权后逐渐形成，尊重历史是讲政治的体现。

三、建议科考调研不要单纯为了证成而选择性取证

调研组辛苦调查、努力工作的精神值得称道，但调研过程和结论存在明显问题。调研组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理性、严肃严谨的态度开展调研。从调研组的调研报告看，调研存在明显的人为预先主观设定结论、为证明而证明、为得出希望得出的结论而对材料主观人为取舍等问题。调研组调研中拆解原始资料，片面撷取、生硬拼凑、主观臆测出证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四川的“证据”。调研组举证的一些材料，破坏了原始资料、文献完整性，忽略、隐瞒了原文、原始证据中的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表述、证据，从而造成对材料本意的歪曲和对历史叙述的严重失实。尤其是调研组忽视和无视云南、乃至中央相关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前期调查研究成果和结论，对许多重要的、关键的、决定性的材料、人证和物证竟只字不提，这有悖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规范，也于实事求是、科学严谨、严肃负责的研究精神和方法、态度不符，是不可取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极其严肃的党史研究，绝不能由于主观臆测和对材料的人为片面取舍而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学习研究历史的前提就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1984 年 8 月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在四川叙永召开落实“鸡鸣三省”位置座谈会时，李志光主任就强调“要以文字资料为依据，不能联想，文件是主要的依据”，但是在今天某调研组却仍然通过一些联想、推测来研究党史。

笔者呼吁四川相关部门、人员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严谨、严肃负责的态度，加强与云南和全国其它地方的交流合作、坦诚沟通，携手开展调查研究，力促资源共享，为党史研究做出切实贡献，让红色资源更好地为引导和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导向，服务和满足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贡献，也为服务地方发展增辉添彩。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调研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基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实地调研的分析》，第 112 页。

图2

图3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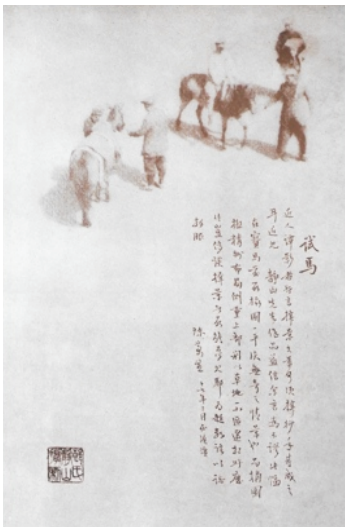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插页1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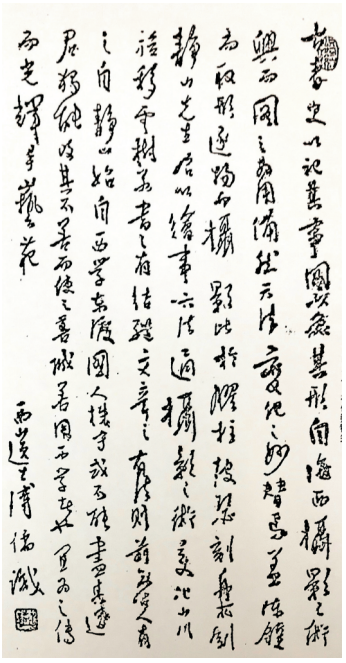

图12

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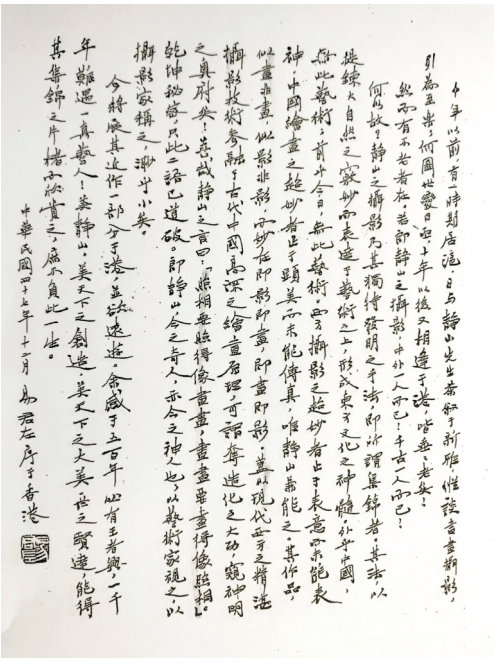

图14

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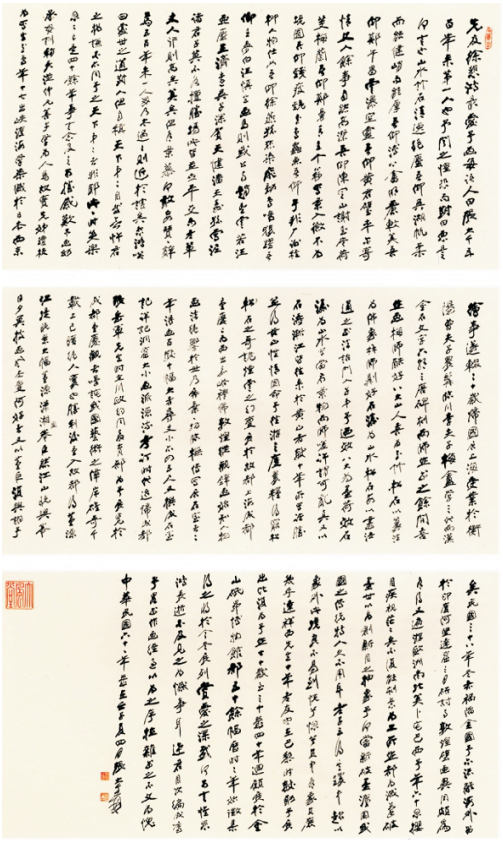

图16

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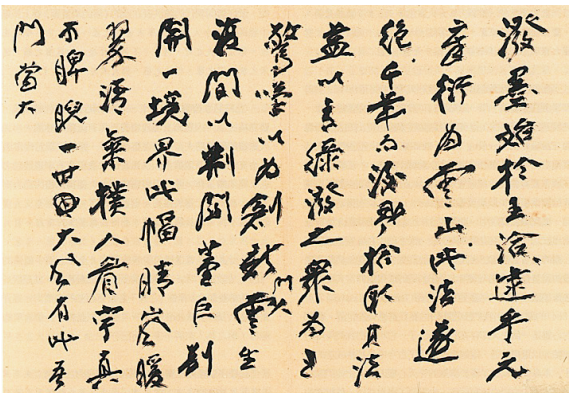

图18

图20

图19

（上接封二）

中体现。多年来，云南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围绕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围绕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在两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向社会交出了一份份优秀的履职答卷。

在2020年云南省两会上，民盟云南省委根据2019年开展的重点调研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提案和大会发言材料，共向会议提交大会发言材料10件和集体提案16件，内容涉及教育、经济、生态、民生、社会管理等多方面。《云南政协报》记者围绕民盟云南省委丰硕的履职成果，及时采写了新闻稿《同频共振唱响云南民盟声音》，获得各界良好反响。云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5位九三学社界别的省政协委员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研究专长，围绕“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发表真知灼见，其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引来各路媒体争相采访。《云南政协报》记者了解到此新闻线索后，特地联系5位政协委员进行了专访，在“统战新闻”栏目刊发新闻稿件《念好山水经 走稳生态路》，该文刊出后得到省市多家媒体转载。

民革、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台盟等省级民主党派组织也分别发挥党派自身特色和优势，或提交集体提案，或大会发言，或参加协商议政，各自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参政党应有的责任担当。

民主党派的声音，生自“沃土”，达至会堂。为之倾情、竭力相助始终是《云南政协报》的一项重大使命。民主党派也应充分利用各媒体聚焦两会的有利宣传契机，发出民主党派高质量履职最响亮的“好声音”。

三、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民主党派的优势

要讲好民主党派故事和多党合作故事，传递好声音，弘扬正能量，就要充分挖掘新闻资源，把握新形势、新媒体语境下的叙事方式、传播规律和受众需求，展示好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成果。

新媒体语境下，“独家新闻”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优质的新闻不仅意味着“第一时间”，还意味着独家观点、独家视角、独家方式方法。要突出民主党派新闻报道的特色优势，必须要弄清“民主党派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在新闻稿件采写时，要通过抓取民主党派参加政商议政、民主监督、为各级党政部门建言献策、为群众排忧解难，搭建百姓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等独特优势，深入采访，挖掘新闻资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语言来展示民主党派的工作成效。

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在这场重大战役中，民主党派从不缺位。广袤的云岭大地上，民主党派凝聚思想共识、贡献智慧力量、倾情倾力担当，生动讲述多党合作的同心故事。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系列报道中，《云南政协报》记者聚焦民主党派科技扶贫、教育扶贫、产业帮扶、扶智与扶志相结合的脱贫帮扶“组合拳”，及其利用建言献策、提案、监督等方式和渠道参与决战脱贫攻坚的特色亮点，以全方位立体式报道助推民主党派脱贫宣传及成果推广，较好发挥了主流媒体舆论导向作用。

记者采写了民革云南省委助力会泽县脱贫攻坚的报道《石榴红了农民富了》、民革云南省委提案报道《用绿色减贫推动可持续发展》、民进云南省委提案报道《发展榛子产业 走出扶贫新路》、台盟云南省委帮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报道《“特”上做文章 “准”上下功夫》、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在会泽县科技扶贫的报道《“种子”在李子箐“发芽”》《产业扶贫显成效勤劳致富共筑梦》……这一系列情真意切、饱含满满正能量的宣传报道，展现了民主党派用心、用情、用爱、用智助力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和坚决行动。

分析上述实践和经验，《云南政协报》“统战新闻”栏目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得到全省广大民主党派组织的认可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赞誉，主要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有的宣传重点都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加强选题策划，了解各民主党派工作宣传的要求、短期长期工作重点等，有的放矢，精准组稿；注重对接履职平台，助力两会、政协协商议政会议发出“好声音”；注重新媒体宣传方式，利用好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进行差异化、多样化的宣传，扩大受众范围和覆盖面。三是在进行宣传的过程中，改变说教、刻板的固有模式，坚持“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原则，多讲群众身边的事，多说群众能懂的话，使宣传可亲可信、深入人心。

责任编辑：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1年6月 第2期（总第90期） 第23卷

主　　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　　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　　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　　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　　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1年6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Jun. 2021 No.2 (Sum.90) Vol.23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June 20, 2021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10 06

定价：9.00元